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目 录

欧亚经济联盟

- 3 E·维诺库罗夫 / 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现状与初步成果
- 27 王志 / 欧亚经济联盟：进展与挑战

中亚政治经济

- 59 王林兵，雷琳 / 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研究——起源、特点、变迁与影响
- 89 焦景丹 / 塔吉克斯坦的劳务移民输出及其影响

族群问题研究

- 120 艾苏 / 苏联分离主义的历史分期和特点研究
- 144 苟利武 / 乌克兰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
- 162 张丽娟 / 波兰和乌克兰关于历史记忆的冲突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市崇明裕安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8 年 1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8 年第 6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Е. Винокуро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состоя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3)

Ван Чж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гресс и проблемы(27)

Ван Линьбин, Лэй Лин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зменения и влияние..... (59)

Цзяо Цзиндань

Анализ экспорта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и его влиян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 (89)

Алсу Тагиров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этапов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120)

Гоу Ливу

Этническая сепарация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процесс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Крым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144)

Чжан Лицзюань

Конфликты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между Польшей и Украиной.....(162)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8 年第 6 期 (双月刊)

Contents

Evgeny Vinokurov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urrent State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3)

Wang Zhi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 (27)

Wang Linbing, Lei Lin

On Modern Political Elites in Kyrgyzstan: Origins,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and Impacts ····· (59)

Jiao Jingdan

On Tajikistan Labor Emigrants and Its Impacts ····· (89)

Alsu Tagirova

Historic Periods of Soviet Separatism and Analysis of its Features ····· (120)

Gou Liwu

Ethnic Separation and Governance during Ukrainian Social Transition: A Case of the Crimean Issue····· (144)

Zhang Lijuan

Conflicts in Historical Memories between Poland and Ukraine····· (162)

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现状与初步成果***

E·维诺库罗夫**

【内容提要】当前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建设成果需要加以评估。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成功故事”。在最初的快速发展之后，欧亚经济联盟目前的成长速度已经放缓。但另一方面，它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最佳的观察视角，并不是要将其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规则中的例外，而是要将其看作一个正常运转的关税同盟。这个关税同盟在向其他发达经济体所建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面临着很多发展障碍。本文回顾了欧亚经济联盟机制的现状，商品和服务的单一市场的建设情况，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流动状况，正在推进的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工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建立欧亚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进展情况，共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状况，以及五个成员国对欧亚一体化的舆论动态。

【关键词】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区域一体化 关税同盟

【中图分类号】D851.2；F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6-0003(24)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The Partnership in the Greater Eurasia and the Regional Process）”（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俄文发表于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杂志 2016 年第 12 期、德文版发表于 *Osteuropa* 杂志 2016 年第 5 期、英文发表于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在已发表文献的基础上，作者作了大幅修改和更新后（截止 2018 年 7 月 1 日）供稿于本刊，发表其中文版。编辑部在此表示感谢。

** E·维诺库罗夫（Евгений Винокуров, Evgeny Vinokurov），俄罗斯经济学家、俄罗斯科学院教授、欧亚发展银行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

导言

欧亚经济联盟是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成员。2011 年建成了关税同盟，2015 年形成了一个经济联盟。除了地缘政治目标之外，它以一个具体的长期经济议程作为自己的建设基础。基于这个原因，欧亚经济联盟的创建能够帮助其成员国巩固区域内部的经济纽带，使其国民经济走向现代化，并创造一个有利于提高其全球竞争力的环境。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单一市场，是欧亚一体化进程的核心。而欧亚经济联盟法院、欧亚开发银行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等一体化架构的不断增加，使得欧亚经济联盟得以巩固。

能够在经历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两次“启动一体化进程失败”^①之后创建欧亚经济联盟，这是其成员国的一项重大成就，但它们仍有许多发展障碍亟待清除。

欧亚经济联盟已经是一个运转正常的实体。这种观点没有引发任何特别的反对意见，除非你把标准定得特别高，并将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基准，那样的话，的确是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期望过高了。但是，如果把标准降低，把欧亚经济联盟同其他深度和成功程度各不相同的区域一体化项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方共同市场、东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理事会（海合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放在一起，那么就很有可能建立一个更恰当的框架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的相对地位。

我们认为，观察欧亚经济联盟的最佳视角，并不是将其视为与一般规则不同的例外，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正常运转的区域一体化集团，它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存在一些问题。欧亚联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它也有根深蒂固的局限性。到 2016 年，该机制最初的发展势头已经消失殆尽，我们将在随后的分析中解释这一点。现在，这个一体化集团正进入直面第一波争论与挑战的发展阶段。它还能继续发展下去吗？还是会倒退？

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非常简明的、兼具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分析，并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重要的数据。我们认为，这样的“入门

^① 即 1995 年的“关税同盟”构想和 2003 年的“共同经济空间”构想，具体内容分析见下文。

书”在研究文献中常常是找不到的。

本文将讨论以下主题。第一，我们将简要地介绍欧亚机制（不仅是欧亚经济联盟，而且是整个欧亚经济一体化的生态系统）的现状及其演进过程。第二，我们将仔细分析商品与服务共同市场的出现，以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状况。第三，我们将检视欧亚经济联盟在消除和统一**非关税壁垒**方面取得的进展。这项工作可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远远超过取消关税限制的效果。第四，我们将研究贸易流动的行为和结构。第五，我们将回顾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相互投资的态势。第六，我们将探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内容和与其执行相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有关的问题，包括货币。第七，我们将分析正在进行的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署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的努力，包括与两个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欧盟和中国的协定。第八，我们将讨论已经在运行的共同劳动力市场。最后，我们将考虑公众对欧亚一体化不断变化的看法。

欧亚机制的演变：从两次失败的启动到一个运转正常的关税同盟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这个大规模的国际项目源起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1994 年 3 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讲话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体化范式，这种范式强调，需要建立一个集中关注经济事务的欧亚联盟。从实践层面上看，该机制建设的起点是 2007 年。^①

为实现这样的一体化理念，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足足花费了 20 年的时间，在探索的路上也犯了几次错误。在此期间，独立国家联合体（以下简称“独联体”）化解了多次严重的解体威胁。为了确保技术合作与保护电力系统而建立的运输与电力工业委员会^②，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然而，基于很多客观原因，作为一个组织的独联体，最多也只能做到“和平分手”。

1995 年，当时的“三驾马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① 具体建设进程见下文叙述。

② The Transport and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Councils

至今这三个国家仍是这个一体化联盟的核心^①——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该条约旨在消除经济主体之间自由经济互动的障碍，促进商品的自由交易，并确保各方之间的善意竞争。但这是第一次失败的启动。

2000年，五个国家建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在该实体的支持下，签署了100多份协议。此外，欧亚经共体也成为保证2006-2010年各项举措得以实施的过渡性机制。因此，从技术角度上讲，关税同盟委员会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机构。欧亚经济共同体于2015年1月1日正式解散，同时欧亚经济联盟成立。

200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总统签署了建立“单一经济空间”协议^②。但2004年橙色革命的爆发终结了这项协议。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启动。

2007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签署了“关于建立关税同盟（CU）的协议”。他们还批准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实施计划。其目的是促进商品在各国相互贸易中的自由流动，为协议各方与第三国的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并扩大经济一体化。

不少人都认为他们的第三次尝试也会最终失败。然而，在预定的两年筹备期到期之后，2009年12月19日，卢卡申科、梅德韦杰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在阿拉木图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建立关税同盟的联合声明。于是，三国共同关税（协议）于2010年生效。这一成功至少部分归因于经济危机的出现，这场危机促使三国加快一体化进程。^③

2011年，关税同盟已经完全实施，各经济机构在共同关税区内经营并使用共同的关税标准。2012年1月1日，关税同盟补充了由17项协议组成的一揽子协议，这些协议构成了单一经济空间（Single Economic Space, SES）

① Винокуров Е, ред. Система индикаторов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ЕАБР. Алматы: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Банк Развития, 2010.

② Single Economic Space

③ 现在标准的理论观点是危机阻碍了一体化，因为它们助长了保护主义。但还有一种不同的推理可能会适用于前苏联国家：如果有关国家关系密切，且没有可行的替代办法，那么经济危机可能就会促进一体化进程。相关讨论参见 E. Vinokurov, A. Libman, “Do Economic Crises Impede or Advanc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4, Vol.26, No.3, pp.341-358.

的监管基础。协议涉及许多在“三驾马车”领土范围内巩固经济融合进程的若干关键问题，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到劳动力迁移等问题，都在其中。^①

最终，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正式生效。亚美尼亚于2015年1月2日加入了一体化联盟，吉尔吉斯斯坦也于2015年5月8日加入（该决定于2015年8月获得批准并生效）。^②

欧亚经济联盟的机制

欧亚经济联盟各项机制的“家庭成员”现已完备。最高欧亚经济理事会是一个由成员国元首组成的机构，负责处理影响该联盟的关键事务，并有权批准其总体战略、关键业务领域和发展前景的相关规划。欧亚政府间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组成，在10个领域行使权力，包括执行和监督“欧亚联盟条约”，以及核准欧亚联盟预算草案。

2012年以来，一个共同的超国家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EEC）——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监管机构，为一体化进程提供原动力。约有140项功能已经提升到由超国家级的委员会层面来决定。欧亚经济委员会的主要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由10名成员（部长）组成，每个成员国派出2名部长代表国家组成该理事会。这样的代表权安排，削弱了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事务中领导国家的地位：尽管俄罗斯占欧亚经济联盟总GDP的87%，但俄罗斯的投票权仅占其总投票权的20%。这是有意安排的。自2016年2月起，该委员会一直由亚美尼亚前总理蒂格兰·萨基扬（Тигран Саркисян）领导。

其他关键的欧亚经济联盟机制还包括：

欧亚经济联盟法院是一个专门的司法机构，被授权解决联盟框架内各国

① 更多关于单一经济空间的分析可参见 R. Dragneva, K. Wolczuk (Eds.),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aw, Policy and Politics*, New York: Edward Elgar, 2013.

② 关于欧亚一体化严谨的详细情况可参见以下作品：E.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asing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K.J. Hancock, A. Libman, “Eurasia”, in T.A. Boerzel, T.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缔结的国际条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并执行其理事机构的决定。例如，它在共同海关关税等问题上的裁决，对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具有法律约束力。到目前为止，法院主要审查了各国有关确定欧亚经济联盟特定进口配额的申请。

欧亚一体化的金融机制已经嵌入到了欧亚开发银行（EDB）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EFSD）的框架之内。欧亚开发银行（6 个成员国，16 亿美元资本，当前投资组合约 28 亿美元）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10 年来，它的累计投资额超过 65 亿美元，优先考虑促进相互贸易和相互投资的项目^①。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拥有 85 亿美元的资本，同样拥有 6 个成员国（所有五个欧亚联盟成员国加上塔吉克斯坦），在地区危机管理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本质上看，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是一个“区域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充当发放公共预算贷款的最后贷款人。它还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欧亚经济联盟的核心法律文件，是“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它共有 680 页：条约本身长达 100 页，其余页面为附件。^②

表 1 欧亚经济联盟社会经济发展指标（2017 年）

指标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总计
GDP	名义 GDP (十亿美元)	11.5	54.4	160.8	7.2	1527.5	1761.4
	购买力平价 GDP (十亿美元)	28.3	178.9	477.6	22.9	4007.8	4715.5
	名义人均 GDP (美元)	3860.0	5760.0	8849.9	1143.7	10608.2	
人口 (百万)		3.0	9.5	18.1	6.2	146.0	182.8
对外贸易 (十亿美元)		5.1	43.7	65.4	4.4	569.3	

资料来源：IMF, World Bank, national statistic agencies. 作者统计。

大体上说，这样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拥有涵盖 1.83 亿人口的共同市场，截至 2017 年底，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约

①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Facts and Figures*, as of July 1st, 2018, <https://eabr.org/en/about/facts-and-figures/>

② *EAEU Treaty*, 2015, https://docs.eaeunion.org/docs/ru-ru/0043610/itia_05062014

为 1.76 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4.7150 万亿美元。欧亚经济联盟内最大的经济体，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如上表所示）。

取消单一市场中对商品和服务的各种豁免权

欧亚一体化的进程取决于“自下而上的一体化”行动的成功——即相互贸易、相互投资和劳动力迁移的增长。这就要求在欧亚经济联盟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必须是统一的。从长期来看（直到 2025 年），联盟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将其共同市场的覆盖率，提高到尽可能接近 100% 的水平。

2015–2016 年发生的事件表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取消单一市场中的豁免权，对于欧亚经济联盟各经济体的现代化与合作至关重要。例如，各方已同意，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医疗用品和药品共同市场。然而，由于监管的复杂性，以及在欧亚经济联盟层面统一制药管理程序方面存在困难，相应的决定被推迟了一年执行。此外，为了使这一决定在政治上能够为所有成员国所接受，向真正的共同市场迈进的根本性措施，被推迟到 2020 年执行，在某些地方甚至会被推迟到 2025 年。

此外，关于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的谈判也举步维艰。该法典本应于 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但最终被迫延迟。现在，各成员国的经济机构正在没有守则的情况下运营，只能依赖国内法和现有的条约与协定。欧亚经济委员会已经收到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对法典草案提出的大约 1500 条意见。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该法典谈判工作的时间晚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它们现在也在积极讨论拟议的修正案。截至 2016 年 6 月，在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内，仍有 57 个与海关监管有关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为了能够最终清除最后的障碍，2016 年 11 月 16 日，五个成员国在总理层面（政府间理事会）进行了一次激烈、但非常必要的讨论。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于次年 5 月生效。

还有其他一些敏感问题很难调和：

其中一个问题是，除俄罗斯以外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都不愿意加入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的制裁。这些国家继续与乌克兰公司开展业务往来。俄罗

斯从未在联盟内部提出过对乌克兰采取制裁措施的正式建议，这一问题也没有升级到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层面进行讨论。这也意味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与它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贸易关系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即便不能将其认为是法律层面的冲突，也是实质上的利益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白俄罗斯制造商和贸易公司对欧盟商品的再出口，这些商品（主要是食品）在俄罗斯的反制裁名单中。例如，“白俄罗斯”的香蕉和牡蛎，已经被运往俄罗斯市场。因此，俄罗斯当局检查所有进入的货品，以核实这些货物是否来自其所标注的原产国。这对商品运输造成了相当大的延误，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边境上排起了长队，白俄罗斯当局也抱怨不止。最终，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俄罗斯实施了更严格的原产国标签要求，并对白俄罗斯出口商的违规行为，实施了更严厉的处罚。

2016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乌克兰激进分子阻止俄罗斯车辆通过乌克兰领土。作为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车辆实施了类似的反制措施。这严重阻碍了乌克兰出口商通过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运送货物的尝试（尽管俄罗斯可能是很大一部分运往哈萨克斯坦货物的真正最终目的地）。欧亚经济联盟货物运输信息系统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乌克兰航空公司最终获准通过俄罗斯领土转运货物。

同样，欧亚经济联盟在取消条约所规定的豁免权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单一电力市场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欧亚经济委员会在批准了单一电力市场的概念框架后，将拟订相应的国际条约。根据目前的时间表，该市场将于2019年启动，具体细节仍在讨论中。其基本架构是建立一个能够与跨境电力交换机制相结合的共同现货市场（它可以被称为“Nord Pool Minus”，即一个缩减版的斯堪的纳维亚共同电力市场）。^①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正在就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展开磋商——在2022-2025年之前，建立一个欧亚经济联盟的金融监管机构。这将是一个超国家金融机构，负责执行欧亚经济联盟金融市场的共同标准，并提供适当的规制

① “Nord Pool”，即北欧电力市场，是在1993年开始创建的跨国电力市场。其范围包括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四国。在该机制的推动下，四国实现了电网互联，建立了统一运行的跨区域电力市场，也被称为全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国电力市场——译者注

与监管。但迄今为止，联盟尚未正式提出任何与单一中央银行或单一货币有关的问题。

到 2025 年，欧亚经济联盟区域预计将出现一个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产品的单一市场。最后期限如此遥远，是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在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组成预算收入中，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这项工作将分为石油和天然气两个部分分别进行，两个部分各有其计划和路线图。

最终确定海关法典，建立共同的医药、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并且建立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同一进程的组成部分——即，取消欧亚经济联盟共同市场中的各种豁免权。事实上，这一进程相当复杂，也颇有争议。唯一合乎逻辑的假设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将会是权衡取舍的产物。

非关税壁垒的清除与统一

在欧亚经济联盟的近期议程上，逐步统一并且清除各国之间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NTBs）是最重要的事项之一。非关税壁垒给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之间商品和服务的相互流动带来了沉重负担，降低了共同市场的整体效率。它们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合作，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在机械和化学工程领域。

欧亚发展银行一体化研究中心完成了一个大型研究项目，首次对于非关税壁垒对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相互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长期评估，并就如何清除这些壁垒提出了建议。一项涉及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发现，非关税壁垒造成的成本损耗，已经占到了其出口总值的 15% 至 30%。换言之，截至 2014 年，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每 1 美元的出口商品贸易价值中，仍然包括了 15 至 30 美分的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成本。^①

非关税壁垒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非关税壁垒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配额、禁令和数量控制措施等。第二类非关税壁垒包

^① 参见 E. Vinokurov, et al,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ducing Non-Tariff Barriers in the EEU*, Report 29, Saint Petersburg: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5.

括价格管制措施，和那些能够影响市场竞争的措施（如特殊进口商、限制销售和公共采购、补贴等）。第二类障碍通常被描述为“车轮上的沙子”，因为它们阻碍着商品的流动，理论上，这些障碍完全可以清除。这些非关税壁垒对于贸易的负面影响最大。

从中期来看，白俄罗斯将从非关税壁垒的减少中受益最大：其实际GDP可能会增长 2.8%，其财富可能累计增长 7.3%。而哈萨克斯坦，财富可能增长 1.3%，而实际GDP可能增长 0.7%。对俄罗斯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明显：财富将累计增长 0.5%，而实际GDP将增长 0.2%。这既是由于俄罗斯经济的庞大规模，也是因为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的依赖程度低于其对世界其他区域贸易的依赖。削减非关税壁垒的最大受益者，将是机器和设备制造商，因为该部门与非关税壁垒相关的成本最高。^①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相互贸易趋势

一般来说，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出口额的变化，反映了过去几年其经济形势的恶化，特别是碳氢化合物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除此之外，在 2014–2015 年，金融市场不稳定（“货币持续贬值”）对于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2015 年，各国相互贸易指标下降幅度最大，当年欧亚经济联盟出口总额 454 亿美元，按美元计价仅为 2014 年数额的 74.2%。2016–2017 年，贸易额已大幅回升（参见表 2）。

尽管成员国之间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贸易结构却有了质的改善。例如，欧亚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百分比，从 2014 年的 12.3% 增加到 2015 年的 13.5%。^②我们还注意到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平衡情况的变化。例如，白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贸易逆差，从 2011 年的 104 亿美元降至 2015 年的 62 亿美元，而且这一趋势似乎是可持续的。然而，有时确实会发生强烈的短期波动。2014 年俄罗斯卢

① 参见 E. Vinokurov, et al,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ducing Non-Tariff Barriers in the EEU*, Report, 29.

② 在此处及本文后续提及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贸易及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来源，均为欧亚经济委员会所公布的数据。

布贬值，就在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双边贸易结构中“反映”了出来，并且在短期内加强了哈萨克斯坦作为欧亚经济联盟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①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年，直到哈萨克斯坦将其货币坚戈也置于浮动汇率制度之下（存在很小的时滞）。

表 2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相互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欧亚经济联盟			
出口总额	45 615.7	42 960.3	54 157.2
亚美尼亚			
贸易额	256.2	393.9	555.2
收支平衡	-732.6	-668.7	-751.5
白俄罗斯			
贸易额	11 007.8	11 384.8	13 586.3
收支平衡	-6 199.8	-3 996.4	-6 125.0
哈萨克斯坦			
贸易额	5 120.3	3 930.2	5 118.3
收支平衡	-6 091.3	-5 933.4	-7 123.0
吉尔吉斯斯坦			
贸易额	410.2	447.2	568.0
收支平衡	-1 654.9	-1 178.8	-1 290.9
俄罗斯			
贸易额	28 821.2	26 804.3	34 329.3
收支平衡	14 640.0	12 310.4	16 220.4

资料来源：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就结构而言，矿物产品在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总额中占据最大的份额（2015 年所占比例为 33.4%）。而在各成员国相互贸易总额中，机器、设备和车辆，是第二大商品类别（2015 年比例为 16.4%）。农产品和农业原料贸易，占相互贸易总额的 15.5%。因此，由于非原材料产品在内部相互贸易中占据明显优势，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结构，与其对外贸易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2015 年底，矿物产品出口占对第三国出口总

^① Алпысбаева С.Н., Кенжебулат М.К., Камзин А.А., Каскеев С.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о взаим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внешних шоков и различий в проведении монет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2015. Vol.27. No.2. С.41-51.

额的百分比超过 65%，而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的相互贸易中，这一指标仅为 33.4%。与此同时，2015 年对第三国的粮食和机械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仅为 7.5%，而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相互贸易中，所占比例高达 32%。

相互投资：作为减震器的欧亚经济联盟？

不利的经济条件，不可能不对相互之间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的绝对数量产生影响（2012 年是峰值）。根据监测独联体国家相互投资而获得的数据，截至 2015 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236 亿美元，同比下降 7%（2014 年，这一指标上升了 1%）^①。

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相互直接投资存量的减少，是由于俄罗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减少。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投资项目已经完成，而是 2015 年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在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后对资产的重新估值。然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独联体国家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状况，情况似乎要糟糕得多。

自 2013 年以来，独联体国家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存量一直在下降。最显著的下降出现在 2014 年，独联体国家的相互投资同比下降了 16%，到 2015 年底又下降了 5%。总体而言，尽管全球经济整体状况不稳定，资本从新兴市场外逃，但欧亚联盟成员国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相互投资水平。（参见下图 1）

^① EDB Center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Monitoring of Mutual Investments in CIS Countries 2015*, Report, 32, Saint Petersburg: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5; Кузнецов 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ям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как фактор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4. No.8. С.5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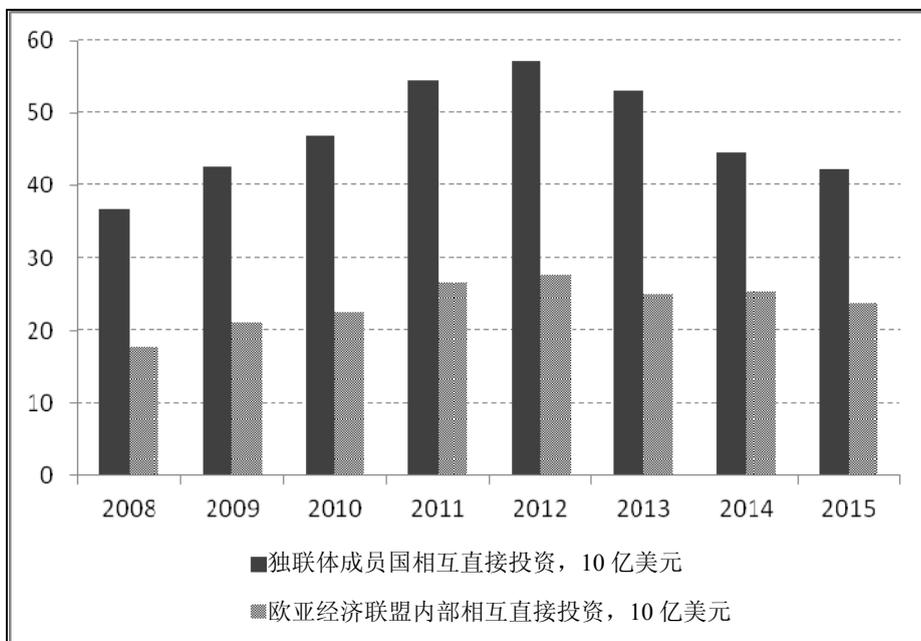


图 1 独联体成员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相互直接投资 (FDI) 存量变化
资料来源: EDB

可以预见的是, 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内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俄罗斯公司在欧亚经济联盟内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超过了 80%。(参见表 3)。

表 3 欧亚经济联盟内相互直接投资 (2016 年)

FDI 接受国	FDI 投资国 (单位: 百万美元)					五国总计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X	3367	204	3	0	3574
哈萨克斯坦	7095	X	34	0	0	7129
白俄罗斯	8297	53	X	10	4	8364
亚美尼亚	3056	8	0	X	0	3064
吉尔吉斯斯坦	811	695	0	0	X	1506
五国总计	19259	4123	238	13	4	23637

资料来源: EDB Monitoring of Mutual Investments.

注: 根据独联体国家检测各国相互投资的方法, 本数据库中只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300 万美元的项目

从总体上看，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相互直接投资，虽然仍由俄罗斯传统的专业化产业所主导，但其部门结构已经相当多样化。俄罗斯的资本投资，主要集中在燃料工业领域（约占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直接投资总额的47%）、有色金属冶金行业（约占18%）和电信行业（11%）。金融与运输行业也获得了较多的投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能够为俄罗斯投资者提供最适宜开展海外业务的各项条件。除了共同的历史和过往的经济联系，地缘上的邻近与语言亲和力等要素之外，正在不断深化的一体化机制建设，也是一个关键的积极因素，这些都确保了各国在商业习惯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是许多俄罗斯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这些公司——至少就目前而言——在大多数生产领域，包括那些高附加值产业，都很少扩张到这一范围（哈、白）之外。

在未来几年，欧亚经济联盟区域的投资流动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是由于乌克兰国内不稳定的局势，欧亚经济联盟在乌克兰经济中的投资份额将下降。另外，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内部互惠关系的积极扩张，也会对投资流向产生影响。欧亚联盟内部一体化的深化，以及单一市场的出现，为企业互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使代表更广泛的经济部门的“第二波”投资者，能够很快创建跨国价值链。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欧亚联盟共同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建立和演变，有助于吸收外部冲击对各国相互投资造成的干扰，从而减轻过去两年经济收缩的负面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能部分缓冲负面影响，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实际协调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对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来说，采取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保证以一致的原则指导经济运行，而且确保各国能够协调各主要经济指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欧亚经济联盟的一项关键发展任务，是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协调，

最主要是货币政策的协调。从长期来看，深化货币政策一体化，通过长期利率下调，实现经济稳定，可能会给欧亚经济联盟的三个较小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欧洲联盟条约规定了以下三个强制性指标（参见表 4）：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通货膨胀率和预算赤字。

表 4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确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指标

宏观经济的量化指标		
中央政府年度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 $\leq 3\%$	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 $\leq 50\%$	各成员国年化通货膨胀率的差值 $\leq 5\%$

资料来源：EAEU Treaty

然而，在这个时候，欧亚经济联盟还没有明确的机制可以用来执行这些标准。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当时，欧元区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部分国家违反了可持续主权外债和预算赤字的标准，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统一财政政策，公共支出无法控制地增长，债务增长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促使人们重新评估额外风险，最终引发了欧元区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欧亚经济联盟可能也将面临类似的挑战。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生效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至少有一个缔约国违反了所有的三项标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长期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但解决办法可能会很复杂：我们需要一种“道义上的劝告”工具，迫使各方的宏观经济政策符合《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规定的基准。

目前，一系列持续性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向更高级别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过渡。包括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过高而且波动较大，经济活动大规模美元化，各成员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体系，以及相互之间汇率的大幅波动。事实上，这些问题将影响欧亚经济联盟未来 5-10 年的发展议程。无论成员国是否需要深化货币政策协调，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使各成员国减少相互贸易的成本和增加贸易量成为可能，并为相互长期投资的可持续增长开辟道路。

在该领域应优先实施的步骤包括：降低那些长期处于类似发展轨道上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美元化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持续高企且波动较大的通货膨胀，使欧亚经济联盟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复杂，因为汇率冲击会对实体经济

产生更持久的影响。高通胀率严重扭曲了货币的传导能力，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率，又促使经济美元化。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一体化联盟遭受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

除了协调货币政策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金融领域还面临其他一些挑战：银行部门自由化、资本账户均衡、证券市场准入自由化以及取消对经纪人和存管业务的限制等。^①

自由贸易区与贸易经济合作协议网络的创建

欧亚联盟启动了一个旨在创建自由贸易区（FTA）网络的进程。2014年，欧亚经济联盟与新西兰本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项目，因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变化的影响而被废止。因此，2015年11月批准的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成为第一个成功案例。2016年，这一进程还在继续推进。

欧亚经济联盟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2015年5月30日，欧亚联盟和越南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一项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协定。除其他常规项目外，协议还规定了适用于在相关国家开展联合生产活动的特别操作程序。

该文件还设想逐步相互开放缔约各方的市场。规定到2015年年底，欧亚经济联盟的平均关税税率将从9.7%降至2%，越南的平均关税税率将从10%降至1%。大约60%的相互贸易头寸的进口税被削减到零。在过渡期结束后，零关税项目的比例将增至88%。俄罗斯联邦经济部预计，到2020年，与越南的贸易额将翻一番（2014年为37亿美元）。

双方签署的这份文件，包含一项针对俄罗斯投资者和服务提供商的特别制度协议。该协议特别允许俄罗斯公司，能够以当地公司所享有的同等条件在越南开展业务。该协议主要适用于联合汽车制造项目以及对发电、交通基础设施和炼油设施的投资。

^① Мишина В, Хомякова Л.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ый валютный рынок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расчет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алютах: мифы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4. No.8. С.41-57.

全球贸易规则正在经历构造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常常对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应该承认，今天的欧亚经济联盟——其国内生产总值接近2万亿美元，人口1.83亿（包括9300万有酬就业人口）——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它仅占全球GDP的2.5%。任何建立“欧亚堡垒”的企图都将是自杀。

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可以化解当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危机呢？

第一，建立一个类似欧亚经济联盟—越南式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潜在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新加坡、伊朗、印度、韩国、智利、泰国、南非和南方共同市场等。（参见表5）

表5 正在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贸易和经济协议工作（截止2018年6月）

正在运行的FTA	越南（签署于2015年11月）
已签订非优惠经济协议	中国（签署于2018年5月）
已签署FTA	伊朗（有限范围，签署于2018年5月，有效期3年）
正在谈判	以色列、印度、新加坡
潜在的候选方（工作团队层面互动、表达兴趣、形成备忘录）	埃及、柬埔寨、秘鲁、智利 蒙古（联合研究小组正在开展共同研究） 韩国（联合研究小组） 新西兰（高级别谈判被取消）

欧亚经济联盟的目标是最终与其最大的贸易和经济伙伴——欧盟和中国——就一项全面的条约展开谈判。只有依靠同欧盟和中国的密切合作，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①它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已经于2018年5月签署了一项非优惠经济协议。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参与中国新的战略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讨论正在进行。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互利合作的前景，无疑将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中亚、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在运输、能源和金融方面正在进行的互动提供强大动力。^②

① E. Vinokurov, A. Libman, *Eurasian Integration: Challenges of Transcontinental Regionalism*, Basing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② S. Karaganov (Ed.), *Toward the Great Ocean 3: Creating Central Eurasia.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priorities of the Eurasian states' joint development*, Valdai Discussion Club Analytical report, Moscow: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une 2015.

例如，欧盟与中国之间的铁路集装箱运输（过境欧亚经济联盟）预计将增加。为了吸引更多的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过境货运，欧亚联盟成员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其运输基础设施，并消除一些障碍。从欧盟到中国的铁路集装箱运输量，已经有了相当大幅度的增长。从 2010 年的 1300 标准箱（TEU，即 20 英尺集装箱）增加到 2016 年的 5 万标准箱以上。2010-2016 年间，从中国到欧盟的过境集装箱运输量，从 5600 标准箱增加到近 10 万标准箱。截至 2017 年底，沿中-欧-中路线过境欧亚经济联盟的集装箱数量，已经达到 26.2 万标准箱，比 2016 年的数值高出 1.8 倍。^①根据我们的估计，按照目前的关税水平，中欧集装箱运输因为“便利性”（即交货的及时性、规律性和准确性）所产生的运输潜力还远未用尽。到 2020 年，集装箱运输总量可能增加两倍（达到 50 万标准箱），每周（定期）的列车发车次数增加 3 倍——达到大约每周 100 次的水平。^②

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受到关注。与欧盟实现深度的经济一体化，对欧亚联盟极其重要。首先，欧盟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欧盟，而俄罗斯则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其次，欧盟可以在欧亚一体化项目中的国家现代化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有鉴于此，欧盟也应被视为欧亚经济联盟关键的长期合作伙伴。^③当然，在目前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危机情况得到缓解之前，我们并不期待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的关系能够有任何快速的进展。

共同劳动力市场：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就

与对商品和服务共同市场的热烈讨论相比，对共同劳动力市场的讨论显

① V. Lobyrev, A. Tikhomirov, T. Tsukarev, E. Vinokurov, “Belt and Road Transport Corridors: Assessment of Trans-EAEU Freight Traffic Growth Potential”,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Report, No.49, St. Petersburg: EDB, 2018.

② Ibid.

③ Евгений Винокуров. Мегасделка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Почему интеграцию Евросоюза 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до обсуждать уже сейчас//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4. №.5. С.189-194.

得有些逊色。然而，这正是欧亚经济联盟取得最切实成果的一个领域。几乎所有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内各相邻国家工人流动的壁垒都被拆除了，而成员国公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现在基本上可供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使用。成员国雇主和那些承包了工作和服务的经济实体，都可以从其他成员国雇用工人，而不必考虑本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限制，也没有许可证制度或配额合规义务。^①成员国工人不需要工作许可证。如果移民工人被“正式”雇用，那么他们的孩子就可以就读幼儿园和学校，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都有强制性的医疗保险。

由于劳动力市场规模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欧亚经济联盟的共同劳动力市场，可能会被证明是促进较小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利的劳动力市场安排，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的长期经济稳定至关重要。^②

虽然上述法规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和阻力，但总的来说，共同劳动力市场已经在发挥作用。在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中，排在首位的是养老金流动这一在技术上极为复杂的问题。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养老金制度。现在各成员国正在制定一项特别协定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批可用统计数据，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运行的成效：2015年，俄罗斯境内的吉尔吉斯斯坦移民工人人数增加了1.6%，而塔吉克移民工人人数则减少了13.7%。

公众舆论

欧亚经济联盟各国广大公众，普遍支持欧亚一体化。欧亚开发银行从2012年启动了一项一体化晴雨表项目，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欧亚开发银行对于各成员国民众开展了广泛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欧亚一体化项目在欧

① Алиев С.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Рамках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2015. Vol.4. No.29. С.65-74.

② D.G. Tarr,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of Russia, Belarus, Kazakhstan, Armenia, and the Kyrgyz Republic: Can it Succeed Where its Predecessor Faile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016, Vo.54, No.1, pp.1-22.

亚联盟各成员国内部获得的支持率，最低为 46%（亚美尼亚），最高为 81%（吉尔吉斯斯坦）。2016 年 5 月至 6 月进行的一项代表性民意调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支持率相当高，分别为 86%、74%、69%和 63%。相反，在亚美尼亚，民众对该国参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支持水平下降到 46%。这可能是调查时恰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升级所导致的，但也可能有其他不同的解释。^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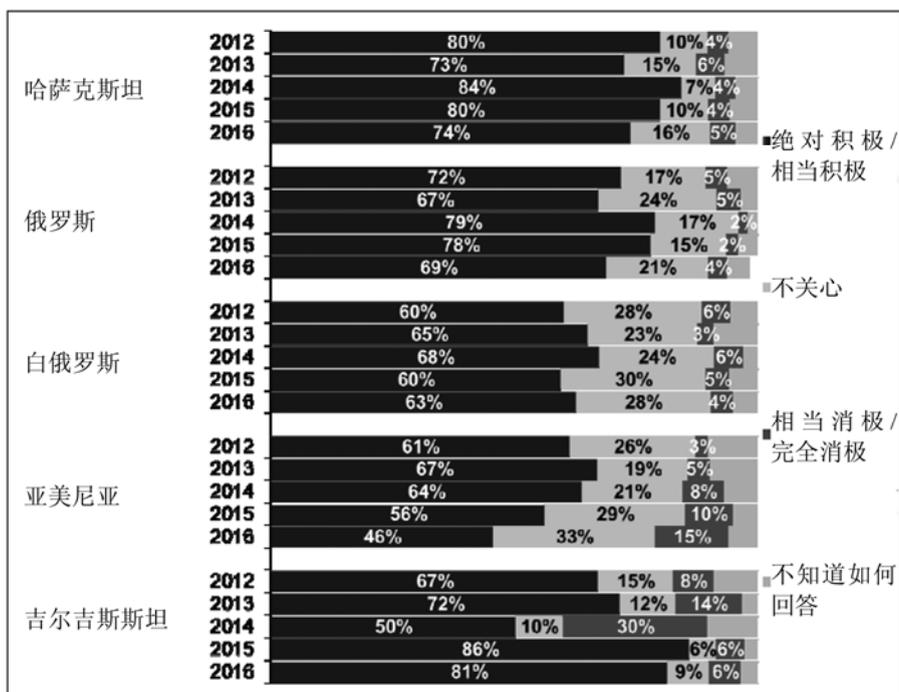


图 2 各成员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公众认知情况的变化（2012-2016 年）

资料来源：ЦИИ ЕАБР (2016).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барометр ЕАБР(пятая волна измерений). СПб.: Центр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ЕАБР, 2016.

注：问题为：五个国家决定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实质上是五个国家的单一市场），你对这个决定是什么态度？

① EDB Center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DB Integration Barometer – 2016 (Fifth Wave of the Survey)*, Report 40, Saint Petersburg: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6.

对这些数字的任何解释，或将这些数字与欧洲晴雨表数据进行的任何比较，都应考虑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人们确实支持欧亚一体化的理念。即是对年轻一代（18-30岁）给出这样的评价也是可信的：他们对欧亚理念的支持程度低于老一代人，但绝对值仍然相当高。然而，也必须指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国人民，对于欧亚联盟表示出“提前”的支持，重点是支持这一理念，而不是这一理念的实际执行（至少目前如此）。在欧盟内部，欧洲晴雨表的数据要温和得多，基准的支持率在50-55%的范围内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人必须要考虑欧洲一体化项目具体的长期现实前景。尽管如此，各国民众总体上对欧亚一体化所持的支持态度，为实施一体化政策创造了一个普遍积极的背景和可靠的信誉储备。

结 论

欧亚经济联盟是后苏联空间出现的一个新的现实政治实体。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估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遭遇到的阻碍。虽然把它与欧盟进行直接比较可能会产生误导，但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欧亚经济联盟。在这方面，它可与其他一般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特别是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锥体共同市场^①、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南非关税同盟——相媲美。

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并不是一个值得在教科书中引用的完美的“成功故事”。在经历了快速成长的初始阶段后，到2016年它可能已经触及到了短期内机制发展的上限。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突破这一上限。另一方面，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已经证明了其未来可能获得更大发展。它的创始条约及依据条约所创设的各种机制，正在发挥作用，共同的劳动力市场也运行良好。在制定共同技术法规方面，欧亚经济联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迄今已最后确定36项此类法规）。通过实施这些领域的现有规划，和采取一些

^① 关于南锥体共同市场（MERCOSUR）的相关情况可参见：L. Gómez-Mera, *Power and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3. 该书讨论了该组织内部持续不断的贸易冲突，今后几年欧亚经济联盟也可能会遇上类似问题。

更专业化的措施（例如，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农业和工业综合体、劳动力市场、单一养老金空间以及研究和教育合作），将最大限度地释放一体化效应的影响。

目前，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最佳认识，是将其看作一个具有丰富附加议程的运行良好的关税同盟。它所取得的成功和所遇到的发展障碍，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欧亚经济联盟的结构特征，实际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经济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是它的特征吗？南非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中的分量甚至更大；美国则主导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原材料占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是它的特征吗？石油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意义更大；南锥体共同市场的出口内容也明显偏向于原材料。联盟内部新出现的贸易和经济冲突是它的特征吗？南方共同市场、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历史中，都充斥着这种冲突。总之，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就和局限性都是“正常的”。^①

欧亚经济联盟的出现，对于企业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在五个成员国的领土范围内，已经建成了一个共同市场——这一市场的存在使得区域内的人们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工作。尽管欧亚经济联盟的运作机制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但它已经成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共同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发展路线图。

我们在文章中各种讨论所涵盖的主题，与欧亚经济联盟近期（大约未来5年）几个非常重要的议程名目是一致的：

首要任务，是继续完成创建商品和服务的共同市场与取消现有豁免权的工作。在这样做的时候，保持各国在共同关税方面的一致性，并且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项任务，是继续有条不紊地消除或统一现有的数百项非关税壁垒——从商品认证规则到特殊进口商地位的确认。

第三项任务，是有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如果没有这种协调，新生的一体化联盟的“经济结构”可能会瓦解。

^①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E.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asing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ch.6.

最后，建立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和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是必要的，特别是与两个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签署贸易协议更为重要。首先是中国，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政策可以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协调一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通过谈判促进双方在大型基建项目上的共同立场。第二个关键伙伴是欧盟。但在目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唯一方案是开展初步的专家评估。双方的关系只有在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翻译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Abstract】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current resul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On the one hand, the EAEU has not been an impeccable “success story”. The EAEU’s progress has slowed after initial rapid progres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chieved much. The EAEU is best viewed not as an exception to general rule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ut rather as a functioning customs union with its own successes and stumbling blocks, enriched by several additional quite developed area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ate of Eurasian institutions, the single market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he state of mutu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among member states, ongoing work to eliminate non-tariff barriers, problems pertaining to th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progress toward establishing an EAEU network of free trade areas, the state of the common labor market, and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relative to Eurasian integration in the five member states.

【 Key Words 】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ur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Customs Un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Текущ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ЕАЭС) требуют оценки.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не является безупречной «историей успеха». После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б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ынешни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медлились. С другой же стороны, очевидны 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наиболее разум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не как исключение из общих правил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а как функционирующий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Данный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не только постоянн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ует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у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созданных странами с развит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и уже добился в этом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успехов, но он также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о многими препятствиями на пути сво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текущее развит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строение единого рынка товаров и услуг, взаимные торговые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е потоки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членами, работа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нетарифных барьеров и эффективная координация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огресс в создан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сети зон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общего рынка труда и динам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пя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по вопросам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责任编辑 刘军)

欧亚经济联盟：进展与挑战*

王志**

【内容提要】欧亚经济联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面临诸多挑战。基于区域一体化理论，可以将欧亚经济联盟区分为经济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和身份一体化三个维度，以深入、系统地探析该组织。经济一体化维度，欧亚经济联盟处于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之间，进一步深化面临不少困难；制度一体化维度，欧亚经济联盟在国家和超国家之间徘徊，本质上仍然采取协商决策模式，缺乏制度创新；身份一体化维度，成员国对于欧亚主义有不同观点，关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标，撕裂了身份建构，难以实现行为体性。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在区域一体化的三个维度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对其未来发展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欧亚区域一体化 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851.2; F12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6-0027(32)

引言

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当今世界两大发展趋势。区域一体化发展迅速，形成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中亚一体化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作用研究”(项目批准号: 17XJAGW001)、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中亚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 16JK1618)、西安外国语大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动研究”(项目编号: 17XWZD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 王志,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了以欧盟、北美和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解体后，后苏联地区国家在不断探索区域一体化道路的过程中历经曲折。2015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成立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开启了欧亚大陆一体化的新征程。鉴于欧亚大陆区域一体化大多以失败告终，学者们对欧亚经济联盟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探析它超国家一体化的独特之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但是，大多数研究要么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认为俄罗斯区域一体化政策带有浓厚政治色彩，以恢复它在欧亚大陆的统治地位，忽略了区域内国家对经济一体化的诉求；要么立足于政策分析，探讨一体化及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效果，缺乏理论思考，亦未能阐述清楚政治与经济间的辩证关系。^①

本文从区域一体化理论出发，以经济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和身份一体化为切入点，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效果、地区制度设计和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地区身份塑造与难题，以克服欧亚经济联盟研究中割裂政治与经济互动造成的片面性、局限性，形成对它的系统认知，包括现状与趋势、进一步一体化的困难所在等。区域一体化概念可从“区域”和“一体化”两个层面辨析。一方面，随着地区主义理论的进展，区域（region）概念的界定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旧地区主义时期，学者们往往注重区域的地理因素，约瑟夫·奈认为，区域立足于地理，形成相互依赖，促使某些国家（行为体）

① 相关文献见：Pablo Podadera Rivera and Anna Garashchuk,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rospec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or Just Geopolitical Project?”,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2016, Vol.7, No.2;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Deals, Rules and the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2017; Felix Hett and Susanne Szkola ed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alyses and Perspectives from Belarus, Kazakhstan, and Russia*, G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5; 徐洪峰：“欧亚经济联盟建立的背景及未来发展”，《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3期；王海滨：“论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前景”，《国际论坛》，2015年第5期；顾炜：“欧亚经济联盟的新动向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李自国：“欧亚经济联盟：绩效、问题、前景”，《欧亚经济》，2016年第2期；Журавлева Г.П., Манохина Н.В., Самохина Е.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рейтинговая оценка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членов ЕАЭС// 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7. No.10; Винокуров Е.Ю., Цукарев Т.В. Экономика ЕАЭС: повестка дн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2015. Т.29, No.4; Лагутина М.Л. ЕС и ЕАЭС: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алиях//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ое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ние. 2015. Т.83. No.11.

密切联系在一起。^①新地区主义出现后，它反对旧地区主义的理性主义立场，注重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区域概念，认为它并非客观实在（reality），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话语建构的过程。^②另一方面，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一体化（integration）是指将两个及以上事物连接起来的行为或过程。据此，区域一体化可理解为，基于社会实践，某一区域内单元统一（unification）的过程或行为。第一，区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一体化是区域构建的过程；第二，区域一体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迁，呈现出一体化与去一体化的趋势与状态；第三，从类别来说，区域一体化可区分为经济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和身份一体化。^③

首先，经济一体化体现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认为市场规模扩大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因而自由贸易具有合理性。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随后的西方经济学中，学者们进一步分析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线性路径：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发展到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仅仅关注到成员国间协商消除关税和数量限制（国际贸易术语，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形式，指某一国（地区）在一定期限内规定某种商品进出口数量的行政措施），关税同盟要求统一对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经济共同体提出生产要素，包括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经济联盟则需要协调成员国间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乃至于实现货币统一。

其次，制度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层面，涉及区域内部公共产品的供给，其动机可能来自于经济一体化的外溢效应。例如，当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经济共同体后，要求协调国家间各项政策，构建区域层面的制度实体，以减少国家间合作的交易成本。当然，区域制度一体化的动机也可能来自于区域公共问题，包括管理地区安全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等。在西方的知识话语中，制度设计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人的自私性会导致

①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p.vii.

② Luk Van Langenhove, *Building Regions: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Order*,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pp.65-66.

③ Luk Van Langenhove, *Building Regions: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Order*, p.99.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缺失，需要强大的制度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很好地论证了这一点。区域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制度一体化存在着跨政府和超国家两种模式。前者建立在国家间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完全契约，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制度自主性较弱；后者立足于国家间主权分享，形成超国家实体，制度自主性较强。^①从目标上看，西方区域一体化理论指出，超国家制度应该是区域发展的最终目标。研究区域主义的学者赫特（Björn Hettne）和索德伯姆（Fredrik Söderbaum）采取地区性概念来描绘制度一体化程度。他们认为，从低到高，地区性依次呈现为地区空间、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和地区制度组织。^②

最后，身份一体化承接经济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体现出功能外溢到身份建构的逻辑。根据功能主义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向政治领域外溢，形成区域超国家实体。实际上，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说，超国家实体并非区域一体化的最终目标。相反，它基于区域身份认同，目标在于塑造区域的行为体性（actorness），即区域一体化的外向性，通过解体主权国家，实现新的超国家形态，影响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③当然，区域一体化对区域行为体性的塑造，建立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和身份构建基础上，如果没有强大的内部行为体身份，则谈不上外部行为体性的构建。^④基于对身份一体化的考察，地区主义学者关注区域间主义，并特别注重欧盟是如何扩散正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影响世界上其他区域的一体化进程的。例如，东亚区域一体化就呈现出非正式性、弱制度主义和协商一致决策等特点。但是，随着欧盟对东盟的规范扩散，东盟也逐步学习欧盟的经验，向正式的区域主义方向发展。^⑤

① 王志：“比较地区主义：理论进展与挑战”，《国际论坛》，2017年第6期，第56-62页。

② Bjö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 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28-29.

③ Luk Van Langenhove, *Building Regions: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Order*, p.116.

④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117.

⑤ Laura Allison, *The EU, ASEAN and Interregionalism: Regionalism Support and Norm Diffusion Between the EU and ASEA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一、经济一体化：纸面一体化到欧亚经济联盟

经济一体化维度，欧亚经济联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也面临进一步深化的困境。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逐步摆脱欧亚“纸面一体化”的宿命，部分实现了共同市场；另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经济整合的效果有限，成员国对经济一体化的继续深化持怀疑态度。

（一）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展

苏联解体导致欧亚大陆分裂，随后开始了重新整合之路，独联体是第一次尝试。作为一种地区组织，独联体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不带有超国家性质，也不将联邦国家作为其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它从自由贸易区开始，致力于形成共同的经济空间，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工的自由流动。但是，独联体没有实质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原因显而易见：独立之初，后苏联地区国家的去一体化趋势远远大于一体化。当然，作为地区组织，独联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实现了后苏联地区国家间的“和平分手”（civilized divorce）。^①同时，1995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关税同盟条约，呼吁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然而，20世纪90年代欧亚地区强大的离心倾向，使得关税同盟条约从未真正实行。^②

关税同盟失败后，1997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签署了一体化条约，主张建立超国家机构，实现经济和政治的联合。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俄-白联盟有成功之处，提升了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在经济领域，它无法有效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达成税收分配原则，因而基本上是失败的。^③1998年金融危机驱动了新一轮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2000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欧亚经济共同体在决策上引入加权投票原则和退出机制。它未实现

① Mikhail A. Molchanov, *Eurasian Regionalism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outledge, 2016, p.2.

② Evgeny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3.

③ Alena Vieira, “A Tale of Two Unions: Russia-Belarus Integration Experience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16, Vol.32, No.1, pp.1-12.

预期目标，却也不能说完全失败，至少为后来的欧亚经济联盟积累了经验。

在俄罗斯主导区域一体化的同时，中亚国家也开始探索一体化道路。1993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中亚联盟。1998年，塔吉克斯坦加入中亚联盟，随之该组织改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2002年，该组织进一步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俄罗斯采取“楔子”战略，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将其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中亚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失败。总之，欧亚区域一体化的实践体现出欧亚国家较为重视主权，尽管达成了一体化协议，却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很难执行下去，被学者称为“纸面上的一体化”。^①对于欧亚区域小国来说，俄罗斯权力太大，使得它们不愿意实质性地参与到一体化当中。同时，它们又不愿对俄罗斯倡导的区域一体化持反对态度，口头上支持俄罗斯提出的一体化战略，能换取俄罗斯对它们的支持，获得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亚国家深受其害，以俄罗斯为主导，欧亚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区域一体化。2009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内成立三国关税同盟。2012年，三国关税同盟发展为经济共同体。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成员扩展到5国。虽然取名为欧亚经济联盟，实质上处于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之间。为了实现经济联盟，形成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自由流动，欧亚经济联盟设立了不同种类共同市场的时间表。按照预定计划，2017年应达成共同药物和医疗产品市场（没能按照预期目标实现，推迟至2025年）、2019年形成共同电力、2022-2025年建构共同金融和2025年确立石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共同市场。^③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现状与问题

欧亚经济联盟的基础是关税同盟，核心是共同关税区。在关税同盟内部，

①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Framing the Analysis”, in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 eds.,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aw, Policy and Politics*, Edward Elgar, 2013, p.10.

② Alexander Libman and Evgeny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12, pp.41-45.

③ Evgeny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77.

除了保护条款 (safeguards)、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外, 成员国之间不得采取关税和经济限制措施, 阻碍贸易自由化。但是, 关税同盟并未涵盖所有商品, 成员国可自行排除某些关税细目。随着成员国加入WTO, 成员国关税豁免数量逐步增加。2015 年底, 哈萨克斯坦加入WTO, 其关税豁免数量从 1347 个增加到 2016 年底的 1914 个。亚美尼亚的关税豁免数量是 777 个, 吉尔吉斯斯坦为 169 个。在五个成员国中, 仅有白俄罗斯不是WTO成员。关税区内统一征收关税, 根据各国预算比例进行分配, 俄罗斯可获得统一征收关税的 85.32%, 哈萨克斯坦为 7.11%, 白俄罗斯为 4.56%, 吉尔吉斯斯坦为 1.9%, 亚美尼亚为 1.1%。^①

尽管 2010 年形成三国关税同盟, 2015 年成立欧亚经济联盟, 但是成员国仅仅在商品贸易方面实现了统一和降低关税, 没有涉及非关税领域, 其谈判进展缓慢。从运行情况来看, 商品贸易是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构成要素。从表 1 可看出: 2015 年, 欧亚经济联盟贸易量为 6196 亿美元, 2016 年为 5523 亿美元, 相比下降 10.8%。内部贸易方面, 2015 年,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量为 456 亿美元, 2016 年为 425 亿美元, 同比下降 6.7%。从比重上看, 2015 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 10.9%, 2016 年占比为 12.1%。从贸易结构来说,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中, 2016 年, 矿产品占最大份额, 比重为 27.1%, 其次是机械、设备和车辆, 占比 17.5%, 再次为食品和农业原料, 占比 16.1%。2016 年, 欧亚经济联盟与外部贸易的结构中, 矿产品占出口的 60%以上, 食品和机械占向第三方出口额的 9.7%。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商品出口相加, 占了联盟总量的 90%, 进口占了 70%。这从侧面说明, 欧亚经济联盟对于白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 其GDP仅占联盟的 4%, 却占了联盟四分之一多的出口量和三分之一多的进口量。在外部贸易中, 欧盟是欧亚经济联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6 年, 与欧盟的贸易占欧亚经济联盟贸易额的 46.5%, 其次是APEC国家, 占比 31.5%。^②

① Ишханов А.В, Елена Ф. Л. Гармонизация Налоговых Систем Стран Еаэс В Условиях Углуб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естник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3: Экономика. Экология. 2017. Т.41. No.4.

② ЕЕС,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 Library of Eurasian Integration, 2016.

表 1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外贸易量（2015-2016 年）

指标	2015 年（十亿美元）	2016 年（十亿美元）	2016 年相比 2015 年变化百分比
区内贸易量	45.6	42.5	-6.7
区外贸易量			
出口	373.8	308.4	-17.5
进口	205.5	201.3	-2.0
区外贸易总量	579.4	509.8	-12.0

数据来源：EDB,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alytics & Projects of the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2017.

其次，共同市场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欧亚经济联盟为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提供了诸多便利，而且成员国间具有相似的历史、经济、地理和语言联系，彼此保持了相对较为稳定的投资水平。2016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相互投资为 268 亿美元，比 2015 年增长了 15.9%。俄罗斯接受联盟内部直接投资提升了 77%，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50 亿美元，白俄罗斯为 86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为 82 亿美元。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俄罗斯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占联盟内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78% 以上。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占联盟内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13.5%。白俄罗斯排名第三，占联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 7.8%。俄罗斯的传统产业是石油、天然气，以及有色金属。根据欧亚发展银行统计，2017 年初，这些行业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的 43.8% 和 10.9%。其次是通信和 IT，占 9.6%，化学品为 8.1%，金融为 6.1%，运输为 4.2%，农业和食品为 3.7%。（见表 3）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最大的 25 家俄罗斯公司占总投资额的 71%。俄公司实施的 25 个最大项目，占欧亚经济联盟相互直接投资总量的 61%。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第二大资本输出国，截至 2016 年底，它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为 36 亿美元，主要投资对象是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投资领域方面，农业和食品占 20.8%，旅游占 19.7%，交通运输占 19.1%。但欧亚经济联盟内部与外部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并不协调，联盟外部国家对联盟内国家直接投资额远远大于联盟内部国家相互对外直接投资额。^①

^①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Monitoring of Mutual Investments in CIS Countries 2017*,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表 2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对外直接投资（2016 年）

接收国	投资国（单位：百万美元）					总量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X	3,367	204	3	0	3,574
哈萨克斯坦	7,095	X	34	0	0	7,129
白俄罗斯	8,297	53	X	10	4	8,364
亚美尼亚	3,056	8	0	X	0	3,064
吉尔吉斯斯坦	811	695	0	0	X	1,506
总量	19,259	4,123	238	13	4	23,637

数据来源：EDB,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alytics & Projects of the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2017.

表 3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双边投资领域百分比（2016 年）

投资领域	所占份额 (%)
石油和天然气	43.8
有色金属	10.9
电信和 IT	9.6
化学品	8.1
交通与基础设施	7.8
金融	6.1
农业与食品	3.7
其他	10

数据来源：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Monitoring of Mutual Investments in CIS Countries 2017*,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最后，欧亚经济联盟形成了共同劳动力市场。世界区域组织中，仅有欧盟达成单一劳动力市场协议，欧亚经济联盟是第二个。根据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成员国工人有权在联盟内任何国家工作，本人及家庭可以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福利，子女教育等；成员国不得采取限制措施来保护劳动力市场，除非因为国家安全或者公共事务的需要；联盟内部，成员国相互承认教育文凭，不需要额外的程序和文件，但是教育、法律、医疗和制药领域是例外；联盟条约也规定劳工移民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缴纳税收，尊重文化传统。2016 年，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规定了养老金支付程序，使得劳务移民在达到退休年龄并返回家乡后可以获得养老金。在欧亚经济联盟内，由于贫困，缺乏就业机会，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存在大量的劳务移民。根据欧睿国际（Euromonitor）统计，苏联解体后，有超过 100 万亚美尼

亚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其中 70%到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亚美尼亚失业率为 18%，吉尔吉斯斯坦为 7.6%。这两个国家贫困人口也很多，吉尔吉斯斯坦有 32%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月收入，吉尔吉斯斯坦为 207 美元，亚美尼亚为 393 美元，白俄罗斯为 361 美元，哈萨克斯坦为 416 美元，俄罗斯为 549 美元。^①

表 4 在俄罗斯的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劳工移民汇款额
(2014-2016 年)，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年份	汇出数额	汇入数额
亚美尼亚	2014	1416	1550
	2015	682	941
	2016	346.2	711.4
吉尔吉斯斯坦	2014	2026	2062
	2015	1083	1383
	2016	976	1742.5

数据来源：Central Bank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ross-Border Transfers of Individuals, 2017. <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Default.aspx?Prtid=tg>

注：汇出数额是指该国劳工移民从俄罗斯汇出的金额；汇入数额是指该国居民接收的外国总汇款金额。

根据俄罗斯内务部统计，2016 年，吉尔吉斯斯坦有 82 万人、亚美尼亚有 63 万人、白俄罗斯有 34.5 万人、哈萨克斯坦有 54.5 万人在俄罗斯登记为劳务移民。^②根据世界银行 2014 年的统计，移民工人汇款收入占吉尔吉斯斯坦 GDP 的 30%，占亚美尼亚 GDP 的 19.1%，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③根据欧亚发展银行统计，2015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汇款金额下降到 GDP 的 25.7%，亚美尼亚下降到 15.5%。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卢布贬值，影响了劳务移民的收入。^④

① Evgeny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89.

②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сведен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12 месяцев 2016 года с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м и регионам. 30 Января 2017. <https://xn--b1aew.xn--p1ai/Deljatelnost/statistics/migracionnaya/item/9359228/>

③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1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0093>

④ EDB,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alytics & Projects of the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2017.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的困境

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却面临困境。首先，2025 年达成完全共同市场的计划面临诸多挑战，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第一，关税方面，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后，关税下降程度有限。欧亚经济联盟的统一关税率在 6.5%–6.7%，并为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设置了过渡期，前者过渡期到 2020 年结束，后者则到 2022 年结束。相比之下，欧盟平均关税为 2.7%，美国是 2.2%。^①第二，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时，成员国同意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建立药品和医疗产品共同市场。然而，成员国对于药品制造商规则、医疗产品认证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2016 年 11 月 16 日，欧亚政府间委员会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共同药物市场启动和全面运作统一文件^②，放弃快速实施药物和医疗产品共同市场，规定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药品制造商有权选择在某个国家注册药物；而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根据国家规则注册的药物，必须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根据联盟统一规则重新注册。第三，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规定 2019 年形成统一的电力市场，但成员国间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现有关于统一电力市场的文件包括：2015 年 5 月批准的欧亚经济联盟共同电力市场框架和 2016 年 10 月批准的构建欧亚经济联盟共同电力市场计划，两个文件均要求在 2019 年 7 月之前实现集中电力贸易。第四，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规定 2022–2025 年设立超国家机构，实现共同金融市场。然而，一方面，联盟对共同金融市场的讨论并未涉及单一中央银行和共同货币问题，说明成员国间彼此还存在着不信任感；^③另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 2017 年就形成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共同金融市场框架”路线图，批准了“协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金融市场立法协定”，但是由于共同金融市场复杂多变，成员国对监管较为敏感，达成

① 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А.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ЕАЭС в условиях ВТО//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2017. Т.18. No.9

② Unified Documents Necessary for the Launch and Full Operation of the Common Drug Market within EAEU

③ Evgeny Vinokurov et al., “Customs Unions, Currency Crises, and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Case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 2017, Vol.3, No.3, pp.280-295.

一致的难度较大。^①第五，欧亚经济联盟计划 2025 年实现石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共同市场。目前，欧亚经济联盟已经达成框架路线图：关于石油和石油产品共同市场建设，欧亚经济联盟计划 2016-2017 年制定计划，2018-2023 年实施计划，2024 年实现共同石油和石油产品市场；关于天然气共同市场建设，欧亚经济联盟计划 2020 年形成天然气监管的立法协调，2021 年形成多个商品交易所，2025 年最终建成天然气共同市场。但是，欧亚经济联盟中，有的是能源大国，有的是能源运输过境国，彼此之间立场差异较大，注定谈判是艰苦的过程。^②

表 5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基本情况（2016 年底）

	领土（平方公里）	人口		GDP		人均 GDP 美元
		（百万）	占比（%）	十亿美元	占比	
俄罗斯	17,075,400	143.4	80%	1268	87%	8,838
哈萨克斯坦	2,724,900	17.9	10%	128	9%	7,138
白俄罗斯	207,600	9.5	5%	48	3%	5,092
亚美尼亚	29,743	3.0	2%	11	1%	3,596
吉尔吉斯斯坦	199,900	6.1	3%	6	0%	956

数据来源：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17),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908481507403754670/Annual-Report-2017-WBG.pdf>

其次，欧亚经济联盟中，俄罗斯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它面临内外困境，联盟发展动力不足，成员国获得的经济效益有限。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在领土、人口和经济规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俄罗斯是最大的国家，领土面积是最小的亚美尼亚的 574 倍，国内生产总值是其 170 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其他四个国家之和的 6 倍。人口方面，四国人口总和为 4200 万，俄罗斯人口约 1.44 亿。（见表 5）由于俄罗斯的巨大优势，其他成员国担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是俄罗斯，对自身构成威胁。^③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自身经济发展有限，制约了欧亚经济联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

① E.A. Zvonova et al., “On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the EAEU Common Financial Market”, *Digest Finance*, 2018, Vol.23, No.1, pp.81-89

② Evgeny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p.77-80.

③ Golam Mostafa, Monowar Mahmoo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8, Vol.9, No.2, pp.1-8.

一方面，成员国经济模型类似，彼此缺少比较优势，贸易存在竞争性，限制了经济一体化进展。欧亚经济联盟中，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是资源丰富型国家，工业专业化分工不明显，制造业商品出口有限，导致区域内贸易难以成为地区发展的驱动力量，基本出口初级商品，难有机会发展服务和高技术、科技密集性产品贸易。资源型产品占俄罗斯GDP的11%，哈萨克斯坦的15.5%，也分别占其出口的66%和63%。^①而且，白俄罗斯的经济也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石油加工占其制造业产出的一半以上。当然，结构同质性也有优点：有助于推进一体化，原因在于成员国可以设立共同的技术目标，如电力基础设施、交通和通讯共同市场等。^②

另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对成员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限，各国GDP增长率不高。由于俄罗斯经济危机、卢布贬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影响了哈萨克斯坦经济，迫使哈方不得不采取货币贬值的措施，哈坚戈2014年贬值19%，2015年贬值23%。哈萨克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贸易不升反降，而与中国贸易量持续上升，2014年增加了20%，达到224.2亿美元。^③随后由于能源价格下跌等因素，中哈贸易量有所下降，2016年下跌到130.93亿美元。^④白俄罗斯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获得了一定的好处，例如取消关税后，白俄罗斯以每吨约30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每1000立方米天然气平均价格为165美元。2012-2015年间，白俄罗斯为此获利750万美元。但是，白俄罗斯能源完全依赖俄罗斯，失去了其在欧亚经济联盟市场之外出口石油产品的定价能力。^⑤自加入欧亚

① Roman Vakulchuk and Alexander Knobel, "Impact of Non-tariff Barriers on Trade withi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ost-Communist Economic*, 2018, Vol.30, No.4, pp.1-23.

② Ksenia Kirkham, "The Formation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How Successful is the Russian Regional Hegemony?",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6, Vol.7, No.2, pp.111-128.

③ Roman Vakulchuk and Alexander Knobel, "Impact of Non-tariff Barriers on Trade withi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p.1-23.

④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哈萨克斯坦（2017年版）”，<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712/201712290849033.pdf>

⑤ Casey. Michel, "Russia-Kazakhstan Relations Took a Dive in 2014 beyond the EEU Photo-ops, Relations are at their Lowest Point in the Post-Soviet Era", December 20,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12/russia-kazakhstan-relations-took-a-dive-in-2014/>

经济联盟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并没有获得太大收益。^①加入一年之后，其进口降低了 8%，出口减少了 30%，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间贸易降低了 22%，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2.3%。这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内部讨论退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可能性。不过吉国内民众对欧亚经济联盟仍持有好感。根据 2016 年 3 月份的调查，超过一半民众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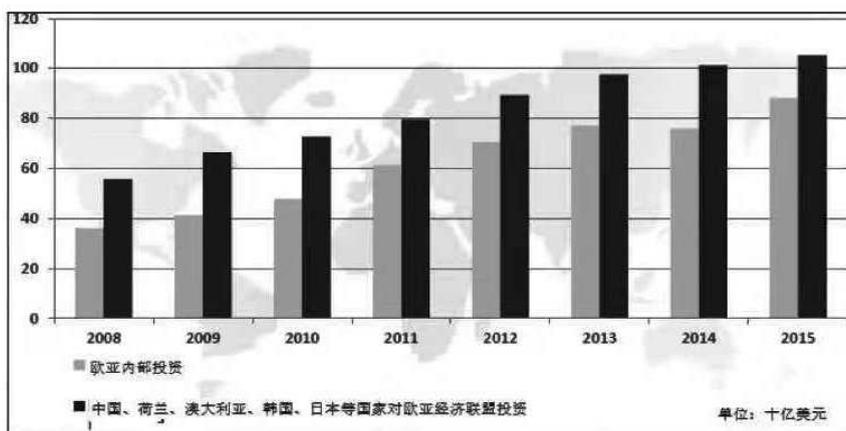


图 1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部与外部直接投资（2008-2015 年）

数据来源：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AEU and Eurasia,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Direct Investments (2016)”,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6.

最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体量较小，难以与外部抗衡，联盟吸引力较弱。在贸易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存在内外贸易失衡，内部贸易远远小于外部贸易额。相比之下，欧盟的主要贸易是在内部展开，占其总贸易额的 64%。^③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直接投资远远小于外部国家对其投

① Черевык К.А. Первые итоги членств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ЕАЭ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Вестник Поволж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7. Т.17. No.4.

② Christopher Schwartz, “Will Kyrgyzstan Leave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Diplomat*, August 09,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8/will-kyrgyzstan-leave-the-urasian-economic-union/>

③ Ricardo Giucci and Anne Mdinardze,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Analysis from a Trade Policy Perspective”, 29 May 2018, https://berlin-economics.com/wp-content/uploads/2018-05-29_Presentation-EAEU_Moscow.pdf

资额。澳大利亚、荷兰、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印度、新加坡、越南、中国、韩国和日本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投资，到 2015 年底上升了 4%，达到 1050 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为 274 亿美元，主要投向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为 210 亿美元，占中国对整个欧亚经济联盟投资的 82%。^①

处于欧亚大陆两侧的欧盟和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产生巨大影响。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日益注重中亚地区，但是俄罗斯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相反，过去几年中，俄罗斯愿意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②而在另一方向，欧盟东部伙伴关系政策旨在吸引后苏联地区国家偏向西方，对欧亚经济联盟的继续扩大构成强大挑战，限制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进一步发展。^③潜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包括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等国。^④俄罗斯一直希望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学者指出，没有乌克兰的参加，欧亚经济联盟将变成一个缺乏竞争力的组织。^⑤对于俄罗斯来说，一方面，乌克兰是客运、货运和能源流动的过境国；另一方面，乌克兰也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区。尽管乌克兰仅仅占俄罗斯出口额的 4.5%–6%，却能够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产品结构多样化。^⑥在乌克兰出口的产品中，制造业占比 41%，包括机械工程、纺织品和基本金属，采矿业占比 27.8%，农业为 23.1%，这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主

①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AEU and Eurasia: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Direct Investments*,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6.

② Alexander Libman and Anastassia V. Obydenkova,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 Strategy of Autocracy: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Russia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Vol.94, No.5, pp.1038-1058.

③ Zhenis Kembayev,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in the Post-Soviet Area and within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26 Oct 2014,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14008

④ Anja Franke, Andrea Gawrich, Inna Melnykovska and Rainer Schweickert, “The European Union’s Relations with Ukraine and Azerbaijan”, *Post-Soviet Affairs*, 2010, Vol. 26, No.2, pp. 149-183.

⑤ Курьлев К.П., Нарышкин В.С., Озинковская Е., Рахимов К.Х.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В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6. Т.16. №.1.

⑥ Наби Зиядуллаев. ЕАЭС: между политикой и экономикой//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4. No.11.

要出口自然资源有显著的差异。^①但是，在当前的局势下，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有可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是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曾在偏向东方还是西方间徘徊。新任总统伊戈尔·多顿（Igor Dodon）实行亲俄政策，2017年4月参加了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元首峰会，2018年摩成为欧亚经济联盟观察员国。塔吉克斯坦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想法。塔吉克斯坦国内劳务移民占总人口的11-16%，大部分流向俄罗斯。因此，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统一劳工市场对塔吉克斯坦有较大吸引力。相反，俄罗斯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塔吉克斯坦经济较弱，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将增大俄罗斯负担，而劳务移民增多又可能引发其国内社会矛盾。^②

二、制度一体化：主权与超主权的博弈

制度设计上，欧亚经济联盟有模仿欧盟的痕迹，试图构建超国家制度。实际上，由于小国不愿意过多放弃国家主权，导致欧亚经济联盟制度的混合性，形成协商一致决策为主，超国家决策为辅的模式，缺乏制度创新。

（一）欧亚区域制度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欧亚区域制度一体化模仿欧盟，开始于欧亚经济共同体，致力于建立超国家制度实体。由于成员国对此存在立场差异，其制度设计并不完全等同于欧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欧亚经济共同体设计了超国家制度，成立了一体化委员会，委员由各国副总理出任，决策采取三分之二多数原则。成员国的投票采取配额制，其份额根据在共同体预算中分摊的比例计算。同时，欧亚经济共同体也成立跨国议会大会，由成员国议会中的议员组成，主要目的在于协调国家间法律政策。议会议员按照比例分配，俄罗斯占28席，

^① N. Reznikova, O. Osaulenko, and V. Panchenko, "Indicator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rientation of Ukraine in the Context of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Export Relations", *Statistics in Transition New Series*, 2018, Vol.19, No.1, pp.119-134.

^② Казанцев А.А., Гусев Л.Ю.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с ЕАЭ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аналитика*. 2018. №.2. С.57-67.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各 14 席，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 7 席。欧亚经济共同体还建立了共同体法院和秘书处。共同体法院总部设在明斯克，职责是处理各类经济争端。秘书处负责一体化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秘书长任期三年，职员按照各成员国在共同体预算中的比例分摊。^①另一方面，欧亚经济共同体制度设计也带有跨国家协商模式，体现在它的最高决策机制方面。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国家间委员会，由国家和政府首脑组成，决策采取协商一致原则，确保在重大敏感事务中，各国仍然具有最终决定权。

随后，三国关税同盟保留了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本制度模式。决策方面，三国存在较大争议。由于担忧俄罗斯在三国中的霸权地位，哈萨克斯坦主张一国一票，而非经济共同体的加权投票原则，一般性事务采取简单多数，敏感性问题协商一致，以降低制度的超国家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仍然主张加权投票原则，俄罗斯可获得其中的 57%，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各占 21.5% 的投票权。一般性事务决策三分之二多数，原则性问题协商一致。最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意见占据上风，关税同盟仍然采取加权投票的规则。关税同盟设立委员会，预算分摊中，俄罗斯占比 57%，其他两家各出资 21.5%，委员配比上，俄罗斯为 11 人，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各 7 人。实质上，由于关税同盟是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产生，两者的边界较为模糊，组织机构具有延续性。

2012 年，随着单一经济空间的形成，组织机构又有一定的调整，其中，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最高决策机构国家间委员会得以保留，更名为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而关税同盟委员会更名为欧亚经济委员会，扩大其在谈判和签署国际协定等方面的权力。^②

① Julian Cooper, “The Development of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 eds.,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aw, Policy and Politics*, p.25.

② Rilka Dragneva,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in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 eds.,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aw, Policy and Politics*, pp.38-55.

表 6 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关税同盟及欧亚单一经济空间组织比较

	最高机构	永久行政机构	议会	法院
关税同盟 (1999 年)	国家间委员会	一体化委员会	跨国议会委员会	无
欧亚经济共同体 (2000 年)	国家间委员会	一体化委员会	跨国议会大会	欧亚共同体 法院
欧亚关税同盟 (2007-2011 年)	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国家间委员会 (关税同盟最高组织)	关税同盟委员会	同上, 没有指定 角色	欧亚共同体 法院 (缩小版)
单一经济空间 (2012 年)	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	欧亚经济委员会	同上, 没有指定 角色	欧亚共同体 法院 (缩小版)

资料来源: Rilka Dragneva,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pp.38-55.

(二) 欧亚经济联盟制度一体化

欧亚经济联盟延续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和关税同盟的制度设计, 但又有局部革新。欧亚经济委员会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是欧亚经济联盟常设的超国家机构, 由理事会和执行理事会组成。早在 2012 年 2 月, 欧亚经济委员会开始运作, 目标在于构建一个超国家的监管机构, 涉及范围包括对外贸易、技术、海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卫生、兽医和植物检疫措施、药品和医疗产品生产, 电力工业和运输行业、劳动力市场, 金融和服务监管, 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利等, 对一体化发展给出具有经济可行性和符合成员国利益的建议。欧亚经济委员会所做的决议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另一类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例如, 委员会可以做出决议, 要求某一成员国废除一项违背联盟法律并侵犯另一成员国利益的决议。2012 年, 委员会曾做出决议, 指出俄罗斯服务采购违背了联盟竞争性条款, 要求俄罗斯增加从白俄罗斯的服装进口。同时, 根据联盟条约附录 1 第 30 条, 成员国有权提出动议, 取消或者修改委员会的任何决定。

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成员由成员国副总理出任, 领导委员会的活动, 管理一体化的进程, 如联盟法规的制定、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等。同时, 理事会有权取消或者修改委员会决定的动议, 当然, 这需要在该决议生效之前, 由理事会成员或者成员国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执行理事会是日常行政管理机构, 成员来自每一个成员国派出的同等数量的官员, 领导委员会中相应的行

业部门。欧亚经济委员会由 24 个具体部门和 20 个咨询委员会构成，为理事会和成员国提出一体化发展建议。同时，欧亚经济委员会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官方代表，有权代表联盟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最后，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决策采取分层制，这可谓其制度创新之处。一方面，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采取一致决策，执行理事会采取多数表决（三分之二多数）机制，但敏感问题需要一致决策。^①

欧亚政府间委员会 (Eurasian Intergovernmental Council) 由成员国政府首脑构成，主要职责是确保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得到遵守，应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的要求，审议在委员会理事会一级决策中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批准联盟的预算草案，考虑成员国提出的取消或者修改欧亚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提案，如有必要，可将此提交到最高委员会。欧亚政府间委员会有权终止欧亚经济委员会中的理事会和执行理事会做出的决议。政府间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如果有必要，可举行特别会议。决策采取“一致通过”为主、“多数通过”为辅原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基本采取“一致通过”原则。

欧亚经济联盟最高决策机构为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 (Supreme Eurasian Economic Council)，由成员国元首构成，负责审议联盟的基础性问题，决定其发展战略和方向。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任何成员国或者欧亚经济委员会主席可提议召开特别会议。与政府间委员会一样，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的议程，由欧亚经济委员会基于成员国建议提出，采取一致决策模式。如果欧亚政府间委员会和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决议有冲突，以后者为主。在权力划分方面，欧亚政府间委员会高于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高于欧亚政府间委员会。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和政府间委员会的决定根据成员国法律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这说明它们的决定并非直接适用于成员国，而需要各成员国采取相关措施，意味着联盟的法律不优于成员国法律。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较为模糊。在最初的讨论中，曾希望联盟法律优于国内法律，但是，由于有成员国反对，联盟条约对此模糊其词。在机构调整中，欧亚经济联盟取消了“欧亚议会”，其监督职能主要由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承担。因此，有学者认为，欧亚经济联盟以“三

^① Evgeny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p.45-50.

委”为决策主体，最终决定权取决于成员国元首间协商一致，是“超级总统制”在国际层面的延伸。^①

欧亚经济联盟法院成立于2012年1月1日，主要任务是解决联盟条约内容和联盟决议的争端，确保联盟和成员国间法律的一致，如联盟内国家对条约的遵守、成员国遵守联盟条约的争端、欧亚经济委员会制定的个别条款是否符合联盟条约、欧亚经济委员会是否忽略了某项条约的审议等。但是，联盟条约没有明确规定它是否有权审查与第三方（如越南，它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实施联盟条约的有关案件。因此，成员国或商业实体如发现此类违反条约的案件，欧亚经济联盟法院将不会提供支持。当然，如有必要，此类案件可提交给WTO来审议。经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同意，各成员国派出两名法官担任欧亚经济联盟法院法官。审理案件时，由两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担任主审法官。欧亚经济联盟法院的法律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第二，欧亚经济联盟内的国际条约，其中一些条约可以追溯到关税同盟时期；第三，欧亚经济联盟与第三方签署的条约。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法院收到6份来自经济实体的案件，2016年收到7份案件，其中三份是对法院判决的上诉。因此，如果仅仅统计新申请人，已经从6人下降到3人。这主要是因为欧亚经济联盟法院能力有限，另外，它还未赢得社会信任。^②由于欧亚经济联盟法院的有效性及能力不足，导致人们对欧亚经济一体化质量产生怀疑。^③

（三）欧亚制度一体化的困境及原因

尽管欧亚经济联盟似乎具有超国家的制度，但是实质上它呈现出混合性特点，使得欧亚制度一体化面临困境。首先，欧亚经济联盟标榜存在超国家制度，以克服国家间合作过程中的欺骗和机会主义动机。但它的超国家性并

① 王晨星、李兴：“欧亚经济共同体与欧亚经济联盟比较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93-112页。

② Ekaterina Diyachenko, Kirill Entin, “The Cour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Russia Law Journal*, 2017, Vol.5, No.2, pp.53-73.

③ Исполинов А.С. Статут Суда ЕАЭС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е Опасений и Сомне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аво. Журнал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6. No.4. С.152-166.

不强，这在其决策原则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①在欧亚经济联盟中，除了欧亚经济委员会外，其他机构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而在欧亚经济委员会中，尽管采取了“三分之二多数”原则，但是所有政治敏感性决策都需要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来决定。这种决策模式体现出它能保证没有成员国接受违背其意志的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控制议题的能力，从而使得各成员国获得名义上的平等地位。在欧亚经济联盟的实际决策中，表面平等和私下影响共存，而真正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机构只能是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同时，尽管欧亚经济委员会被设计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独立机构，但其独立性受到较大限制，难以摆脱成员国对其的影响。例如，在一次决策过程中，如果某一成员国不满意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它可以向政府间委员会申诉，如果还不满意，可以上诉到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因此，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实质性功能，体现在为更高级委员会（政府间委员会和最高委员会）起草草案，也就意味着高层级政治家决定了一体化的步骤和方向。“尽管存在超国家制度，但成员国对于授权较为慎重，各个成员国更注重保护其主权。”^②

表 7 欧亚经济联盟机构及决策模式

	成员代表	决策模式	会议频率
最高级委员会	国家首脑	一致同意	一年一次
政府间委员会	政府首脑	一致同意	一年两次
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	政府副总理	一致同意	每季度一次
欧亚经济委员会执行理事会	专家(任期 4 年)	三分之二多数同意/一致同意	永久机构

资料来源: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zyna Wolczuk,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Deals, Rules and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2017, p.13.

其次，欧亚经济联盟的制度不够完善和规范，所制定的约束政策（binding）效力有待进一步考验。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希望其决策类似于成员

① Бекашев К.А. ЕАЭ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4. No.11. С.14-16.

② Pablo Podadera Rivera and Anna Garashchuk,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rospec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or Just Geopolitical Project?”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2016, Vol.7, No.2, pp.91-106.

国国内法律，具有约束意义。但是，成员国对此意见不统一，使得欧亚经济联盟出台的文件和制定的法规处于尴尬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欧亚经济联盟法院沿袭了欧亚经济共同体法院，而一体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它的功能不足以应付现在的局面。这体现在，一方面，欧亚经济委员会无权将不遵守联盟法律的国家提交法庭审理；另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法院缺乏初步裁决的能力。在侵权案件中，只有成员国可以针对其他成员国违规行为采取行动，而不是欧亚经济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在审查国际协议是否被遵守的情况后，有理由相信其中一方未遵守协议或委员会决定，委员会可通知有关方面。但是，由于欧亚经济委员会需要协商一致决策，导致侵权成员国可以阻止此类决定。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是一种明显的超国家性质的退缩，回归到国际公法的普遍做法。成员国也很少向法院提交申请，因为这是恶意的表现，反而更愿意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彼此分歧。初步裁决能力是指成员国法律体系与地区组织法院合作的法律监管系统。在欧盟，按国家法律终审某一案件时，有关国家有义务向欧盟法院询问。欧盟法院做出裁决后，再提交给成员国法院。这使得国家法院和地区组织法院能统一到单一的法律监管体系中。^①然而，欧亚经济联盟不存在这一制度，导致成员国法院和欧亚经济联盟法院间存在隔离，使得彼此可能做出有冲突的裁决，实践上也难以统一区域内的法律。^②例如，当欧亚经济联盟法院制定人权保护的标准时，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拒绝接受它。由于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果将委员会的规定直接界定为国内法律，或者界定其优先于国内法律的地位，会引发国内法律的宪政问题。总之，在国内法律环境下，正式的“守门者”是成员国，而非欧亚经济联盟。^③

最后，欧亚经济联盟的制度设计模仿欧盟，但这种设计与欧亚地区的规范存在不一致，导致制度效果存疑。研究国际规范扩散的学者认为，欧盟通

① P. Craig, G. De Búrca, *EU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5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33.

② Maksim Karliuk, “The Limits of the Judiciary within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Process”, Work Paper of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2016.

③ Rilka Dragneva,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in Rilka Dragneve and Kataryna Wolczuk eds.,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aw, Policy and Politics*, pp.54-55.

过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进行规范传播。从直接维度来说，欧盟是规范的直接传输者，驱使世界上其他区域行为体接受欧盟的规范；从间接维度来说，由于欧盟的示范效应，使得其他区域行为体主动模仿欧盟。欧盟规范的传播遵循结果和恰当两种逻辑。按照结果逻辑，其他区域行为体接受欧盟规范，是基于理性的计算；按照恰当逻辑，欧盟规范所具有的合法性使得其他区域行为体模仿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是基于恰当逻辑、间接模仿欧盟的结果。^①但是，欧盟制度设计的主要规范是超国家制度建构，与欧亚区域地方规范（尊重主权）不一致，导致欧亚地区制度设计得似是而非。也就是说，本地化是国际规范传播的特征之一，即地区行为体积极重塑外部观念，使其与本地信念、实践相一致。^②在本地化过程中，欧亚经济联盟缺乏制度革新，在国家与超国家间博弈。区域一体化理论认为，在世界三大区域一体化中，欧盟的成功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功能合作及外溢的结果；北美自由贸易区立足于美国霸权，通过完全契约，达到霸权国与小国间的均衡；东盟基于共同身份，形成安全共同体，尽管制度弱小，仍能实现国家间合作。^③欧亚经济联盟超国家制度不强，制度设计呈现出渐进性，采取不完全契约模式，2025年能否达成完全共同市场存疑、集体身份认同存在变数。由于欧亚经济联盟采取正常的（normal）地区主义模式^④，缺少理论创新，地区实践与理念不匹配，发展前景存疑。

① Thomas Risse, “The Diffusion of Regionalism”,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88-100; Ekaterian Furman and Alexander Libman,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Richard Sakwa, *Eurasian Integration---The View from Withi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

②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4, Vol.58, No.2, pp.239-275.

③ Tobias Lenz and Gary Mark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pp.514-517.

④ Evgeny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p.143-153.

三、身份一体化：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欧亚区域一体化历经曲折发展，大多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欧亚国家仍然不断探索区域一体化新路径，这主要得益于它们所形成的欧亚主义身份。然而，欧亚主义本身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词语^①，不同国家对其各种维度的解读，削弱了它对欧亚经济联盟身份整合的意义。

（一）欧亚主义的思想及体现

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在欧亚主义身份基础之上。^②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导致其在向西方和东方发展的道路上摇摆不定，身份认同也存在较大分歧。早在 19 世纪 30-50 年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为此展开了第一次争论，这被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称为“俄罗斯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并引发了其内部分裂，产生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大阵营。^③20 世纪 20 年代，一群旅居欧洲的俄国侨民知识分子从欧亚主义的视角，解读“赫尔岑命题”，形成了早期的欧亚主义思想。他们主张从俄罗斯传统文化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寻找命题的答案，指出俄罗斯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统一。虽然欧亚主义内部存在观点差异，但在立场上是相似的：第一，从特定的文化-地理和社会-历史角度理解欧亚；第二，国家文化传统、价值以及欧亚民众彼此间几个世纪的交流，构建了欧亚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三，采取多元立场理解历史，认为不存在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④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欧亚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两个阵营，其中一方支持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国家建设方案，另一方反对，导致欧亚主义思潮衰落。尽管如此，欧亚主义反映了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文化和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和文化思潮，促

① 万青松：“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3-52 页。

② Наби Зиядуллаев. ЕАЭС: Между Политикой и Экономикой. http://chernoi.ru/images/files/Ziyadullaev/Ziyadullaev_99.pdf

③ 张建华：“欧亚主义的诱惑：从民间思潮到国家战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 年 10 期，第 72-81 页。

④ Valeriy Badmaev, “Eurasianism as a Philosophy of Nation”,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Richard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The View from Within*, pp.33-34.

进了欧亚大陆国家间民众的交往，在欧亚大陆地区存在坚实的根基。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为了在西方和东方寻求自身定位，新欧亚主义思潮出现，其代表性人物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杜金认为，在欧亚主义的基础上革新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不仅要抛弃俄罗斯的去，也要舍弃俄罗斯的现在，清除西方主义的影响，重塑俄罗斯的辉煌。^①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位明确支持欧亚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根据他的观点，哈萨克斯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时期，哈萨克斯坦需要保持历史的延续性，而他认为自己是今天“伟大的汗”，有责任和义务来统治和团结欧亚大陆。^②2011年10月，普京在《消息报》上发表了“欧亚新的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天”的文章，提出在后苏联空间构建欧亚联盟，这既不是希望回到苏联时代，也不是搞欧亚帝国主义，而是在更高层次实现独联体地区经济一体化。随后，纳扎尔巴耶夫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普京的立场表示支持，可视为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的起点。^③但是，由于成员国对欧亚主义存在多元理解，导致欧亚经济联盟身份建构缺乏一致性，使得联盟未来发展方向不确定，从而削弱了它对外行动的能力，即其行为体性。

（二）地缘政治：俄罗斯的动机

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地区主义的含义不同。在欧洲，地区主义起步早，发展较为成熟，它被视为约束国家权力的方式。不同于欧洲，俄罗斯将地区主义视为加强国家主权的手段，增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地区影响力，助力它成为地区权力中心。^④俄罗斯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使其在

① Alexei Podberezkin and Olga Podberezkina, “Eurasian as an Idea, Civilizational Concept and Integration Challenge”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Richard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The View from within*, pp.49-50.

② Ibid, p.50.

③ 李兴：“普京欧亚联盟评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第151-173页。

④ Lara Ryazanova-Clarke, “The Imaginaries of the Eurasian Union: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ost-Soviet Transnationality in Russia and Kazakhs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7, No.247, pp.89-109; Marcin Kaczmarek, “Non-western Visions of Regionalism: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96, No.3, pp.1357-1376; Alexander Libman, “Russian Power Politics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Real and the Imagined”, *Rising Powers*

欧亚大陆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同时，俄罗斯国土广袤，自然资源丰富，这让它具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的能力。一段时间以来，俄国力虚弱，对于一体化动机不强，尽管成立了独联体等地区组织，却发展有限。原因在于俄罗斯认为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没有意义，是它重现辉煌的“包袱”。^①因此，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后，其外交政策偏向西方，优先目标是加入WTO，而非推动和主导欧亚一体化。随着俄罗斯向西政策失败以及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2008年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金砖国家崛起和世界格局中多极化发展，普京二度执政后，将欧亚一体化作为其政策的优先目标，增强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进而恢复俄罗斯昔日辉煌，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②

俄罗斯是欧亚区域的主导性国家，塑造了一体化的模式和方向。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随后成立的三国关税同盟中，俄罗斯要求采取的加权投票原则成为现实。虽然在欧亚经济联盟中，为了吸引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参与，俄罗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以一致投票原则取代加权投票原则，但这种让步恰恰体现出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雄心；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例如，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额中的份额是0.7%，却获得了大约1.9%的关税份额比例。亚美尼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它也仅占联盟对外贸易的0.7%，却获得了1.11%的关税收入。^③总的来说，俄罗斯主导成立欧亚经济联盟，目标是通过超国家一体化，增强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④

Quarterly, 2017, Vol.2, No.1, pp.81-103; Sirke Mäinen, “Russia---A leading or a Fading Power? Students’ Geopolitical Meta-narratives on Russia’s Role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6, Vol.44, No.1, pp.92-113.

① 王维然：《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② Richard Sakwa, “The Age of Eurasia?” in Mark Bassin and Gonzalo Pozo eds., *The Politics of Eurasianism: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Russia’s Foreign Policy*, Rowman Littlefield, 2017, p.203.

③ EDB,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alytics & Projects of the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DB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2017.

④ Sergei Glazyev, “Russia and the Eurasian Union”, in Iotr Dutkiewicz and Rcihard Sakwa, *Eurasian Integration---the View from Within*, pp.85-90; Буторина О.В, Захарова А.В. О научной основ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俄罗斯地缘政治雄心再现与其国内政治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从其国内政治精英的立场来说，存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类。保守主义者认为，后苏联地区一体化是俄罗斯在近邻重构帝国的机会，而自由主义者则希望通过模仿欧盟，形成“欧盟的欧亚化”，重塑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将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视为“零和博弈”，一体化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持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而自由主义者希望一体化促进俄罗斯与欧洲及亚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它有可能成为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桥梁。因此，保守主义者更注重一体化的地缘政治色彩，而自由主义主要关注其经济意义。

当然，基于对俄罗斯欧亚一体化政策文件的分析，难于准确把握哪种观点占据主流。很明显，普京的战略融合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如果对俄罗斯的决策圈进行分析，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各占不同的部门。前者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安全部门，围绕在普京总统周围；后者来自于经济学家和律师，是梅德维杰夫的主要支持者。从实际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保守主义者基本控制了国家外交及国防政策的制定，凸显地缘政治和对安全的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治中不确定性增强，域外大国对欧亚大陆的渗透、颜色革命的发生以及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恶化，使得保守主义在俄罗斯国内决策中的分量提升，自由主义对政策的影响衰退，这也使得俄罗斯一体化战略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体化政策中不再蕴含着自由主义思想，也不意味着保守主义将一直主导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①

（三）地缘经济：其他成员国的需求

欧亚主义是欧亚大陆诸多国家共同的思想观念，在不同的国家，含义存在差异。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政治色彩浓厚，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国家却注重其经济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地缘政治意图，只不过地缘经济

Интеграция. 2015. No.2. С.52-68.

① Andrei A. Kazantsev, “Eurasian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ism: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Rcihard Sakwa, *Eurasian Integration---the View from within*, pp.215-223.

意图更为明显。对于欧亚小国来说，欧亚主义并非以俄罗斯为中心，也并非意味着要树立某种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他们从世俗、社会规范和文化角度理解欧亚主义，目的在于取代苏联时期的规范、价值和文化的角度理解欧亚主义，目的在于取代苏联时期的规范、价值和文化的角度理解欧亚主义，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塑造新的身份认同。^①例如，中亚国家学者主张中亚为欧亚中心，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学者突出里海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世界三大文明的结合点。^②一方面，欧亚国家认识到，它们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存，社会联系密切，且都存在对苏联的历史记忆，俄罗斯主导欧亚区域一体化具有合法性；^③另一方面，欧亚主义要求实现国际和国内不同力量的平衡。对内，由于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欧亚主义将促进它们和平相处。对外，欧亚主义有助于连接东方和西方，平衡俄罗斯的权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

欧亚国家对欧亚主义矛盾而复杂的心态在哈萨克斯坦体现得较为明显。哈萨克斯坦是欧亚主义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它所理解的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的主张不完全相同。首先，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是一种哲学、意识形态，而哈萨克斯坦更注重其经济和对外政策含义；其次，它的欧亚主义并非以俄罗斯为中心，而是立足于哈萨克斯坦；最后，哈萨克斯坦的欧亚主义中包含着向欧洲开放，主张现代化的思想。^④哈萨克斯坦并不认为俄罗斯主导着欧亚一体化。相反，是哈萨克斯坦最早倡议建立欧亚联盟。早在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就已经提出了联合欧亚的思想。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实现欧亚联盟，有助于提升其“软实力”。^⑤当然，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主义思想发生了变化，

① Golam Mostafa, “The Concept of ‘Eurasia’: Kazakhstan’s Eurasian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3, Vol.4, No.2, pp.160-170.

② Farkhod Tolipov, “Are the Heartland and Rimland Changing in the Wake of the Operation in Afghanista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003, No.5, pp.99-107; Victor Shnirelman, “To Make a Bridge: Eurasian Discourse in the Post-Soviet World”, *Anthropology of East Europe Review*, 2009, Vol.72, No.2, pp.68-85.

③ А·利布曼, А·奥贝坚科娃: “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 《俄罗斯研究》, 2017年第6期, 第40-55页。

④ Evgeny Vinokurov, *Introduction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pp.145-146.

⑤ Lyailya Nurgaliyeva, “Kazakhstan’s Economic Soft Balancing Policy vis-à-vis Russia: From the Eurasian Union to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urkey”,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6, Vol.7, No.1, pp.92-105; Bruno S. Sergi, “Putin’s and Russia-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 Hybrid Half-economic and Half-political Janus Bifron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8, Vol.9, No.1, pp.2-9.

不再主张超国家区域一体化，而是认为，欧亚经济联盟是国家之间的联合，目的在于吸引投资、协调金融政策、降低商品价格、促进市场发展和技术革新，从而实现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发展区域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不是为了分享国家主权，相反，它应是增加国家主权的方式。为此，欧亚经济联盟应建立在所有成员国平等的基础上，不区分边缘和中心国，大家遵守共同的规则。在对外关系方面，欧亚一体化应积极与西方国家互动，而非和西方对立。在纳扎尔巴耶夫看来，没有与西方国家间的交流，欧亚区域一体化难以实现哈萨克斯坦的利益，^①最后，哈萨克斯坦的地缘经济目的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地缘政治动机，平衡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尽管普京总统声称，欧亚经济联盟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却也是俄罗斯塑造大国地位的方式。因此，哈萨克斯坦参与欧亚经济联盟，有助于对俄罗斯进行软制衡。^②

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对于欧亚主义的主张与哈萨克斯也存在差异。相对来说，这些国家更为弱小，对俄罗斯的依赖也更深，这使得它们更希望通过一体化来实现其经济利益，获得俄罗斯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援助。白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中获益最大的成员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意味着可以从俄罗斯获得大量的金融和能源资助。^③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较为贫穷的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可以实现其政治-安全利益，对于其完成经济发展目标也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内部面临较为严重的冲突和内乱，与邻国存在边界纠纷，极端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使得它成为中亚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④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有助于其实现国内安全和政权稳定，并从俄罗斯获得有折扣价格的石油和天然气，还可打开其他成员国市

① Берентаев К.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 интеграции?// Central Asia Monitor. 2012.

② Lyailya Nurgaliyeva, “Kazakhstan’s Economic Soft Balancing Policy Vis-à-vis Russia: From the Eurasian Union to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urkey”,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6, Vol.7, No.1, pp.92-105.

③ Golam Mostafa, Monowar Mahmoo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8, Vol.9, No.2, pp.163-172.

④ David Trilling, “Moscow Using New Customs Union to Extend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8 July 2010, <https://akipress.com/news:200141/>; Ryhor Astapenia, “Belarus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View from Minsk”, 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7 Jan. 2015.

场，出口农产品。^①与吉尔吉斯斯坦类似，亚美尼亚希望从俄罗斯获得有折扣的石油和天然气。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因为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存在领土争端，加入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可以维持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提升自身安全。^②

结论

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喜忧参半。经济一体化维度，它摆脱了“纸面一体化”的窠臼，开始了实质性的一体化。然而，从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工自由流动的角度看，还有很大的差距；制度一体化维度，它在超国家与国家间协商决策上徘徊，采取协商一致为主、超国家决策为辅的模式，制度自主性存疑；身份一体化维度，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认同欧亚主义，却有不同解释。俄罗斯偏重地缘政治，而其他成员国偏重地缘经济，导致联盟发展方向不明确，难以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较大影响力。进一步来说，各个成员国想象的与实际运行的欧亚经济联盟存在差异，使得成员国对其期望值下降，国内民众的支持度也受到削弱。^③2016年欧亚发展银行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民众对联盟的态度有所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支持率，从2015年的86%下降到2016年的81%，哈萨克斯坦从80%下降到74%。俄罗斯从78%下降到69%。亚美尼亚从56%下降到46%，仅有白俄罗斯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从60%上升到63%。同时，对联盟态度冷淡的民众数量也有所增加，亚美尼亚为33%，白俄罗斯为28%，俄罗斯为21%。^④不过整体而言，民众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支持和认可程度，还是保持在相当的高位。

① Ryskeldi Satke, “Kyrgyzstan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View from Bishkek”,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5,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kyrgyzstan_and_the_eurasian_economic_union_the_view_from_bis3022

②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Армении. 22.04.2018.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612175>

③ Alexander Libman, “Russia Power Politics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Real and the Imagined”, *Rising Power Quarterly*, 2017, Vol.2, No.1, pp.81-103.

④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EDB Integration Barometer (2016)*,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6.

区域一体化中，经济一体化、制度一体化与身份一体化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制度一体化，而制度一体化将催生身份一体化。另一方面，身份一体化将使得制度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变得更为容易。欧亚经济联盟中，三者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形成半经济与半政治的混合体，阻碍了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①欧亚经济联盟宪章要求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成经济联盟。然而，在制度设计中，欧亚经济联盟超国家性不强，难以约束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非关税壁垒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限制了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尽管成员国都有欧亚主义思想，引导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然而由于俄罗斯注重地缘政治，其他成员国更为关注地缘经济，导致欧亚经济联盟产生身份裂缝和未来发展方向不明确，无法用身份认同弥合成员国间的分歧，放大了制度一体化的困境。由于制度一体化处于国家与超国家间，约束力不强，难以推进经济一体化和身份一体化。因此，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来说，实现三者间的协调，才能促进其深入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强大影响力，实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想象和其他成员国的地缘经济目标，摆脱欧亚区域“纸面上一体化”的宿命。

【Abstract】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spite of many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ould be observed in three lens, respectively economic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 through which it could be explored thoroughly and systematically. As to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EAEU is between a customs union and a common market. It will face quite a few difficulties when being further deepened. As far as its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s concerned, the EAEU is hovering between a country and a supranational country, still in essence adopting a consultative decision-making mode and lack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its identity integration, membe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Eurasianism, paying

^① Bruno S. Sergi, “Putin’s and Russia-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 Hybrid Half-economic and Half-political Janus Biforn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8, Vol.9, No.1, pp.2-8.

attention to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objectives. As a result, its identity has been torn apar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ts subjectivit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EAEU haven't yet formed a benign interaction, which will have bad impacts on the EAEU'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Eur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добился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успехов, но и столкнулся со мног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теор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с целью глубокого 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да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три измер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 интеграц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находится между таможенным союзом и общим рынком, и дальнейшее его углубление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о многими трудностям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находится в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над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использует модель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на основ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где отсутствуют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новац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члены имеют разные взгляды н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бращаю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препятствуя создани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не добился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трёх измерен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что оказывает больш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его будущее развити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亚政治经济

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研究**——起源、特点、变迁与影响***

王林兵 雷琳**

【内容提要】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大多脱生于苏联体制，利用制度转换、民主选举和政治革命等完成了政治身份的转变。他们普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政治身份、深刻的民族主义性、明显的权力依附性和藕断丝连的部族性。这些特性的交织，使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生态，更多地表现出冲突与斗争。政治精英结构，也因此数次流变。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稳定，关键在于政治精英。从精英流通的角度看，培育来自各族群的新生代政治精英，并促使他们向上流通，避免政治精英阶层的固化，对政治与社会的持久稳定至关重要。

【关键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 吉尔吉斯斯坦精英流通

【中图分类号】D736.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6-0059
(30)

*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招标课题：“议会制政体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研究”（项目批准号：XJEDU040316C03）、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子课题“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研究”、新疆地方公派出国留学成组配套项目“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XJDF201321）阶段性研究成果。

** 王林兵，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雷琳，中国国家博物馆培训部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独立二十多年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局势在几经动荡与波折后趋于稳定。国内外学界在探寻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动荡的原因时，往往从历史遗产、大国博弈、政治文化、经济贫困、政治腐败和部族主义等角度去分析，并且大多数结论已成为学界共识。众所周知，政治运作，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政治精英的参与。因此，当论及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政治精英问题上来。本文试图以政治精英为对象，以精英流通理论为工具，深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的产生、特点和结构变迁，以图理解和把握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图景。

一、精英：基本概念与理论预设

在政治学中，精英概念包含着个体和群体两个基本向度。个体向度上，精英指各行各业中出类拔萃的人；群体向度上，精英指由众多个体构成的“专业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团体，它们控制着公共资源，并深刻地影响着公共生活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①意大利学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将精英定义为“在自己活动领域内拥有高分的人们”。在其理论中，广义的精英，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物，如商业、政治、军事和宗教等领域的上层人物；狭义的精英，指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人物。帕累托从社会异质性出发，指出人与人之间在个人能力、影响力和占有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使一国社会分化为上下两层，下层为社会大众，上层为精英阶级。在此基础上，帕累托根据精英与政权的关联度，将精英群体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直接或间接地在政府中居主导部分、并构成执政的精英阶级的人们构成统治精英，其余者为不执政的精英部分。”^②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将统治精英界定为“权力精英”。所谓权力精英，是指“某些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制定至少

① Акказиева Т.Б.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дисс. канд. полит. Наук. 2008. №2. С.4.

②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至于既定的国家事务，权力精英正是决策它们的人。”^①他还认为，权力精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军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利、财富和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②

根据帕累托和米尔斯的理论，精英群体可粗分为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两大类。政治精英（包括统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指在一国政治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实际或潜在地掌握、影响着国家公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社会治理和价值分配的群体。如总统、议员、行政官僚和政党领袖等；社会精英，指在一国社会领域中，因具有特殊才能或卓越成就，而享有优越的地位、普遍的声望、稳定的权威的群体，如知识界的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商界的优秀企业家（经济精英）、部落组织中的宗族长老（部族精英）等。政治精英位居主导和支配地位，直接与系统地运作国家权力；社会精英位居于被支配地位，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各领域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本文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界定，基本遵循上述定义。

尽管精英阶级“位阶最高且相对封闭”，但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结构一成不变。精英流通理论认为，“执政的精英阶级像一条流淌的河流，处于一种连续和缓慢的变动状态”。一般情况下，政治精英的流通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政治精英被社会精英所取代；二是政治精英被非精英所取代。正式制度下的民主选举、权力交接和官僚选拔，是精英流通的基本渠道，规范着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间的循环流动。而社会动荡、阶级变迁、政治革命和政权更迭，也是导致精英流通和更替的非制度化因素。帕累托指出，精英的兴衰和精英的流通是必然的，如果没有正常的流通，就会造成政局不稳，酿成革命形势，导致精英的集体流变。精英流通的进程，必然伴随着旧政治精英的衰落和新政治精英的崛起。衰落的政治精英，往往“对他人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自己的非法侵占物，而且大量鲸吞国

① [美]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王昆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② 同上，第2页。

家财产”^①。在此情况下，内阁、议会及官僚体制，在当权派的强力政策下，往往沦为维护执政合法性、与政治挑战者进行斡旋的政治工具。新政治精英的兴起，始于对执政当局强大权威的挑战。新崛起的政治精英，往往充当社会运动的领袖，标榜新的目标和使命，宣称为之奋斗的不是某个集团的利益，而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然而，在有些时候，新政治精英取代旧政治精英后，一开始尚能保持政权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但随着权力的扩张，变得愈益僵化，愈益排他。反观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进程，无论是政治精英的流替，还是政治精英结构的变迁，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精英流通理论的上述阐述，因此，精英流通理论将作为本文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工具。

二、国家独立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现代政治精英的产生

1991 年国家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独立地推进主权国家的建构进程，致力于在新生主权的地理和政治空间内，进行国家建设。这是吉尔吉斯主权国家政治精英形成的开端。^②国家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开始由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向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体制转型。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深受苏共意识形态和苏联政治体制影响的政治精英们，无不希望利用既有的行政资源，进入新的权力体系。

（一）国家独立与精英转换

在精英转换过程中，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内部尚未形成有力的反对派力量，一部分苏联政治精英，并没有因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出现实质性的权力转移。他们通过民主选举，重新成为新权力体系下的政治核心，不仅保持了国家权力的连续性，而且旧体制下的权力资源也得到了相应的保留与继承。如阿斯卡尔·阿卡耶夫（Аскар Акаев），作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86-1990 年间先后担任了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科学与高教部

①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2 页。

② Ногойбаева Эльмира. Кыргызста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7. №.1. С.118.

部长、苏联人民代表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国家独立后，又在总统选举中当选为吉尔吉斯共和国首任总统，进而完成了由苏联政治精英向独立主权国家政治精英的转变。另一部分原苏联政治精英，由于政治倾向较为保守，未能有效适应国家独立期的政治变革，最终失去了对权力的控制，而后几经波折，才进入独立国家的政治精英行列。如阿布萨马特·马萨利耶夫（Абсамат Масалиев），作为原苏联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国家独立时期，始终秉承着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以致很快就失去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同时取消了吉尔吉斯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马萨利耶夫出走俄罗斯。直到1992年6月，马萨利耶夫重返吉尔吉斯斯坦，将吉尔吉斯共产党更名为吉尔吉斯共产党人党，并在司法部登记注册。此后，马萨利耶夫借助共产党人党，积极活跃于吉尔吉斯斯坦政坛。还有一些原苏联政治精英，利用制度的延续性，直接转换为新国家的政治精英，继续拥有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与分配能力。如1990年2月选举产生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一院制最高苏维埃，在国家宣告独立后，仍然作为合法的立法机构延续下来，在其中任职的350名议员，全部自动成为新生的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政治精英。

尽管这一时期的精英转换的路径复杂多样，但主要呈现为以上三大图景，即一些政治精英，利用国家独立后的民主选举，继续执掌政权；另一些政治精英，重新组织追随者以组建新政党，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还有一些政治精英，利用苏联时期政治制度的延续性，转换为新生国家的政治精英。这也充分证明，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初期的政治精英，大多数是由原苏联的政治精英转换而来的。正如吉尔吉斯斯坦学者穆萨巴耶娃（Анар Мусабаева）所言：“在新的条件下，尽管政治精英们将自己标榜为民主人士和自由派，但事实上，他们仍是苏联管理精英的代表”，“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的世界观、行为模式、教育背景、技术和管理方法，都带有深刻的苏联烙印。”^①

^① Анар Мусаба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стоит ли ожидать обновления в выборном сезоне 2017 года?// Central Asian Analytical Network. 14.03.2017. <http://caanetwork.org/archives/8579>

（二）政党兴起与精英涌现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倡导政治多元化，实行三权分立，鼓励和支持多党政治。一时间，吉尔吉斯斯坦涌现出众多由社会精英组建的政治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8月至11月三个月内，在吉尔吉斯斯坦司法部登记的社会运动组织的数量就高达65个。^①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吉尔吉斯民主运动（ДДК）。1991-1992年间，吉尔吉斯民主运动分化成三个独立政党，分别为学者出身的巴克尔·图尔逊拜（Турсунбай Бакир Уулу）领导的艾尔肯·吉尔吉斯党（Эрк）、教授出身的艾尔肯·努苏波夫（Нусупов Эркин）领导的阿萨巴党（Асаба），以及律师出身的奥穆尔别克·捷克巴耶夫（Омурбек Текебаев）领导的阿塔·梅肯党（Ата Мекен）。^②正如吉尔吉斯斯坦学者扎伊迪·库尔马诺夫（Зайнидин Курманов）所言，“精英的流通在封闭很长一段时间后，新的精英们开始渗透，并占据了社会各阶层中的关键位置。在那些年里，曾经不为人知、但现在家喻户晓的名字，出现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如捷克巴耶夫、图尔逊拜、阿达汉·马杜马罗夫（Адахан Мадумаров）”等。^③此后几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还组建了一批相当有影响力的政党，包括由部分前吉尔吉斯共产党成员组建的社会民主党（СДПК，1993年），由知识分子、企业家组建的吉尔吉斯妇女民主党（ДПЖК，1994年），由农民、工人组建的吉尔吉斯保护低收入者党（АТПК，1994年），由工人、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组建的统一吉尔吉斯党（ПЕК，1994年）等。这些政党，在吉尔吉斯斯坦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均获得了1-14个不等的议席（见表1）。

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初期的建党浪潮中，一些社会精英以政党为平台，以议会选举为契机，实现了由社会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蜕变。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吉尔吉斯斯坦至少经历了五波建党浪潮，每波建党浪潮基本与议会选举直接相关。1995年议会选举前夕，在司法部登记注册的政党数量为18个，

① Базарбаев К, Жумагулов 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Фридриха Эберга. 2012. С.47

② Zaynidin Kurmanov, "Evolution in the Party Structure in Kyrgyzsta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004, Vol.29, No.5.

③ Ногойбаева Эльмира. Кыргызста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С.119.

2005 年为 64 个，2007 年为 100 多个，2010 年为 160 个^①，到了 2017 年，政党数量已达 228 个^②。政党数量爆炸式的增长，显示出政党业已成为社会精英谋求进入政治精英行列的重要平台，而民主选举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渠道。

表 1 吉尔吉斯斯坦 1995 年议会选举中的议席分配

政党	所获议席
社会民主党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14
阿萨巴党 (Пар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 Асаба)	4
统一吉尔吉斯党 (Партия единств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4
阿塔·梅肯党 (Ата Мекен)	3
吉尔吉斯共和国民主党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3
吉尔吉斯共产党人党 (Парти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3
吉尔吉斯共和国人民党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артия)	3
吉尔吉斯农业党 (Аграрная парт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
吉尔吉斯保护低收入者党 (Партия Защиты)	1
吉尔吉斯民主运动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Кыргызстана)	1
吉尔吉斯妇女民主党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женщин Кыргызстана)	1
独立人士	67
合计	105

资料来源: D. Nohlen, F. Grotz, C. Hartmann, “Elections in Asia: A data handbook”, 2001, Vol. I, pp. 440.

(三) 政治革命与精英流替

在稳定、开放的政治体制中，制度化的民主选举，是实现政治精英流通和代际更替的基本途径。而在封闭、僵化的政治体制中，选举进程往往被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所控制，选举结果呈现出鲜明的排他性，阻碍着其他精英的向上流动，进而容易引起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执政当局普遍采取的策略是，要么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要么依靠强力部门和机构打压政治挑战者。当执政当局无力消解危机时，政治反对派往往会发起激烈的政治抗争，甚至祭起革命，暴力夺权，进而重建政

① Досрочные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 Цифры и факты. Б., 2008. С. 135; Базарбаев К, Жумагулов 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 Фридриха Эберта. 2012. С. 47, 114-124

②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писо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Кыргызстана. <http://www.gov.kg/?p=97564&lang=ru>

治制度、领导体系和政治价值。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愿望方可实现。^①换言之，当精英流通的渠道因封闭、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束缚而受到阻滞，新生的社会精英和权力圈外的政治精英又具有强烈而迫切的参政愿望时，革命形势更容易应运而生，从而造成执政的政治精英集体流变。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初期，执政的政治精英们沿着西方民主化道路，大刀阔斧地推进政治转型和经济转轨，以期突破苏联体制的窠臼。然而，深深烙印在他们内心深处的苏联治国理念、政治传统和行为习惯，从根本上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日趋保守。在阿斯卡尔·阿卡耶夫（Аскар Акаев）执政期间，通过 1994 年、1996 年和 1998 年三度修宪，不断强化总统集权，维护总统集权和政权稳定成了优先目标。此后，“作为一种动态机制的精英流通，却在吉尔吉斯 1998-2005 年间的民主转型进程中，近乎被阻滞”^②。在政治转型的同时，经济转轨同步推进。执政的政治精英们利用权力优势，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大肆侵吞国家财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催生了新政治体系下的权贵官僚阶层。在这一阶层中，以总统家族势力最为强大。“总统的家族成员及其周围亲信大多因权而资，通过其特殊身份与特权，掌握着国民经济中的优势资源产业和经济增长部门，进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③以阿卡耶夫为代表的执政政治精英们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家族式”控制，封闭了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们向上流动的渠道，导致反对派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离心和不满。在 2005 年议会选举前夕，反对派政治精英们相互结盟，以期赢得议会选举。然而，在 2005 年议会选举中，反对派政党仅获得 6 个议席，其余 69 个议席均被亲总统政党夺取。^④长期压抑的不满和选举结果带来的愤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 251 页。

② Ануар Аязбеков, Эльмира Ногонба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ценка и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2006. №.3. С.62-73.

③ 包毅：《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48 页。

④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Цифры и факты. Б., 2005. С.438-441.

遭，使反对派政治精英们在外部势力的渗透、鼓动下，发动“郁金香革命”。他们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权，解散政府，并取缔了一些亲总统的政党。“郁金香革命”后，反阿卡耶夫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占据了政府、议会和司法等重要部门。

“郁金香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于2005年7月举行总统选举，代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Курманбек Бакиев）赢得大选。巴基耶夫打着“实行议会制”的口号走上权力之巅，但其对总统集权制并无迫切的改革要求，对旧体制的继承多于变革。在巴基耶夫执政期间，依旧沿袭阿卡耶夫时期党同伐异的做派，在选举中暗箱操作，徇私舞弊；在政治安排上任人唯亲，裙带攀附；在议会中支持政权党，挤压反对派；在人事选拔上重用南部精英，打压北方精英。凡此种种，造成总统权力场以外的政治精英的极度不满，纷纷走向巴基耶夫政府的对立面。如2005年8月至11月三个多月内，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阿兹姆别克·别克纳扎罗夫（Азимбек Бекназаров）、外交部部长罗扎·奥通巴耶娃（Роза Отунбаева）、议会议长奥穆尔别克·捷克巴耶夫（Омурбек Текебаев）和贸易部长阿尔马兹别克·阿塔姆巴耶夫（Алмазбек Атамбаев）等，纷纷投身于反巴基耶夫的阵营中。^①2010年，巴基耶夫政权在“二次革命”中被反对派政治精英推翻，一些亲总统政党被取缔，巴基耶夫的一些家族成员和追随者被投入监狱。至此，在短短5年多的时间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在疾风骤雨般的政治革命中，发生了两次非制度化的集体流替。而“二次革命”后进入国家机构中的政治精英，则成为吉现今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政治力量。

三、吉尔吉斯斯坦现代政治精英的特点

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苏共中央垂直任命，以保证南、北政治力量的平衡。如1950-1961年，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为南部出身的伊斯哈克·拉兹扎科夫（Исхак Раззаков）；1961-1985年，为北部出

^① Kevin Koehler,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 Building: Electoral Politics and Ruling Party Form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Kyrgyzstan”, OSCE Academy in Bishkek, 2009, pp.16-19.

身的图尔达昆·乌苏巴利耶夫（Турдакун Усубалиев）；1985–1990年，为南部出身的阿布萨马特·马萨利耶夫（Абсамат Масалиев）。^①

（一）鲜明的地域性政治身份

正是苏联时期的这种政治安排，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在独立后的政治斗争中，仍然强化着这种南北“轮流坐庄”的做法。

表2 1991–2018年吉尔吉斯斯坦历任总统和总理的任期及地域出身

总统	总理	任期	地域出身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Аскар Акаев) 任期：1991.10–2005.03 出身：北方，楚河州	纳西尔丁·伊萨诺夫（Насирдин Исанов）	1991.01–1991.11	南方，奥什州
	图尔松别克·琴格舍夫（Турсунбек Чынгышев）	1992.10–1993.12	北方，纳伦州
	阿帕斯·朱马古洛夫（Апас Джумагулов）	1993.12–1998.03	北方，楚河州
	库巴尼奇别克·茹马利耶夫（Кубанычбек Жумалиев）	1998.03–1998.12	南方，贾拉拉巴德
	朱马别克·伊布赖莫夫（Жумабек Ибраимов）	1998.12–1999.04	北方，楚河州
	阿曼格尔德·穆拉利耶夫（Амангельды Муралиев）	1999.04–2000.12	北方，楚河州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Курманбек Бакиев）	2000.12–2002.05	南方，贾拉拉巴德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Курманбек Бакиев) 任期：2005.07–2010.04 出身：南方，贾拉拉巴德	尼古拉·塔纳耶夫（Никола Танаев）	2002.05–2005.03	俄罗斯
	费利克斯·库洛夫（Феликс Кулов）	2005.08–2007.01	北方，比什凯克
	阿齐姆·伊萨别科夫（Азимбек Исабеков）	2007.01–2007.03	北方，楚河州
	阿尔马兹别克·阿塔姆巴耶夫（Алмазбек Атамбаев）	2007.03–2007.11	北方，楚河州
	伊戈尔·丘季诺夫（Игорь Чудинов）	2007.12–2009.10	北方，比什凯克
阿尔马兹别克·阿塔姆巴耶夫 (Алмазбек Атамбаев) 任期：2011.12–2017.11 出身：北方，楚河州	达尼亚尔·乌谢诺夫（Данияр Үсөнов）	2009.10–2010.04	北方，比什凯克
	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Омурбек Бабанов）	2011.09–2012.09	北方，塔拉斯州
	詹托罗·萨特巴尔季耶夫（Жанторо Сатыбалдиев）	2012.09–2014.03	南方，奥什州
	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Джоомарт Оторбаев）	2014.03–2015.05	北方，比什凯克
	捷米尔·萨里耶夫（Темир Сарыев）	2015.05–2016.04	北方，楚河州
索隆拜·热恩别科夫 (Су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 任期：2017.11 至今 出身：南方，奥什州	索隆拜·热恩别科夫（Су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	2016.04–2017.08	南方，奥什州
	萨帕尔·伊萨科夫（Сапар Исаков）	2017.08–2018.04	北方，比什凯克
	穆哈梅特卡雷·阿布尔加济耶夫 (Мухамметкалий Абулгазиев)	2018.04 至今	北方，比什凯克

① Георгий Ситня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1998. №.3.

上表中，总统的人选呈现出明显的南北轮替态势，而总理的人选，除了巴基耶夫时期，总体上也呈现出这一态势。并且，当总统为南方政治精英时，第一任总理往往由北方政治精英担任，反之亦然。

除了苏联因素外，选举制度也是造成南北政治精英“轮流坐庄”的关键因素。1995年和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实行单一选区制；2000年、2007年和2009年，实行混合代表制（单一选区制和政党比例代表制）；2010年和2015年，实行政党比例代表制。在单一选区制的驱动下，吉尔吉斯斯坦1995-2010年间出现的关键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出身地的政治支持。政治精英只有得到地方社会团体、经济团体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才能成为议会选举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由于大多数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不是依靠纲领和立场自下而上地吸引社会民众的政治支持，而是靠政党领袖的意志和威望来凝聚社会力量^①，以致政治精英在政党比例代表制下，也不得不充分调动其出身地的社会资源。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身份的地域性，还表现在南、北政治精英数量的比重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НИСИ）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1992-2004年间，来自楚河州的政治精英的比重由40%降至19%，2005年仅为5%，但在2006-2010年间回升且稳定在20%左右；而来自奥什地区的政治精英的比重，由1992年的10%增长为2005年的33%，并在2007年达到最高水平36.7%，2010年有所回落，但也高达31%。^②总体来看，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政治精英数量的比重，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之中，此乃政治精英特殊的身份政治竞争的集中体现。在过去，政治精英时常将权力斗争视为部族之间的斗争，导致吉尔吉斯南、北政治关系的紧张。现今，南、北问题虽不如过去那般紧张，但仍是吉尔吉斯政治精英考量政治平衡的重要因素。一些政治精英认为，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政治任命时，有必要保证政府中有每个州的政治代表。也有一些政治精英认为，区域平衡原则理应受到

①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3-104页。

②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ИС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1991-2010 гг. Бишкек, 2014.

尊重，但不应该将南北问题转化为大政治，而应该弄清楚是什么导致南北问题的出现。还有一些政治精英认为，人事政策虽然存在缺陷，但不应过于夸大，应通过法律手段将那些试图煽动区域仇恨的人绳之以法。这些争论，似乎印证着“吉尔吉斯政治中的区域因素永远不会消失。”^①2018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Су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直言：“现在是时候将地区间的轮换传统引入人事政策了，我们必须重申这一传统。”^②可以预见，在历史传统、选举制度和精英叙事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地域性政治身份仍将是政治精英的重要标签，而南、北政治精英“轮流坐庄”的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二）深刻的民族主义色彩

独立前夕，吉尔吉斯族裔中就已弥漫着主体民族主义思潮。1990年爆发于南部奥什地区的民族冲突，既令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也加剧了乌兹别克族裔的离心倾向。国家独立后，阿卡耶夫总统试图打压主体民族主义思潮，以“马纳斯七原则”培养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民族主义，积极倡导“吉尔吉斯共和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然而，“玛纳斯”作为吉尔吉斯族群的文化象征，并没有引起其他族裔的心理共鸣，反而进一步抬升了社会中的各种民族主义情绪。为了遏制这一趋势、缓和吉尔吉斯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阿卡耶夫在北部创建了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在南部建立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大学，并通过合并奥什国立大学的乌兹别克语言学、教育学等专业，创建了乌兹别克人文学院。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吉尔吉斯人民大会，以凝聚各族代表，共商民族问题。这些努力，在调解民族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郁金香革命”后，在巴基耶夫总统的支持下，坎奇别克·塔希耶夫（Камчыбек Ташиев）于2006年组建了以保守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故乡党”（Ата Журт），该党主张将一切非吉尔吉斯族的精英群体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在2010年“二次革命”中，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但“故乡党”仍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活跃于政坛，并在2010年议会

① Жээнбеков: На севере мне говорят, что среди кадров много южан, а на юге сетуют на то, что слишком много северных. 16.07.2018. <http://www.ca-portal.ru/article:43951>

② Там же.

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故乡党”能够以第一大党身份进入议会，与临时政府对社会中的主体民族主义思潮的放任态度有一定关系。正如吉尔吉斯一些学者指出，尽管政府一再承诺恢复正义，却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反而对议会选举前夕弥漫的主体民族主义思潮置若罔闻，“革命政府”显然已经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压力。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向政治高层的渗透，不断解构着阿卡耶夫时期民族和解努力的成果。以教育领域为例，阿卡耶夫时期建立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大学被更名为奥什国立社会大学，一些学科被取消，乌兹别克语教材被停用；奥什国立大学的乌兹别克人文学院也被撤销，相当一批乌兹别克族教职工被迫离职。^①

在政治领域，政治任命同样带有明显的主体民族主义色彩。“总体而言，国家机构主要由吉尔吉斯主体民族的政治精英占据着，非主体民族的政治精英每年都在减少。”^②“1992年，国家机构中吉尔吉斯主体民族的代表人数占87.8%，到了2007年达到97.6%。事实证明，巴基耶夫时期，国家机构中的关键职位，几乎完全由吉尔吉斯族的政治精英占据。到了2010年，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非主体民族的政治精英在国家机构中仅占6%。”^③除政治任命外，议会选举也带有鲜明的主体民族主义色彩。尽管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时期的选举法都明确规定，各政党提名的议会竞选名单，必须由不同民族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构成，但非主体民族政党代表往往排名靠后，很难在议会选举中当选为议员。以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族为例，据统计，1995年议会选举当选的105个议员中，俄罗斯族仅有4名，占3.8%；2000年当选的105个议员中有9名，占8.6%；2005年当选的75个议员中仅有3名，占4%；2007年当选的90名议员中有9名，占10%；2010年当选的120名议员中有7名，占5.8%；2015年当选的120名议员中仅有3名，占2.5%。^④事实上，其他非主体民族的政治精英也鲜能当选。如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

① N. Megoran, “Averting violence in Kyrgyzstan: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ding to nationalism”,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Paper, 2012, No.3.

② Алымбаева А. О структур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02.07.2013. <http://kabarlar.org/news/13395-o-strukture-politicheskoy-elity-kyrgyzstana.html>

③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ИС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1991-2010 гг. Бишкек, 2014.

④ Русские Депутаты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Парламента Киргизии). 17.06.

人口数量占吉尔吉斯斯坦 14.3%的第二大民族——乌兹别克族，仅有 2 名代表成功当选。^①诚然，并非所有吉尔吉斯族裔的政治精英都是民族主义者，但社会中的主体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民族主义倾向的互构，或潜在或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

（三）明显的权力依附关系

所谓权力依附，是指在政治地位、能力、资源和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政治参与者的自我政治意识趋于保守，在心理、行动和目标上从属于权力拥有者，从而形成对权力拥有者的政治依持关系，一般表现为裙带主义（Nepotism）和恩庇主义（clientelism）。在裙带主义网络中，权力拥有者往往利用职务干预政治任命，将亲属、朋友以及其他私人关系圈中的人物，安排进政治体制中。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国家政权的管理沿袭了苏联时期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模式，地方行政长官主要由总统直接任命。不仅如此，总统还有权任免内阁和司法部门的要职官员，这就为吉尔吉斯斯坦形成以总统为核心的裙带关系网络提供了制度空间。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执政期间，大肆安排家属、亲信、朋友进入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便是显证。在地方政府中，同样存在广泛的裙带关系。在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场中，与地方官员有密切往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被安排进州、市及次级政府机构中。一旦权力持有者丧失对政权的控制时，他们的依附者便随即失去影响国家政治运作的能力。如阿卡耶夫政权倒台后，阿卡耶夫的女儿阿卡耶娃组建的“前进，吉尔吉斯！”党被取缔，“亲总统”的政党“吉尔吉斯正义党”则被排挤出议会，长期以议会外反对党身份进行活动。无独有偶，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后，巴基耶夫支持组建的政权党“光明大道”党被取缔，巴基耶夫的儿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的兄弟阿克马特·巴基耶夫等被投入监狱。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在一个国家中，当政府尚无能力将自身巩固成有稳定政治支持的自治机构、但民主制度却已引入时，

2013// http://russkg.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409:2013-06-17-02-07-04&catid=98:2013-06-17-01-46-08&Itemid=72

① 议员名单见：Депутаты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VI Созыва. <http://www.kenesh.kg/ru/deputy/list/35>

恩庇主义就会出现。^①恩庇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换关系，资本取代私交而与权力相结合。正如吉尔吉斯学者所批评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是以金钱为基础的”^②，“议会就像一个超市，在这个超市里政党被用来买卖。”^③在议会选举前夕，一些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积极寻求加入有影响力的政党。他们为政党提供数额不菲的资金，政党则将他们安排在候选名单的有利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政党的结合过程，实际上也是精英与权力依附关系的形成过程。由于大多数政党属于自上而下组建的人格型政党，政党内部缺乏民主性，政党成员往往依附于政党党魁而存在。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促使本党党魁当选，是所有政党最基本的目标。在权力依附关系中，一旦政党党魁赢得选举，其他党员也将从中获得预期的利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裙带主义与恩庇主义往往同时发挥作用，不断强化着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对关键政治人物的权力依附。

（四）藕断丝连的部族影响

在吉尔吉斯游牧时期，部族乃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国家独立后，部族这一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大大小小的部族占据着山区和平原（见表 3）。其中，右翼萨鲁巴噶什（Sary-bagysh）部族和中间派伊其克里克（Ich-kylyk）部族的势力最为强大。阿卡耶夫便来自萨鲁巴噶什部族，巴基耶夫则来自伊其克里克部族。

①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p.390-391.

② Anvar Bugazov. “Socio-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ociety Formation in Kyrgyzstan”, Silk Road Paper, August 2013, p.54.

③ Momunova A. “Party and Clan Politics in Kyrgyzstan: Is the ‘Clan’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Political Parties? The Case Studies of the Three Parties in Power”,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12, p.31.

表 3 吉尔吉斯斯坦的部落结构与谱系

左翼 (平原地区)	中间 (平原地区)	右翼 (山地地区)			其他族裔部族
	伊其克里克	塔卡伊	额德格纳	芒古什	
库什楚; 詹提格尔; 萨鲁; 蒙都孜; 托博伊; 克塔依; 巴斯兹; 冲巴噶什	克普恰克; 乃曼; 台依特; 凯塞克; 康迪; 多鲁 斯; 阿瓦特博斯腾; 奥尔古; 吉迪尔沙; 蒂优凯塞克; 诺伊古特;	萨鲁巴噶什; 布库; 苏勒图; 提里姆色伊特; 察哈尔萨雅克; 萨雅克; 察哈尔; 阿泽克; 巴格什; 蒙额勒多尔; 苏姆伦; 巴尔彦	交鲁; 博鲁; 巴尔吉; 卡拉巴格什 萨尔特阿尔	贾噶勒迈; 喀什塔穆噶	卡勒玛克; 喀喇哈萨克; 酷龙; 凯勒迪克

资料来源: Абрамзон С.М. Киргизы и их этногенетические 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Ф.: Кыргызстан, 1990.

苏联时期,为了消弭部族的影响,苏联一方面采取集体农庄的形式,将大大小小的部族分割成相对独立的集体村落;而在另一方面,培育和扶持部族首领成为地方行政官员,使吉尔吉斯部族内部开始出现官僚阶级与平民阶级的分化。苏联的官僚体制嵌入部族结构后,兼具部族首领与地方官员身份的部族精英之间的利益争夺日趋激烈。他们的政治支持一方面来自国家的授权,另一方面来自部族成员的支持,而前者对政治升迁具有决定性作用,后者则日益被工具化。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真空,使部族主义意识迅速抬升。在开放的竞争体制下,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不得不高度依赖社会民众的支持,而部族则是吸引社会支持的有效工具。在此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开始强调自己的部族身份,并有意重用本部族出身的同僚和社会精英。在阿卡耶夫时期,内阁要员主要由出身于萨鲁巴噶什部族的政治精英担任,包括国家安全局局长博洛特·贾努扎科夫(Болот Джанузаков)、吉尔吉斯共和国财政部长铁米尔别克·阿克马塔利耶夫(Темирбек Акматалиев)、内政部部长塔什铁米尔·阿伊特巴耶夫(Таштемир Айтбаев)和宪法法院主席乔尔

蓬·巴耶科娃(Чолпон Баекова)等。^①到了巴基耶夫时期,伊其克里克部族的政治精英则处于优势地位,大量来自该部族的政治精英开始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之中。事实上,无论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执政时期,都对部族保持着较高的政治依赖。由图1,阿卡耶夫执政期间,其对部族力量的依赖指数基本维持在20%以上,在1996年极力推行修宪集权时期达到最高,约为32%;而巴基耶夫执政初期,对部族的政治依赖指数基本维持在25%以上,尤其是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部族的支持是其赢得总统选举的重要因素;但在二者执政后期,部族的支持力均呈现出弱化趋势,其根源在于政治腐败加剧。从总体上看,部族是影响吉尔吉斯斯坦1992-2010年间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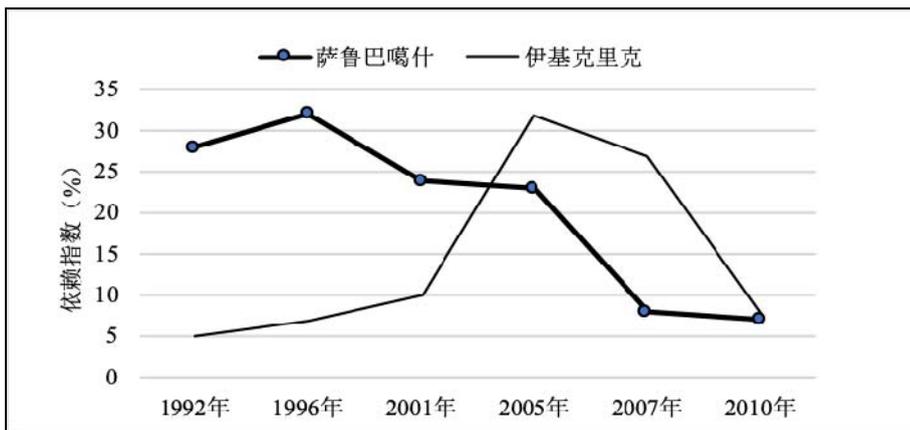


图1 1992-2010年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对部族力量的政治依赖指数

资料来源: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ИС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1991-2010 гг. Бишкек, 2014.

“在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执政时期,传统因素(地区主义、家族关系、部族主义)是影响精英选拔的重要因素,到了2010年,这些传统因素的影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05.03.2002. <https://centrasia.org/news/A.php?st=1015282980>

响开始弱化。”^① 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叶戈尔·叶夫拉什科夫 (Егор Евлашков) 指出, 独立二十多年来, 现代城市生活、人口迁移和市场经济的压力等, 使诸多城市居民的部族意识开始淡化。政治家们虽然不断强调着“部族”, 但也不断地试图聚集来自不同部落、社区的代表, 尤其是富人,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获得权力, 满足和实现个人价值、财富欲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活中, 日益发挥更大作用的是企业家、商人和政治家等形成的圈子, 而不是部族。^② 虽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们, 在社会生活中早已脱离了部落社区, 但在政治生活中频繁借助部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 正反映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们具有藕断丝连的部族性。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这种部族性促使着政治精英努力建构基于家族关系、个人忠诚、部族底色的权力圈, 但这无一例外地服务于政治精英自身对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追求。权力与资本、部族的结合, 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政治精英的个人私利, 而不是促进政治精英所属部族的整体发展。

四、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与现代政治精英结构的嬗变

在政治生活中, 政治精英作为一个群体, 共同塑造着国家政权。不同的精英互动模式, 催生出不同的精英结构。政治精英间的互动, 往往呈现出整合与分裂两大向度, 与之相适应, 精英结构也呈现为整合型结构和分裂型结构两大形态。在整合型结构中, 意识形态整合和共识型整合又最具代表性。苏联时期, 吉尔吉斯斯坦的精英结构, 受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而表现出意识形态整合, 具化为苏共党化结构。独立初期, 在政治领域“去苏化”和“技术专家治国”思维的驱动下, 技术精英结构取代了苏共党化结构。而后, 随着技术官僚的腐败、总统家族势力的崛起, 吉尔吉斯的政治精英结构开始由整合滑向分裂, 家族寡头结构取代了技术精英结构。2010年“二

①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ИС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1991-2010 гг. Бишкек, 2014.

② Егор Евлашко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киргизского трайбализма. 02.11.2018. <http://press-unity.com/analitika/9845.html>

次革命”后，虽然政治精英们对待议会制政体的态度存在差异，但维护社会和平、促进政治稳定、实现国家发展等成为精英共识，精英结构呈现出政治共识型结构。

（一）1991-1997年：由苏共党化精英结构转向技术精英结构

苏联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僵化，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官僚主要由苏共和吉共从党内选拔和任命，政治精英呈现出较为封闭的党化结构。苏联解体后，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社会根基，苏共和吉共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式微，大多数依恃苏共和吉共的官僚权贵开始被边缘化。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不安，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技术精英执掌政府。所谓“技术精英”，是指受过科学、技术等相关学科的高等教育，凭借专业知识和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掌握政治权力并倾向于推动理性化决策机制，致力发展社会经济的一类政治精英。阿卡耶夫当选总统后，一方面致力于政治民主化改造，一方面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建立开放的市场，提出“技术专家治国”的发展模式，希望把吉打造成“中亚瑞士”^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阿卡耶夫除了重用一些苏联时期就已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中任职的技术官僚外，还积极从学术界、教育界、商界等挑选年富力强的社会精英，安排进各级政府。如任命商业精英图尔松别克·琴格舍夫（Турсунбек Чынгышев）出任总理，任命电气工程师巴基耶夫出任贾拉拉巴德州州长等。据统计，在1992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官僚阶层中，拥有科学学位的政治精英占45.2%，到1996年则达到57.1%。^②吉尔吉斯斯坦学者阿勒别克·阿库诺夫（Аалыбек Акунов）指出，在独立后的前几年，吉尔吉斯斯坦执掌政权的政治精英主要由知识分子、市场导向的经济精英、务实主义者（不关心权力由谁执掌的人）、民主人士、社会团体的野心家和苏共

① Акказиева Т.Б.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дисс. канд. полит. Наук. С.115.

②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ИС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1991-2010 гг. Бишкек, 2014.

意识形态的反对者构成。^①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旧体制下的党化精英结构已经被新制度下的技术精英结构所替代。

（二）1998-2010年：由技术精英结构转向家族寡头结构

在“技术专家治国”的模式下，吉尔吉斯斯坦迅速推开了经济私有化进程。在1991-1993年“小私有化阶段”，吉尔吉斯斯坦全国86.7%的商贸企业和97.2%的餐饮、日常生活服务企业完成了私有化，但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进展艰难，仅完成了0.5%，大多数仅仅初步实现了改制。^②在1994-1998年“货币私有化阶段”，由于缺乏经验、财政困难等原因，该阶段的私有化进程基本停滞。以“休克疗法”为核心内容的私有化，成了政治精英们堂而皇之巧取豪夺人民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的制度外衣，造就了“影子经济”横行、腐败丛生的官僚权贵资本主义。面对经济私有化的窘境，阿卡耶夫强调，“只有强有力的政权，才能确立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并使之正常运转”，于是开启了修宪扩权的政治进程。在此背景下，阿卡耶夫开始大量免除政府中技术官僚的职务。据统计，吉尔吉斯政府中技术官僚的比重从1998年开始急剧下降，到了2001年降至38.9%，到2005年时仅有4.5%。^③技术官僚急剧减少的同时，阿卡耶夫大量任命家族成员和亲总统圈子的政治精英进入政府。如此安排，一是为了加强总统对政府的控制，减少集权阻力；二是为了应对反对派政治精英对总统集权发起的政治挑战。总统圈子的政治精英掌控政府，并没有改变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反而变本加厉地侵吞国家财富。如阿卡耶夫大女婿阿利季·托伊贡巴耶夫（Адилъ Тойгонбаев）几乎掌握着吉尔吉斯斯坦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阿卡耶夫的儿子艾达尔·阿卡耶夫（Айдар Акаев）则掌握着超市、夜总会和电信公司等企业。^④在阿卡耶夫

① Акунов А.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Бишкек, 2001. С.56

② “吉尔吉斯斯坦私有化——现状、成果和问题”，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05年1月6日，<http://kg.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501/20050100329521.html>

③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ИС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1991-2010 гг. Бишкек, 2014.

④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0, Vol.38, No.5, pp.589-600.

家族日益寡头化的同时，社会民众仍然十分贫困。据世界银行统计，“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人口为52%，2003年为50%，2004年为45.9%，2005年为43.1%。”^①高居不下的贫困率，使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政治精英的革命动员变得极为容易。最终，在外部势力的渗透参与下，阿卡耶夫政权在反对派政治精英发起的“郁金香革命”中垮台。

“革命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执政的新精英以前未参与过国家管理（如捷克在‘天鹅绒革命’后就是如此）。但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后上台的并非新精英，而是前总统阿卡耶夫的旧战友，因此新政权的目标不是转向新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而是旧的改革模式的继续。”^②“郁金香革命”后，巴基耶夫成为新任民选总统。如前所述，巴基耶夫并非真正的改革派，他对旧体制的继承多于变革，对总统集权的制度安排并无迫切的改革要求。在巴基耶夫治下，国家治理依仗的不是新的技术官僚，而是家族势力。巴基耶夫家族不仅控制着中央政府、议会，还控制着地方政府。巴基耶夫的大儿子马拉特·巴基耶夫（Марат Бакиев），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小儿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Максим Бакиев）则担任着国家发展、投资与革新部部长，实际掌控着国家的经济领域；巴基耶夫的兄弟扎内士·巴基耶夫（Жаныш Бакиев）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局长，并实际地监督着所有执法机构；另一个兄弟阿克马特·巴基耶夫（Акмат Бакиев），则实际控制着贾拉拉巴德州的地方政府。^③巴基耶夫的反民主做派，最终招致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的爆发。“二次革命”不仅推翻了巴基耶夫政府，也摧垮了家族寡头化的精英结构。

（三）2010年至今：由家族寡头结构转向政治共识型结构

在吉尔吉斯斯坦，家族寡头化精英结构被瓦解后，取而代之的是共识型精英结构。所谓共识型精英结构，是指参与政治过程的政治精英个体或精英

① 雷琳、王林兵：“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动态移民潮分析”，《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1期。

② Элебаева А, Пухова М. Транзит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1991-2006 гг.)//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7. Vol.50. No.2.

③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0, Vol.38, No.5, pp.589-600.

集团，基于一定的政治共识，暂时搁置意识形态差异、历史嫌隙等，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而结成紧密互动的关系网络。宏观上，可以通过政治精英的政治认知、行为模式、目标追求等方面的共识程度，来把握和理解吉尔吉斯斯坦的共识型精英结构。2010年议会制政体的确立，结束了总统与议会围绕权力分割、利益分配等问题而陷入的长期斗争僵局。维护社会和平、促进政治稳定和实现国家发展，成为政治精英们的普遍认知。2011年11月，罗扎·奥通巴耶娃在交接总统权力时指出：

“我们曾经经历了威权政治和以家族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我们希望不再重蹈覆辙。持续稳定地朝着寻求共识和遵循社会契约方向前进，对重新恢复人民共同治理国家的传统是极为必要的，这也是政府重获人民信任的必然选择，抛开这些也就无所谓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预期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①

在2010年和2015年议会选举中，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主张议会制的政党，与以故乡党为代表的、对总统制心存余念的政党，一起进入议会。主张议会制的政治精英认为，开放民主的议会制，是各方势力谋求政治对话、相互理性妥协、尊重彼此利益的有效框架，是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朝着和平、稳定、民主方向发展的良性制度。而支持总统制的政治精英则认为，议会制下分散的权力格局，会降低体制的政策输出能力，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尽管政治精英之间对待议会制政体的态度有所差异，但都遵循着既定的议会制原则行事。诚如故乡党领袖阿赫玛特别克·克尔迪别科夫（Ахматбек Келдибеков）在2011年担任议长时曾言：“现在形势趋于稳定，各派政治力量相互谋求妥协，寻找共同语言，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由此可见，“二次革命”后，无论是执政的，还是非执政的政治精英，他们在政治认知、行为模式和目标追求上，都达成了宏观的一致性。

共识型精英结构与家族寡头化精英结构，在政治决策中的显著区别是，前者更注重集合各方意见，尽最大可能寻找政策共识；后者则是以家族圈子利益为基础，通过“小圈子”决策来完成政策输出。如在制定《2013-2017

^① Roza Otunbayeva,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Parliament and the People of the Kyrgyz Republic”, 20.11.2011, <http://www.kyrgyzmission.net/news/Roza%20Otunbayeva%20address%20Parliament%2030%20Nov%202011.pdf>

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2018-2022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发展战略》时，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和吉尔吉斯政府积极听取了各党派的意见和建议；在制定《2018-2040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吉尔吉斯的一些党派（如故乡党），更是直接自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供相关部门参考。诚然，共识型精英结构，不可能彻底掩盖和消除各政治精英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自然也就不可能促使他们在政治运作中，完全趋于同一。如在议会中，执政联盟各政党对政治改革和政府治理成效莫衷一是的态度，时常造成执政联盟和政府的解散和重组。“议会制政体自2010年建立至今，已经历了七届执政联盟，前六届执政联盟的维系周期依次分别是3天、12个月、9个月、18个月、19个月和12个月，离制度设计中的5年周期相去甚远。”^①尽管如此，共识型精英结构下的决策模式，在消除家族政治的“小圈子”、扩大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五、吉尔吉斯斯坦共识型精英结构下政治生态新图景

一般而言，政治精英的政治自觉越强，政治体制就愈加稳固，政治运作也更显有序。地域性、民族主义性、部族性和依附性等内在属性的交织，使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更多地表现出冲突与斗争成分多，妥协与合作能力较弱。在新生的议会制下，维护社会和平、促进政治稳定、实现国家发展等政治共识已经形成。政治精英也开始自觉地转变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创造更加民主、透明、公平的选举制度和规则。或可以说，政治精英的政治理性的回归，是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以来，政治局势日趋稳定、有序的根本原因。

（一）政治精英由热衷于权力对抗回归理性的政治自觉

议会制政体确立8年多来，执政的政治精英，自觉、主动地调整中央权力，有意规避家族政治的再度形成，使总统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

^① 王林兵、雷琳：“吉尔吉斯斯坦‘低态化’政党政治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4期。

权力斗争得到极大缓和。2015年议会选举后，为巩固议会制下中央权力的正常运作，时任总统阿塔姆耶夫既高度肯定了建构具有独立性的议会的价值和意义，也警示议会应保障政府的自主性，力促政府与议会有序互动。2017年总统选举前夕，阿塔姆巴耶夫公开表示不谋求连任，也不在新一届政府和议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此举既消除了精英群体与社会民众对总统集权的忧虑，也维护了宪法的权威和议会制规则。在反对派方面，总统集权和家族政治的退场，使反对派政党丧失了鼓动街头政治的借口。而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政治精英也在政治斗争中，因政治腐败、煽动社会仇恨等原因，被投入了监狱。凡此种种，导致反对派政治力量大势已去。现今活跃在政坛上的反对派政党，都已完成了自我转变，回归到议会中，与执政派政党展开合法斗争。在2010年和2015年议会选举中，由于选举管理监督不到位，或选举技术不完善，导致选举进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与现象，但几乎所有参与议会选举的政党，对选举结果都秉持认可态度。如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统一吉尔吉斯-劳动党”仅因1%的选票差，与议会失之交臂，但其也仅要求部分投票站重新计票。在2015年议会选举后，“共和国故乡党”未能如愿进入执政联盟，且在政府任命中又未占得重要职位，遂发起对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的弹劾，然而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最终不了了之。当权派政治精英积极推动中央权力向民主变革，反对派政治精英也努力寻求政治表达的合法途径，这说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的政治理性开始回归。在这种政治理性与自觉的指引下，各方政治力量彼此保持克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运作也日趋稳定、有序。

（二）社会动员与政治制度化由常态化失衡迈向低度平衡

在实行政党政治的总统制国家，政治精英进行社会动员的目标，不会仅仅止步于议会选举，而是更加注重决定政党能否执政的总统选举。在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情况下，政治精英进行社会动员，往往具有随意性和暴力性。纵观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政体建立前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到，任何时期的政府，都深陷于广泛的社会动员与低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带来的社会倾颓和政治动荡之中。“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想要保持政治稳

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①

在议会制框架中，赢得议会选举，是任何政治精英获取执政机会的根本路径。在总统集权和家族政治退场的背景下，政治精英要进入议会，除了足够的选票外，还要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权力资本和行动方式进行改造，以保持对议会制度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如此，激进的社会动员，便有望得到遏制而趋于理性。另外，为使反对派政治精英有序参与政治，降低他们的政治疏离感，执政的政治精英在重建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权力的制衡。如在议会制下，政府由执政党与反对党联合组建；议会中的议长和副议长分别由执政党和反对党政治精英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分别由总统、执政党、反对派政党各提名三分之一构成等。这些不同以往的政治安排，让反对派政治精英也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到政府治理之中。

概而论之，更为透明、公正的议会选举，更为民主、公平的政治任命，以及更为自由、宽松的政党政治生态，无不显示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有所提高。在议会制政体建立八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局势日趋稳定。曾经以暴力方式重伤政治体制，试图推翻政府、瓦解政权的社会动员，在较为通达的民主制度的疏导下，变得较为理性。政党关系虽分分合合，但也总体缓和。这种态势使社会动员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由过去的常态化失衡迈向了低度平衡，未来也有可能转变为更高水平的平衡。

（三）政治安排“去部族化”推动政治生态革故鼎新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政治精英为赢得社会支持而进行的政治动员，不断强化着部族对政治运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2007年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分析家博加特列夫（В. Богатырев）评论道：“吉尔吉斯斯坦独立17年来，我们的国家既没有政治，也没有政治思想间的斗争，有的只是部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②随着巴基耶夫家族统治的结束，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众普遍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② М.Омаров: Трайбализм как зеркало кыргыз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ли Феномен трайбализма у кыргызов. 03.07.2007. <https://centrasia.org/newsA.php?st=1183410000>

希望国家权力的运作回归到制度化的轨道。阿塔姆巴耶夫当选总统后，为了重建政权，吸纳了诸多相对年轻的政治精英进入新体制。包括，任命萨帕尔·伊萨科夫（Сапар Исаков）为总统办公厅外交政策司司长；任命焦尔杜巴耶娃·英迪拉（Джолдубаева Индира）为总统办公厅司法改革司司长；任命阿卜迪勒·赛吉兹巴耶夫（Абдил Сегизбаев）为总统办公厅信息政策司司长等。而在政府的组成方面，总理由共和国党魁巴巴诺夫担任，其余3名副总理，分别由议会执政联盟中的阿塔·梅肯党、尊严党和故乡党的成员担任。在16个政府部委的领导人中，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有5名，阿塔·梅肯党有3名，尊严党有2名，其余职位分别由总统和总理任命。^①在这些政治任命中，没有一位政府要员来自总统家族。阿塔姆巴耶夫执政后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被任命为总理。与此同时，为政治避嫌，索隆拜·热恩别科夫的弟弟阿瑟尔别克·热恩别科夫（Асылбек Жээнбеков）辞去了议会议长职务。这显示出，阿塔姆巴耶夫试图规避部族和家族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运作的影响。索隆拜·热恩别科夫执政后，多次强调将与部族主义做斗争，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现在不允许部族统治。对我来说，2010年那些死于与‘家族-部族’（семејно-кланового）政权斗争的同胞的悲惨命运，也是我的痛苦和不幸。作为一个民选总统，我不允许‘家族-部族’势力统治这个国家。”^②索隆拜·热恩别科夫治下的政治安排，同样也努力规避着部族或家族因素的渗透。总统办公厅的人事任命和政府官员的任命，基本是由各政党提名选任，几乎无一来自总统的家族。^③诚然，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地根除部族主义对政治运作的影响，但议会制下有意识地“去部族化”的政治安排，将有助于推进吉尔吉斯斯坦政治革故鼎新，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① “Kyrgyzstan Chiefs of State and Cabinet Members”, 06.07.2010, <https://www.infoplease.com/people/world-rulers-country-or-region/profiles/kyrgyzstan>

② Президент Со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 пообещал бороться с трайбализмом. 04.05.2018. <http://www.ca-portal.ru/article:42416>

③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 Ведомства. http://www.gov.kg/?page_id=27290&lang=ru

（四）僵化的精英互动与阻滞的精英流通得到初步改善

在总统制下，总统党一党独大，并联合其他“亲总统”政党控制议会，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应对政治挑战手段。而在议会制政体下，政党联盟执政不仅仅是一种执政策略，更是一种制度化的机制。在议会制宪法的框架内，任何一方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很难成为绝对多数，政党联合执政便成为必然。政党联合执政、共同组阁，提高了议会党之间的竞争性和政治活力，打破了总统制下僵化、冲突性的政治精英互动模式。当然，由于议会制政体本身仍处于调试阶段，政党之间内在的利益分歧仍然很多，旧的精英互动格局虽已被根本动摇，但新的、和谐的精英互动格局尚未形成。在国家治理中，不仅政治精英之间尚未充分磨合，也没有与社会精英开展深度合作。正如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朱马卡迪尔·阿克涅夫（Жумакадыр Акенеев）所言，吉尔吉斯斯坦的精英阶层支离破碎，主要由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商业精英和地方精英（包括在地方或地区有影响力的公民）构成。遗憾的是，当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与地方精英的代表展开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①

“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精英在政治活动中和关系原则上达成共识的能力，以及对现有或新兴政治机构的支持。”^②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稳定也依赖于现有或新兴的政治机构，以及对新生代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吸纳和培育。无论是阿塔姆巴耶夫，还是热恩别科夫，在其执政过程中，都十分注重任用年轻的政治精英，并努力促进各方政党的代表共同执掌政府。这在改善精英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议会制政体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提供了更加开放、民主的制度环境，但带有“历史包袱”的老一代政治精英长期活跃在政坛，导致新生代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始终不能很好地参与政治。

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表明，吉尔吉斯斯坦议员的平均年龄，自1990年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从数量上看，在议会、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中，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人占绝大多数，

① Кто ответит за страну?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06.2013. <https://rg.ru/2013/06/27/kruglyi-stol.html>

② Ануар Аязбеков. Эльмира Ногонба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ценка и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2006. №3. С.62-73.

但年龄在 60-70 岁之间的人也并不少。^①这些政治精英，要么曾就职于苏联体制，要么接受过苏联时期的政治、文化教育。这意味着，第一，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态，必然或多或少地带有苏联旧制度的色彩；第二，新生代的政治精英，在现有体制中影响力仍然很弱。老一代政治精英认为，“新生代政治精英，既缺乏对现实政治的驾驭能力和对社会转型的工作思路，也缺乏切实可行的未来愿景。”^②受制于老一代政治精英，身居要职的新生代政治精英，通常很快就会被“退居二线”，更愿意置身于老一代政治精英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也正因为如此，热恩别科夫执政后的第一任总理——萨帕尔·伊萨科夫（Сапар Исаков），任职还不满一年，便因执政联盟的不信任而被迫辞职。从精英流通的角度看，要实现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与社会的持久稳定，在未来，必须努力创造更加宽松的制度和政治环境，培育来自各个族群的新生代政治精英，并促使精英群体的向上流通，以避免政治精英阶层的固化。

结语

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大多脱生于苏联体制，同时又深受社会、政治传统的影响，而带有地域性、民族主义性、部族性和依附性等政治特性。这些特性的交织，使吉尔吉斯政治精英在总统制下的政治互动，更多表现出冲突与斗争的成分，妥协与合作能力较弱。议会制政体建立后，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更加透明的选举进程、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等，为吉尔吉斯政治精英从耽于政治抗争回归政治理性自觉，从热衷暴力动员转向维护政治体制，从依赖部族传统转向诉诸正式制度等成为可能。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稳定，关键在于政治精英。在过去，总统集权制下的“家族政治”，一方面导致技术官僚被排挤出政治体制，造成政府无力应对和解决转型进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封闭、阻滞了精英群体的

① Шерадил Бактыгулов. Новая и старая элит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22.09.2015. <https://analytics.cabar.asia/ru/sheradil-baktygulov-novaya-i-staraya-elita-kyrgyzstana/>

② Анар Мусабо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стоит ли ожидать обновления в выборном сезоне 2017 года? Central Asian Analytical Network. 14.03.2017. <http://caa-network.org/archives/8579>

正常流通，导致总统权力场以外精英群体中弥漫着强烈的政治疏离感和反政府情绪。或可以说，精英流通渠道的阻滞，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爆发两次革命的重要诱因。可以观察到，吉尔吉斯斯坦也在有意培育和扩大精英群体间的政治共识，如通过对话和合作，规避“南北对立”的政治叙事，以促进南、北关系的良性发展；通过提高不同民族在国家政治中的代表性，以增强国家政治生态的活力，疏通精英流通的渠道。

【Abstract】 Most modern Kyrgyzstan political elites were born out of the Soviet system. They completed their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by means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democratic elections, political revolutions and so on. They generally have distinct regional political identity, profound nationalism, obvious power dependence and intertwined tribalism. These interwoven characteristics bring about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to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Kyrgyzstan after its independence. The structure of its political elites also has changed several times. The key to Kyrgyzstan political stability lies in its political el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ite circulation, it is crucial for the lasting stability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to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elites from all ethnic groups and promote their upward circulation so as to avoid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elite stratum.

【Key Words】 Kyrgyzstan Political Transition, Kyrgyzstan Political Elites, Kyrgyzstan Elite Flow

【 Аннотация 】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ышли из сове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системн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выборы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для завершен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ни отличаются чётк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глубоки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ом, очевид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ью от власти и клановостью.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дан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привело к конфликтам и борьбе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лог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им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трукту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в стране так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енялась. Ключ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лежит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циркуляции элит, культив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из всех этнических групп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ние их вертикальному продвижению вверх, избегая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имеет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циркуляция элит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塔吉克斯坦的劳务移民输出及其影响*

焦景丹**

【内容提要】移民问题是当代塔吉克斯坦国家、社会与经济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早在苏联时代，农业集体化及内部移民安置等政策，就已对塔吉克斯坦移民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些年来，随着劳务移民数量的增多，移民经济与移民汇款逐渐成为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工出口也逐渐替代商品贸易，成为塔吉克斯坦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然而，劳务移民的大量外溢，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本国多领域优秀人才以及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给塔吉克斯坦的社会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难题。

【关键词】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 塔吉克斯坦社会 塔吉克斯坦经济

【中图分类号】D523.8; F249.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6-0089(31)

1991年，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原本依靠苏联中央财政补贴与经济援助的国民经济也随之瓦解。1992年到1997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全面内战，导致工农业生产建设急剧下降、法治秩序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大量外流，国民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危机，也因此严重阻碍

* 本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项目 (2016CBZ015) 的阶段性成果；另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面向“十三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 (项目批准号：2016ZDA01) 的前期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章存在的纰漏和不足，由作者负责。

** 焦景丹，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

了塔吉克斯坦独立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内战期间，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向其他地区的扩散激发了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逃离的地区的人口迁移。内战结束前后，塔吉克斯坦境内人口的流动，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人口的大规模外迁以及塔吉克斯坦难民的持续回流等等。1996年，塔吉克斯坦国内约有697,000名难民逃离故土。之后，在塔吉克斯坦政府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力促进下，682,800名外流难民返回原居住地。但截至1997年9月1日，仍有14,800名外流难民未能返回原产地。^①内战结束后，塔吉克斯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但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加之长期的贫困与失业，使塔吉克斯坦国内劳务市场环境并未得到实质性地改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塔吉克斯坦公民不断地向域外移徙，劳务经济也逐渐在塔国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到目前，这种经济形式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宣布独立的27年以来，塔吉克斯坦已从难民输出国逐步转变为现今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根据塔吉克斯坦劳动、移民和就业部的统计，2016年，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人口达到517,300人^②，其中女性移民达到81,800人。劳务移民汇款是塔吉克斯坦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底，汇款额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尽管汇款额在2015年以后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仍是塔吉克斯坦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③大量的移民汇款缓解了国内人口就业不足的问题，为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杜尚别东方科学研究中心民意部负责人萨达特·奥利莫娃（Саодат Олимова）与国际移民组织驻塔吉克斯坦办事处主任伊戈尔·巴斯（Игор Боск）合作的研究报告《塔吉克斯坦的劳工移民》^④，是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问题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报告在全面梳理塔吉克斯坦经济、人口与劳工市场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特点、类型、目

① Parviz Khakimov, Moensho Mahmadbekov, “Economic Dynamics of Labour Migrants’ Remittances in Tajikistan”, Dushanb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9, p.14.

② Манижа Курбанова. Минтруда: в 2016 году в трудовую миграцию выехало полмиллиона граждан// Азия-плюс. 2017. 19 января.

③ Таджикским властям советуют най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у денежным переводам мигрантов// Азия-плюс. 2016. 25 ноября.

④ Саодат Олимова, Игор Боск.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из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2003.

的地等问题,并对劳务移民的社会影响以及政府的监管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国际移民问题研究专家阿不都-咖尔法·穆格哈尔 (Abdul-Ghaffar Mughal) 所著的《塔吉克斯坦的移民、汇款和生活水平》^①,是第一个以移民汇款为主题的研究,梳理了1991年以来塔吉克斯坦移民、汇款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变化,肯定了移民汇款对于塔吉克斯坦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为塔吉克斯坦政府的决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塔吉克斯坦人口研究所克卡里莫夫 (Parviz Khakimov) 和莫恩什·马赫默德别科夫 (Moensho Mahmadbekov) 合作完成《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汇款的经济动态》^②,主要分析了劳务移民汇款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影响,并对其积极和消极影响予以了辩证的分析 and 探讨。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经济与人口研究所主任胡德拉姆哈马德·乌玛洛夫 (Ходжамухаммад Умаров) 发表题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塔吉克斯坦劳务移徙:原因和后果》^③的研究报告,细致研究了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迁徙的原因、影响,移民汇款的渠道、作用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回迁与发展等等问题。以上各项研究大部分依托或者受助于国际移民组织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或其驻塔吉克斯坦办事处),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劳务移民问题的缘起、现状、内容、形式、发展、变化、政策、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塔吉克斯坦劳务经济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发展导向。除国际移民组织外,还有很多相关研究机构对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问题给予了诸多关注,包括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欧洲培训基金会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移民发展研究中心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等等。其研究内容大致涉及非正规移民问题、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问题、移民与减贫问题、移民人权保护问题等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国内对

① Abdul-Ghaffar Mugh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Tajikistan", Dushanb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7.

② Parviz Khakimov, Moensho Mahmadbekov, "Economic Dynamics of Labour Migrants' Remittances in Tajikistan", Dushanb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9.

③ Ходжамухаммад Умаров. Таджикиская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ушанб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2010.

于塔吉克斯坦社会、经济等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劳务移民问题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仅在李琪教授的文章《中亚国家移民类型和相关政策盘点》^①、纪祥博士的文章《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问题》^②、曹伊博士的学位论文《俄罗斯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③等少数论著中，对该问题有所涉及。但总的来说，专门研究塔劳移民问题的成果相对比较缺乏。

一、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问题的初始

塔吉克斯坦大规模的劳务移民输出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第一波移民潮是 90 年代初期到中期。在这一阶段中，塔吉克斯坦由于受内战影响，约有 60 万人离开国土，其中约有 30 万公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④。他们一般来自杜尚别及其周边地区，大部分从事卫生、教育、科学、工业与建筑工作。第二阶段是 90 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对外移民大部分是农村人口，一般在境外从事服务业、建筑业以及农牧业生产活动。第三阶段是 21 世纪以来。这一时期塔吉克斯坦的劳务移民发展出现很多新的特征，例如移民输出规模化、管理逐渐规范化等等。以年轻人和女性群体为代表的劳务移民在这一阶段也有所增加。年轻群体在境外多从事建筑等雇佣劳动，女性则一般从事小型贸易以及农业生产，大部分人受专业教育较少，俄语能力也相对较差。^⑤总的来讲，除内战的影响与推动外，贫困与失业才是导致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大量外溢的根本原因。此外，经济基础薄弱、可耕地资源匮乏、人口过剩等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塔吉克斯坦移民的迁徙与流动。

1997 年内战结束后，塔吉克斯坦开始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并在经济上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但由于治理力度疲软，加上通货膨胀、外债负担，以及

① 李琪：“中亚国家移民类型和相关政策盘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② 纪祥：“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③ 曹伊：《俄罗斯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年。

④ Рахмон Ульмасов о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Таджики — символ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сёл// Азия-плюс. 2017. 27 ноября.

⑤ 三个历史阶段时间划分见：Larissa Jones, Richard Black, Ronald Skeldon,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ajikistan”, Bright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and Poverty, 2007, p.9.

苏联遗留问题影响，到 90 年代末期，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观。不仅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其他原苏联国家，即使在中亚范围内，也是最贫困的国家。21 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但总的来看，发展十分缓慢，且与其他中亚四国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参见图 1）。大量本土公民为解决经济问题、缓解生活压力，开始不断向外迁徙。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周边邻国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与相对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是吸引着塔吉克斯坦大批的移徙劳动力前往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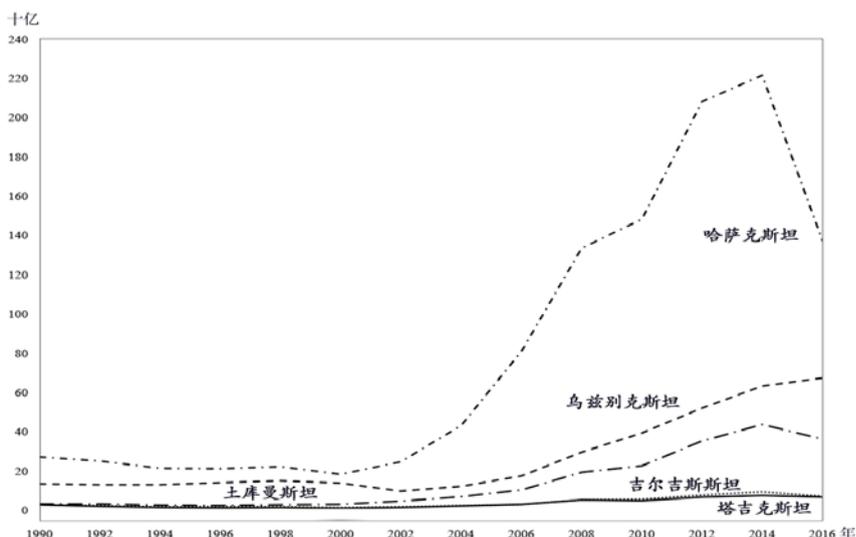


图 1 1990-2016 年中亚五国 GDP 发展趋势 (单位: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塔吉克斯坦国内就业机会有限。一方面，有限的可耕地资源无法满足大量农业人口的需要。据统计，2016 年，塔吉克斯坦全国约有 73% 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其中，戈尔诺-巴达赫尚州（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44.9%）农村人口达到 86.6%，索格特州（占全国面积的 17.7%）农村人口也达到 75.2%。^①

^① 数据来自: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на 1 января 2016 года, 2016.

作为一个高山国家，塔吉克斯坦国内 93%的土地为高山、湖泊所覆盖，且近一半的高山地区海拔在 10000 英尺以上，农业用地面积十分有限。可耕地资源的极度匮乏，造成了大量的农业人口无地可耕。并且，近些年来，随着塔吉克斯坦农业人口的继续增长，农业劳动力需求大大饱和，而非农业部门发展缓慢，更是无法为乡村多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相对于发达的城市地区，大多数乡村地区的工业建设和商业发展都非常缓慢，单靠农业和商业无法为农村地区快速增长的青壮年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①因此，随着劳动力需求的逐年下降，乡村地区隐性的劳动力过剩发展为显性的失业（表 1）。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塔吉克斯坦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约为 5.1 万人，其中失业妇女人口约为 2.7 万人，占当月失业人口总数的 51.9%。15-29 岁之间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状况也十分严重，人数基本在 3 万左右，一般占到当月底失业人口总数的 58%左右。此外，农村地区的人口失业相比城市地区更为严重。2017 年 4 月，塔吉克斯坦农村人口外流达到 47,930 人，达到当月失业人口总数的 85.5%。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量劳动力，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流向域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塔吉克斯坦农业人口过剩的压力，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汇款。然而，劳务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塔吉克斯坦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失业人口仍为数众多，领取失业救济的当地群众仍占较大比例。

表 1 2016-2017 年底塔吉克斯坦失业状况

	月底正式承认的 失业人数（人）	其中包括		农村地区		失业救济 （人）
		妇女	15 至 29 岁	共计	妇女	
2016 年						
1 月	52,392	28,188	...	37,390	19,577	10,354
2 月	54,663	29,679	...	39,347	20,675	9,799
3 月	54,504	29,692	31,793	39,302	21,295	96,94
4 月	54,925	29,902	...	36,573	19,953	10,215
5 月	55,766	29,515	...	39,610	20,821	11,870
6 月	53,400	28,309	31,366	37,902	19,345	11,709
7 月	53,664	28,509	...	38,778	20,050	11,252

^① Aziz Atamanov, Marrit van den Ber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local employment: analysis of self-selection and earnings in Tajikistan”, Merit Working Papers, 2011, p.3.

	月底正式承认的 失业人数 (人)	其中包括		农村地区		失业救济 (人)
		妇女	15 至 29 岁	共计	妇女	
2016 年						
8 月	53,688	28,625	...	38,734	20,064	11,308
9 月	53,477	28,542	32,068	38,600	20,186	11,664
10 月	54,827	28,787	...	39,964	20,487	12,503
11 月	55,299	28,512	...	37,734	18,921	13,097
12 月	53,087	27,359	31,744	38,751	18,421	13,199
2017 年						
1 月	54,035	28,395	...	37,206	18,725	10,777
2 月	55,745	29,719	...	38,900	19,980	10,770
3 月	55,742	29,684	31,753	40,071	20,798	10,986
4 月	56,090	29,726	...	47,930	20,092	10,929
5 月	56,293	29,312	...	40,976	20,985	11,733
6 月	53,959	28,766	32,124	39,648	20,558	10,480
7 月	52,752	28,435	...	38,784	20,520	9,785
8 月	51,598	27,793	...	37,297	19,255	9,468
9 月	50,367	27,107	30,302	37,164	19,296	9,367
10 月	51,105	27,169	...	37,268	18,732	9,973
11 月	51,461	26,698	...	36,861	17,979	11,777

资料来源：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январь – декабрь. Душанбе, 2018. С.227-228.

另一方面，高失业率也是造成塔吉克斯坦劳动力移徙的关键因素之一。造成失业的原因较为复杂，除以上提到的依靠农业无法解决乡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之外，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建设和商业发展缓慢。塔吉克斯坦过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农产品和半工业产品生产^①，在苏联时期，这种劳动密集型经济不仅促进了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独立以后，塔吉克斯坦原有的农业和工业部门持续萎缩，虽然近年来商业服务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大批城市工人，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失去工作机会，不得不移徙它地。

^① Mirzobobo Yormirzoev, “Determinants of Labor Migration Flows to Russia: Evidence from Tajikista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17, Vol.10, No.3, pp.72-80.

二、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的类型与特点

（一）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类型

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比较广泛，相应地，移民类型也比较多元。根据移民的流动范围，可分为内部移民与跨国移民；根据从事的职业与领域，可分为雇佣工移民、建筑工人移民、穿梭商业移民和农业移民^①；根据其是否符合迁移规范，可分为正规移民与非正规移民。除此之外，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其他的划分标准，例如按照职业选择的划分或者按照迁徙周期的划分等等。笔者综合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工作内容与特点，将其归结为雇佣工移民、穿梭商业移民以及非正规移民三种类型。

第一种，雇佣工移民。一般指在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中、拥有正式或非正式劳动合同的迁徙者^②，大部分从事建筑业与专业技术劳动，还有很大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建筑工人移民是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般根据合同、以单独或群体性的方式、在域外从事建筑事业^③。俄罗斯等国家的建筑业，为大多数塔吉克斯坦建筑工人移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来源。资历较高且拥有专业技能的雇佣工人，一般在工业企业和各类单位中担任技术人员和机器操作员等，例如工程师、机械师、电工、道路工、缝纫工。还有一部分雇佣工人从事服务业，例如出租车司机、酒店和餐饮业服务人员、家政服务人员以及各类杂工等。农业雇佣工移民一般指在国外租用土地耕种或在农业企业中从事季节性劳动的农业工人。塔吉克斯坦农业雇佣工移民大部分是季节性移民，多于春季到秋季迁往迁徙地，冬季返回原地。^④当然也有一些农业移民会在迁徙地停留几年或更长时间。农业移民一般根据合同规定的聘用时段，从事瓜果与蔬菜的种植，或者牲畜饲养，也有部分被雇佣为拖拉机等机器操作员或者技术工人。总体来说，塔吉

① 具体论述见：Саодат Олимова, Игор Боск.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из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2003. С.40-58.

② Саодат Олимова, Игор Боск.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из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2003. С.40.

③ Там же.

④ Jamshed Kuddusov, "Migration Problems in Tajikista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004, Vol.27, No.3, pp. 86-90.

克斯坦的雇佣工移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比较多元，专业、教育、个人能力等因素对行业选择的影响较大，不同职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总体来讲，雇佣劳动是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最为密集的从业类型之一。

第二种，穿梭商业移民（Shuttle traders）。也被称为“穿梭贸易商”、“旅游贸易者”或“购物游客”，是非正规就业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中占较大比例。这种穿梭贸易活动起源于苏联最后十年的“影子”经济。^①当时一些塔吉克人将本土的或从国外购买的小批量商品运送到比什凯克、塔什干等地的大型市场中销售，另一些人再从这些大城市购买能够满足本地需要的商品，运回本地或到另外的区域销售^②，通过这种跨地区间的中转贸易来赚取差价。苏联时期廉价的货物运输以及塔吉克斯坦低成本的商品生产，为穿梭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该项业务参与人数众多且利润丰厚，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穿梭贸易活动也并没有停止。20世纪90年代，穿梭贸易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商业现象。一部分穿梭贸易者，从事塔吉克斯坦到就近商贸中心或边境交易中心的短途贸易，这些零售商大多是在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上购买少量货物，为小城镇、定居点和村庄提供各种消费品。还有一部分穿梭商业移民前往国外大型贸易中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事的是批发交易，但也单独进行一些零售活动。与其他贸易方式相比，穿梭贸易具有诸多的优势，例如机动灵活、货物少、成本低、直接参与购物、运输方便以及无须外部投资或政府援助等。总的来说，穿梭贸易的长期发展，不仅吸引了塔吉克斯坦人口中最活跃和流动的部分，解决了数十万人的就业问题，而且为塔吉克斯坦家庭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近些年来，穿梭贸易移民对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发展仍有一定的贡献，但其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一方面，存在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地区的跨境穿梭贸易，是边界冲突的催化剂之

① Саодат Олимова, Игор Боск.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из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2003. С.49.

② Irina Mukhina, “Wom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shuttle trad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

一。^①很多穿梭贸易商出于经济目的，触犯境内外的边界管理规定，非法跨境以及走私活动十分频繁，而且还经常受到边境警卫的勒索、抢劫、绑架乃至生命威胁。^②再者，由于边界两侧人口多为不同民族，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冲突都可能引发严重的民族问题。而边界冲突的不断蔓延，不仅会给周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也会进一步危及区域安全与国际关系建设。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塔吉克斯坦及其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通货膨胀严重。2017年，塔吉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7%。^③同年底，吉尔吉斯斯坦的通货膨胀率为3.7%^④，乌兹别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则达到了14.4%。^⑤食品、非食品以及有偿服务的关税增加，使得各类消费品的价格大幅上涨，人口购买力逐渐降低，穿梭贸易商的商品销售量以及收入也都随之下降。2017年11月8日，俄罗斯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尔采夫（Владимир Колокольцев）宣布了禁止境内穿梭移民移徙的政令^⑥。对俄罗斯而言，该移民禁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境内非正规穿梭商业移民的流动，规范了劳务市场的秩序；但对于各移民输出国来讲，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穿梭贸易商的流动，使外汇收入骤降，更多的人口面临失业。

第三，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中，还存在为数不少的非正规移民。这里所指的“非正规”并不等同于“非法”，所谓非正规劳务移民，一般是指

①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щенко. Чья это вода, чья земля... Как живется в спорных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Фергана. 2012. 22 августа.

② Анвар Ташпулатов. 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й на таджикско-узбек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носит характер сводок из театр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2010.11.27. <http://tajmigrant.com/xronika-sobytij-na-tadzhijsko-uzbekskej-granice-nosit-xarakter-svodok-iz-teatra-voennyx-dejstvij.html>.

③ В прошедшем году уровень инфляци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составил 6,7 процента, ранее регулятор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л инфляцию по итогам 2017 года на уровне 7%// Sputnik-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8. 11 января.

④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уровень инфляции в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ом секторе в 2017 году составил 3,7%// K-News. 2018. 29 марта.

⑤ Согласно данным МВФ, инфляц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в 2018 году составит 14,3%, Центробанк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2018 году прогнозирует уровень инфляции в пределах 11,5-13,5%// Sputnik-Узбекистан. 2018. 9 января.

⑥ Ранее был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а практика, когда граждане СНГ по истечению разрешенного срока проживания (90 дней) без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Ф возвращались в родную страну через границу// Sputnik-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7. 8 ноября.

未通过官方登记或违反居住地相关注册规定（表 2）的移徙者。包括了非法入境、未进行移民登记、未获得工作许可或未签订劳动合同等情况。^①非正规劳务移民在移徙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例如报酬低、工作条件差，且一般无法享受正常的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对于塔吉克斯坦来说，非正规劳务移民的汇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该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意义重大，但终究影响了本国以及劳工流入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为此，塔吉克斯坦政府与俄罗斯等移民流入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与管理措施，但从目前来看，非正规劳务移民问题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

表 2 俄罗斯对入境中亚劳务移民的要求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有效护照	需要				
签证	不需要（最多 90 天）				需要
本地注册	要求到达工作地的 7 个工作日内				
合法工作的许可	不需要		需要准备必要的文件		

（二）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特点

1. 向周边邻国的近距离劳务移徙

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内陆，毗邻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早在苏联时期，塔吉克斯坦就与周边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苏联解体后，这些周边邻国成为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主要流入国（表 3）。塔吉克斯坦外出劳务移民在目的地的选择问题上，大都出于两点考虑：地理上的接近或者拥有相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俄罗斯是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最主要的流入国。^②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统计局的数据，2000 年塔吉克斯坦在俄劳务移民只有 6,200 人，此后，随着俄罗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塔吉克斯坦入俄劳务移

① Саодат Олимова, Игор Боск.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из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2003. С.12.

② Natalia Zotova, Jeffrey Harris Cohen, "Remittances and their social meaning in Tajikistan", *Remittances Review*, Vol 1, No. 1, 2016, pp.5-16.

民也在逐年增多，到 2014 年，达到了 60.31 万人。在这以后，俄罗斯深受政治危机影响，经济出现一定的下滑，劳工需求骤降。即使在俄罗斯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塔吉克斯坦在俄的劳务移民人数仍连年保持在 40 万人以上^①（表 4）。

劳务移民的长期发展，也促进了塔吉克斯坦公民在域外的定居。俄罗斯境内莫斯科州与莫斯科市以及斯摩棱斯克州、雅罗斯拉夫尔州、罗斯托夫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②，形成了一定的塔吉克人相对聚居的社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受塔吉克斯坦内战影响，数十万的塔吉克斯坦难民涌向国外，其中一部分外溢难民在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Волгогра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阿斯特拉罕州（Астрах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等地建立了定居区域，并在此从事农业和农村建设，在长期的发展与融合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区域纽带。^③20 世纪末开始，以伏尔加格勒、阿斯特拉罕等地为代表的俄罗斯农业生产基地，吸引了包括塔吉克斯坦人在内的大量中亚劳动力，自此以后，塔吉克人向这些地区的移徙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近几年来，塔吉克斯坦劳务工人向中部地区的移徙与定居也逐渐增多。2017 年，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心——弗拉基米尔州（Владими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已经存在数百个塔吉克斯坦移民家庭，在科利丘吉诺（Кольчугино）附近地区有 150 个家庭，在科夫罗夫市（Ковров）有 14 个，维亚兹尼基市（Вязники）有 70 个，古西-赫鲁斯塔利市（Гусь-Хрустальный）有 50 个，尤里耶夫-波利斯基市（Юрьев-Польский）有 70 个家庭。大多数的家庭在该地区主要从事蔬菜、水果种植以及少量的牧业生产活动。^④此外，新西伯利亚州也是塔吉克斯坦侨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据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移民局的报告，2017 年 10 月，约有 2.89 万名外国人通过该地区获得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осква, 2017. С.120.

② Андрей Захватов. Рахмон Ульмасов о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Таджики — символ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сёл//Спутник-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7. 24 ноября.

③ Саодаг Олимова, Игор Боск.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из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Миграции, 2003. С.24.

④ Андрей Захватов. Для многих таджиков стать обладателем 20 соток плодородной земли - голубая мечта// Спутник-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7. 10 апреля.

其中塔吉克斯坦的移民占到了 32%。^①总体来说，塔吉克斯坦入俄移民定居地的选择与其劳务活动有很大关系。从事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的移民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的莫斯科州与莫斯科市地区，而农业定居者则更愿意选择自然条件良好的南部与中部地区。

表 3 2016 年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迁徙目的地与持续时间

迁徙目的国	全部	6 个月或更少	7-12 个月	超过 12 个月
(人)				
全部	553,868	156,538	150,444	246,886
阿富汗	242	242
美国	1,047	359	329	359
吉尔吉斯斯坦	290	142	...	148
哈萨克斯坦	2,144	1361	377	406
乌克兰	406	406
俄罗斯联邦	548,942	154,676	149,738	244,908
捷克共和国	417	417
(%)				
全部	100,0	28,3	27,2	44,6
阿富汗	100,0	0,0	0,0	100,0
美国	100,0	34,3	31,4	34,3
吉尔吉斯斯坦	100,0	49,0	0,0	51,0
哈萨克斯坦	100,0	63,5	17,6	18,9
乌克兰	100,0	0,0	0,0	100,0
俄罗斯联邦	100,0	28,2	27,3	44,6
捷克共和国	100,0	0,0	0,0	100,0

资料来源：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рынке труда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Душанбе, 2017. С.164.

表 4 塔吉克斯坦在俄劳务移民数量 (人)

年	2000	2010	2014	2015	2016
人数	6,200	268,600	603,100	428,300	403,800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осква, 2017. С.120.

① Андрей Захватов. Не менее 2 миллионов уроженце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сегодня постоянно живут в десятках стран мира// Sputnik-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7. 18 августа.

再者，长期以来，塔吉克斯坦深受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近些年，塔吉克斯坦积极地推行“主体民族化”以及“去俄罗斯化”等政策，但从目前来讲，以俄语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化，仍然在塔吉克斯坦的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俄语作为塔吉克斯坦的族际交流用语，还广泛流通于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在选择移徙地时，一般也会优先考虑全部或部分以俄语作为通用语的国家或地区。相似的历史背景与语言环境，减少了塔吉克斯坦外出劳务移民与移徙地本土民众的沟通障碍，避免了移民过程中不必要的冲突与矛盾。此外，塔吉克斯坦作为欧亚经济共同体（EEC）的成员国之一，在 90 天之内，不需要签证便可以访问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国，而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白俄罗斯等国，更是基本没有签证要求。因此节省了办理签证的时间和费用，也方便了劳务工作的区域间流动。除此之外，近些年来，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移徙范围有所扩展，阿富汗、美国、捷克以及中国境内均有一定的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数量较少，但一般停留时间较久。

2. 劳务移民群体趋向年轻化

从年龄结构来看，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发展整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势。18-59 岁之间的青壮年移徙者在对外劳务移民中占有绝对比例。根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府统计局的数据（见表 5），2013 年，劳务移民总数为 793,447 人，其中 18-59 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总数为近年最高，达到 765,462 人，占当年劳务移民总数的约 96.5%。在这之后，俄罗斯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骤降，塔吉克斯坦劳动力的外流也随之大幅下降。2014 年，劳务移民总数下降到 669,090 人，到 2015 年，这一数字已降到 449,581 人。近几年来，随着劳务移民市场的变化，18 岁以下的未成年移民与 60 岁以上的老年移民比例也在逐渐上升。2009 年，18 岁以下劳务移民人数为 16,590 人，约占当年移徙劳工总数的约 2.4%，2015 年，这一数字上升为约 6.5%；60 岁以上劳务移民人数始终较少，最多时达到 17,846 人（2011 年），占到当年移民总数的约 2.3%。劳务移民的年龄分层与其就业类型有很大关系，18-29

岁之间的青年劳动力比例较高，一般从事的是工业、建筑业等对体力、健康和耐力要求较高的工作。29-59岁的劳务移民人数最多。这个年龄层的移民一般具有较高的资历和相对良好的教育背景，语言、文化和专业技能都相对较好，能够在域外各种国有和私人企业中找到合适的工作。

表5 到其他国家独立工作的塔吉克斯坦公民（人）

年	总计	年龄			
		18岁以下	18-29	30-59	60岁以上
总计					
2005	412,123
2007	573,953
2009	677,414	16,590	203,224	475,503	97
2011	750,070	56,407	359,456	157,546	17,846
2012	739,017	40,935	379,299	308,800	9,983
2013	793,447	23,681	314,684	450,778	4,304
2014	669,090	2,129	259,973	406,626	362
2015	449,581	23,910	208,368	207,794	9,509
男性					
2005	402,370
2007
2009	401,109	9,616	120,333	271,085	75
2011	663,337	49,505	321,900	275,621	16,311
2012	652,002	32,763	320,613	289,412	9,214
2013	693,355	18,276	279,114	392,876	3,087
2014	562,990	1,850	213,500	347,305	335
2015	392,141	17,205	184,824	183,340	6,772
女性					
2005	9,753
2007
2009	276,305	6,934	82,891	186,458	22
2011	86,733	6,902	37,556	40,740	1,535
2012	87,015	8,172	58,686	19,388	769
2013	100,094	5,405	35,570	57,902	1,217
2014	106,100	279	46,473	59,321	27
2015	57,440	6,705	23,544	24,454	2,737

资料来源：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6. С.268.

注：囿于篇幅，笔者对部分年份进行了删减

3. 男性劳务移民为主，女性比例逐渐升高

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在劳动力参与方面存在较大的性别差距，男性移民占绝大多数，女性移民人数相对较少，从事行业也十分有限，且一般都是季节性的短期移民。2013年，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达到约80万人，其中男性移民人数约为70万人，占到当年移民总数的约87.4%（见表5）。2014年开始，俄罗斯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劳动力需求量有限，进而导致塔吉克斯坦外出劳务移民人数也有所下降。总体来讲，男性移民在劳务移民整体中占有较大比例。然而，近年来，塔吉克斯坦男性劳务移民人数有所下降。从表5可以看出，2005年男性劳务移民人数为402,370人，占到全部劳务移民的约97.6%，但到2015年，该人数下降到392,141人，只占劳务移民人口总数的约87.2%，反之，女性劳务移民的人数则有了明显增加。2005年，女性移民只有9,753人，占总移民人数的2.3%，而到近几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20%左右，人数最多时甚至达到40.7%（276,305人，2009年）。女性劳务移民人口的增多与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升等原因有很大关系。过去，在塔吉克斯坦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配中，妇女的主要任务是抚养子女和照顾家庭，生计问题主要由男性负责，这使得女性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十分低下。独立以后，塔吉克斯坦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的女性劳务移民开始不断向外移徙，或是为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或是为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等等。塔吉克斯坦著名人权活动家勃勃纳兹洛娃（O. Бобоназарова）将女性移民群体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随丈夫外出移徙的妇女，她们一般不参与劳务活动。第二类为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这部分女性的移民原因较为复杂。对于未婚女性来讲，她们的对外移徙，主要是出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多为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或者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对于已婚妇女来讲，她们外出劳务，多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或者在丈夫收入不足的情况下，补充家庭消费等等。第三类为希望在移徙国获得更好生活条件或寻求更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的年轻女孩。^①总的来讲，女性劳务移民的迁徙大都是出于经

^① O. Бобоназарова: Женская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может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колоссальную проблему// Avesta. 2014. 23 декабря.

济目的,对她们而言,对外的劳务移徙是一种迫切的生存策略^①,是改善自身或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此外,塔吉克斯坦国内开放度和宽容度的提升、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也为女性劳务移民的外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般来讲,女性劳务移民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十分有限,一般是在境外从事季节性的农业劳动,有的则从事零售业、餐饮业和服务业,还有一部分女性移民从事医务或教育等工作。

三、劳务移民问题对塔吉克斯坦社会的影响

劳务移民给塔吉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元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劳务移民的对外输出减轻了本土劳动力过剩的负担,其所带来的汇款收入也是塔吉克斯坦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持续不断的劳务人口外溢,也导致了塔吉克斯坦国内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潜在负面因素。

(一) 劳务移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第一,劳务人口的大量外溢,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人口过剩的压力。

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人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局面。根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府统计局数据(见表6),2016年,塔吉克斯坦人口总数约为874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1人。杜尚别市作为塔吉克斯坦首府,政治经济较为发达,是国内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200人。索格特州与哈特隆州人口数量相对较多。戈尔诺-巴达赫尚州(6.37万平方公里)人口则最为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约3.5人,虽大部分人口为农业居民,但实际上可用的耕地面积却十分有限,无法为大部分的本地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独立之初,塔吉克斯坦人口约为550万,到2016年间,塔吉克斯坦总人口增长到约874万人,大约增长了37%。此外,高出

^① Касимова С.Р. Таджики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в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вынужденная тактика выживания или выбор свободных женщин?// Источник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2. №4. С.68-81.

生率与低死亡率也是加速塔吉克斯坦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2017年1月至9月,塔吉克斯坦官方登记的出生人口为161,900人(不包括之前的重复登记),死亡人数为24,700人(其中1岁以下的儿童为1,600人)。根据初步估计,总生育率和死亡率分别为24.5‰和3.7‰,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0.8%。^①人口的大量增长带动了劳动力规模的大幅扩张,使得塔吉克斯坦境内有限的劳动力市场无法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劳务人口的就业需要,因此,大量本土公民外出劳务,成为缓解塔吉克斯坦人口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表6 2011-2016年塔吉克斯坦人口情况(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人数	7,807,200	7,987,400	8,161,100	8,352,000	8,551,200	8,742,800
杜尚别市	748,000	764,300	775,800	788,700	802,700	816,200
中央直属区	1,786,100	1,832,200	1,874,000	1,922,000	1,972,300	2,021,200
索格特州	2,298,800	2,349,000	2,400,600	2,455,500	2,511,000	2,560,800
哈特隆州	2,765,800	2,831,700	2,898,600	2,971,500	3,047,800	3,124,400
戈尔诺-巴达赫尚州	208,500	210,200	212,100	214,300	217,400	220,200

资料来源: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Регионы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7. С.18-21.

注: 囿于篇幅, 笔者对部分内容有所删减

第二, 劳务移民所带来的汇款, 是推动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发展的的重要因素。俄罗斯使塔吉克斯坦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根据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的数据统计, 2013年, 俄罗斯流入塔吉克斯坦的移民汇款达到41.73亿美元, 占到塔吉克斯坦当年GDP的56.89%。在这以后, 俄罗斯深受政治经济危机影响, 外汇资金大幅下降。2016年, 俄罗斯流入塔吉克斯坦汇款下降到19.29亿美元, 但仍占到塔吉克斯坦GDP的29.45%。2017年入塔汇款额出现一定的回升, 据统计, 以个人(包括居民和非居民)名义, 从俄罗斯向塔吉克斯坦的劳务移民汇款总额约为25亿美元, 大约占塔吉克斯坦GDP的约40%。^②(参见图2)移民汇款对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①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бедность №.3-2017. С.87.

② Егор Петров. Проводник против Нацбанка. Почему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предъявил

一则，汇款收入的增加，降低了塔吉克斯坦国内贫困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到2015年，塔吉克斯坦的贫困率从73%降至31%，2017年，这一数字降到29.7%，相比去年下降了1.4%^①。塔吉克斯坦国内收入的增长以及贫困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以俄罗斯为主的劳务移民流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塔吉克斯坦外汇也随之大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尤其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哈特隆州与戈尔诺-巴达赫尚州等地区，汇款在解决剩余劳动力以及降低农业人口贫困率等方面，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再则，汇款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移民家庭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像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劳务移民汇款收入通常用于改善基本的生活条件，例如用于购买新房、汽车、电器、家具、衣服等商品，或者用于支付婚礼、丧葬等大型活动消费^②，以及投资子女教育或者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等各项消费。此外，一部分资金还用于返乡移民群体的再创业。一般来说，很多回迁劳务移民若不再外出，一般会选择在当地或到发达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或者是用家庭消费的剩余资金来投资小成本的经营活。例如有的返乡移民会使用一定资金购买货车，并来往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从事商业运输，有的则开展小成本的商品贸易或餐饮服务等。另一方面，返乡劳动力也利用剩余汇款，积极参与开发本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处女地的开发，尤其在农村地区，移民群体经常会将大量资金用于修建房屋、租用耕地等等。从社会用途来说，塔吉克斯坦很多移民汇款被用于本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民营企业的投资等等。当然还有很多资金被用于社区内的公益事业，例如通过建设社区、学校、医疗机构、宗教场所等基础设施，来补充当地现有的社会服务系统。

невыполнимые условия системам денежных переводов// Фергана. 2018. 10 мая.

① Мавзуна Абдуллоева. Стагагентство: Почти 30% населен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находя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бедности// Азия-плюс. 2018. 16 февраля.

② Natalia Zotova, Jeffrey Harris Cohen, “Remittances and their social meaning in Tajikistan”, *Remittances Review*, 2016, Vol.1, No.1, pp.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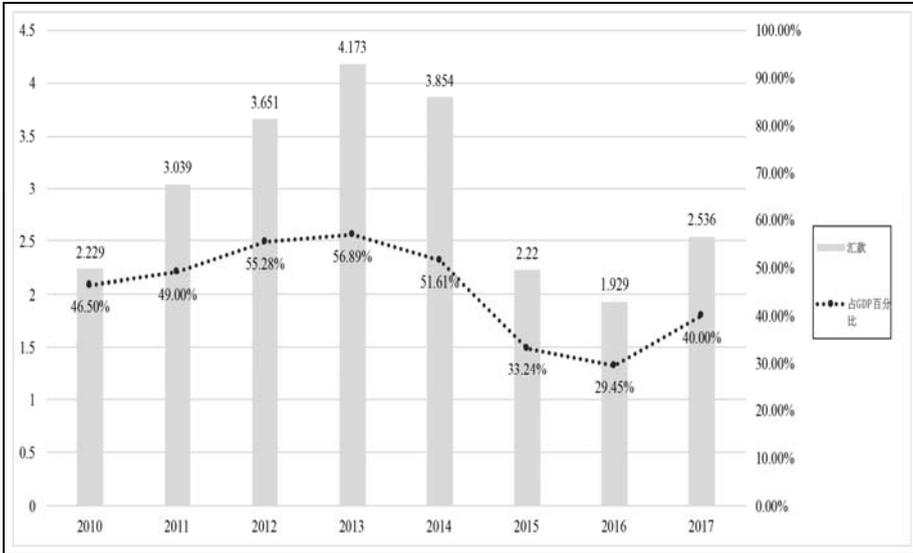


图 2 来自俄罗斯的劳务移民汇款（十亿美元）及其占 GDP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http://www.cbr.ru/statistics/default.aspx?PrId=svs>

第三，金融汇款行业竞争激烈，促进了银行业与其他汇款经营者的发展。

早些时候，塔吉克斯坦国内并没有完善的汇款制度与服务，大部分银行只支持办理最基本的金融业务，外汇资金的手续费也相对比较高昂。在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选择现金运输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敲诈勒索与偷窃等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将所获收入安全且低成本地转给自己的家人或者带回原住地，是塔吉克斯坦移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2001年9月25日，塔吉克斯坦政府取消了跨境银行汇款缴纳30%税收的规定，并积极改善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如此一来，大量移徙工人便可以在不常维持账户的情况下，长期地、间歇性地通过银行系统转移资金。近几年来，塔吉克斯坦劳务经济发展迅速，汇款在增加国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应地，也促进了汇款业务的发展。目前，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广泛使用的跨境汇款方式主要

包括：SWIFT转账系统、国际转账支付系统、邮局汇票和电子汇款。^①其中，SWIFT转账系统是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境外汇款最常用的汇款渠道之一。在该系统中，每家银行（包括分行）都有独特的SWIFT代码，一般由字母和数字组合^②。客户在向国外汇款时，一般要提供银行的SWIFT代码，除此之外，还要提供银行英文名称、拉丁文拼写的收款人姓名、收款人账号（由20位数字组成）^③等等信息。与国际转账支付系统相比，SWIFT系统在收费方面更加便宜，但相对来说，汇款所需时间较长^④。国际转账支付系统也是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所选择的主要汇款渠道之一。目前使用较多的国际支付系统包括“Золотая Корона”、“Юнистрим”、“Колибри”、“Вестерн Юнион”、“Лидер”^⑤、“Контакт”、“Moneygram”、“Киберденьги”等。其中“Золотая Корона”、“Юнистрим”、“Контакт”以及“Вестерн Юнион”四大系统，占据了塔吉克斯坦移民汇款约86%的市场份额。^⑥这些支付体系一般无需汇款方开立银行账户或者借用邮局等渠道，即可将资金记入账户或者以现金形式传输^⑦，免除了银行系统一系列的手续；汇款速度很快，一般15分钟-24小时左右即可到账。^⑧当然，这些支付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很多汇款系统是在不开立银行账户的情况下进行资金转移，尤其是个别系统还额外提供免费信息通知的服务，如此一来，资金很容易被犯罪分子盗取。很多银行为降低风险也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例如，在没有相关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汇

① Партнер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Как правильно оформить денежный перевод// Азия-Плюс. 2016. 17 ноября.

② 例如，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SWIFT 代码为 SABRRUMM011，其中前四个字母(SABR)是银行机构代码，之后两个字母是国家或地区代码（俄罗斯为RU），接下来两个字母组合代表银行位置，这里用MM表示，最后三个字母则为指定分行的代码。

③ Что такое SWIFT-код Сбербанка России. <https://bankclick.ru/info/что-такое-swift-kod-sberbanka-rossii.html>

④ Alisa Lisitsyna. Тонкости переводов через систему SWIFT. 19.10.2012. www.prostobank.ua/denezhnye_perevody/stati/tonkosti_perevodov_cherez_sistemu_swift

⑤ 今年4月中旬，俄罗斯中央银行吊销了“Лидер”支付系统的经营许可证，并将其从支付系统运营商中除名。

⑥ Егор Петров. Проводник против Нацбанка. Почему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предъявил невыполнимые условия системам денежных переводов// Фергана. 2018. 10 мая.

⑦ Партнер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Как правильно оформить денежный перевод// Азия-Плюс. 2016. 17 ноября.

⑧ Alisa Lisitsyna. Тонкости переводов через систему SWIFT.

款金额相当于 2.8 万索莫尼（按塔国家银行的汇率计算），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转移，如果汇款金额高于此，则须向银行提交佐证文件等等。^①

（二）劳务移民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劳工移民的大量外溢不仅打乱了塔吉克斯坦本地的人口结构，也为塔吉克斯坦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长期的、代价高昂的负面影响。

第一，人才外流。“塔吉克斯坦是世界上高级人才外流率最高，且居高不下国家之一。”^②从苏联时期开始，塔吉克斯坦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迁徙至俄罗斯等域外国家。造成塔吉克斯坦人才外流的原因，主要体现为内因与外因两个层面。从内因来讲，苏联解体、国家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严重破坏了塔吉克斯坦原有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秩序，使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局势极不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再者，独立之初，塔吉克斯坦还未能建立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各类行业发展缓慢，工资水平较低，且教育水平和福利待遇整体较差。大量本国公民为改善生活状况，通常会到其他国家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其中也包括了大量工业、建设、农业、医学、教育等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从外因来讲，近些年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无论是在就业环境还是人才待遇方面都优于塔吉克斯坦，也因此吸引了不少塔吉克斯坦知识分子前往就业。再者，同其他中亚国家相比，俄罗斯有着更发达和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塔吉克斯坦移民在俄罗斯可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服务。此外，近几年来，俄罗斯对于基层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更多需要的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并能够为其提供更高的工资和待遇，例如为青年专家学者提供住房、医疗等基础条件，并为其教育、科研等提供资金援助；同时以本国各高端科研院所为平台，积极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也吸引了塔吉克斯坦高层人才的外向流动。

① Партнер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Как правильно оформить денежный перевод// Азия-Плюс. 2016. 17 ноября.

② 李琪：“中亚国家移民类型和相关政策盘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第二，本地家庭结构的变化。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对外移徙，塔吉克斯坦国内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对本地的家庭结构和人员分工等问题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在大量移徙国外的成年男性中，已婚人士占较高比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受家庭贫困、赡养老人、儿童教育等问题的压力所驱动。很多家庭中的男性移民在外停留时间较长，妇女大多被留在国内，负责照顾老人和小孩，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都很大，经常会造成夫妻间的多重矛盾。而一些男性移民由于长久不能返乡，有的会在当地建立新的家庭，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塔吉克斯坦离婚率的上升。其次，由于男性劳动力的流动造成了家庭管理结构的失衡，越来越多的移民家庭由女性领导。尽管妇女担任家庭户主的新角色，并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权力和赞赏却较少。^①尤其男性移民的汇款收入一般是寄给父母管理，女性对于财产没有主导权，而且在未能收到男性移民足够的汇款的情况下，除补给家庭基本花销以及儿童教育、家庭医疗等费用外，她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也并未有所提高。再次，塔吉克斯坦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越来越大。为减轻家庭的负担，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外出务工，尽管俄罗斯劳务市场中对于男性劳动力，尤其是廉价的、从事基础劳动的人员需求很高，但对某些特定职业的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呈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一般更具流动性，能够较容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且更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对劳动力多元的需求。

此外，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大量外溢所造成的“留守儿童”逐渐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家庭来说，其子女多被委托给亲属照顾，或者长期（或临时）安置于当地私人（少数公立）幼儿园、学前机构或寄宿学校^②；而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儿童则被安置在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由于缺乏父母照顾以及，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营养不良、抑郁以及自闭等倾向。此外，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很多移民家庭的子女性格叛逆，学校及社会对他们的约束力十分有限，青少

① Natalia Catrinescu, Jack Willis, Valentina Barca, et al, “Impact of Labour Migration on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Tajikistan”, Dushanb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11, p.7.

② Частный детский сад: куда таджики отдают своих детей в России// Спутник-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7. 14 июня.

年的犯罪率大幅升高。2017年，仅在塔吉克斯坦中央直属地区，就发生了181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比2016年增加了43.7%。这些青少年大多是出自劳务移民家庭。^①对于丈夫外出务工的家庭来说，家庭的责任几乎全部由妻子承担。然而，当妻子无法承受大量的农业以及社会劳动，抑或是当丈夫未能按时汇款或者汇款金额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儿童被迫在很小的年龄开始外出劳动，以补贴家庭基本的生活消费。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加入到对外劳务移民群体中，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2009年，18岁以下劳务移民占到了移民总数的2.4%，到201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3%，最多时甚至达到了7.5%（2011年）（见表5）。总的来说，“留守儿童”问题的起因与发展与塔吉克斯坦劳务经济发展形态息息相关。因此，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教育环境、优化社会福利建设，是塔吉克斯坦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有效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三，劳务移民回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地区安全的潜在因素。2014年以来，俄罗斯由于受西方制裁影响，卢布贬值，国内经济发展受到重挫，各行各业劳务人员的需求量骤降，在俄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大量失业，开始纷纷向原地回返。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俄罗斯境内的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有60多万人，2016年下降到40万人左右（见表4）。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这三年中，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回流劳务移民几乎达到了20万人。大量境外劳务移民的持续回流，给塔吉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境外的汇款急剧减少，使国内整体的经济建设缺乏资金支持，多项事业的建设面临瓶颈，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随之有所降低，通货膨胀愈加严重。根据欧亚发展银行（ЕАБР）的数据，2014-2018年间，塔吉克斯坦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将从6.1%（2014年）增长到8.5%（2018年），GDP从6.9%（2016年）降到6.1%（2017年），预计2019年，这一数值将下降至5.8%。^②塔吉克斯坦整体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呈现放

①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в районах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го подчинения несовершеннолетними в 2017 году совершено 181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что на 43,7% больше, чем показатель 2016 года// Спутник-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8. 5 февраля.

② По данным ЕАБР,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замедление рос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на фоне возросшей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Спутник-Таджикистан. 2017. 9 июля.

缓乃至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大量劳工滞留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基本的生存问题得不到保障。迫于生活的压力，很多人则开始从事偷窃、抢劫、贩毒等犯罪活动。从表 7 数据可以看出，在 2014 年到 2016 年间，塔吉克斯坦的犯罪记录增长了 2,000 多件，其中尤以盗窃和毒品犯罪最为多发。犯罪人群主要以成年男性为主，他们大多肩负供养家庭的压力，在失业或现有工作不能满足其各项需求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将成为潜在的犯罪主体，更甚者容易受到宗教极端组织的招揽与利用，对国内甚至区域安全造成潜在影响。

表 7 2011-2016 年塔吉克斯坦国内犯罪情况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犯罪记录总数	16,900	16,600	18,300	19,400	21,600	21,800
其中：						
有预谋的杀人和杀人袭击	150	106	117	107	121	98
有预谋的重伤	93	91	107	124	110	115
强奸和企图强奸	66	55	54	58	41	49
盗窃罪（重罪）	204	269	175	154	152	159
抢劫	84	43	54	45	51	54
盗窃罪（包括多种偷窃行为）	3,669	4,155	3,643	3,684	4,761	5,064
毒品犯罪	896	863	885	962	928	816
违法者人数	10,423	12,799	13,470	14,544	15,599	16,320
男性	9,117	11,169	11,692	12,666	13,719	14,581
女性	1,306	1,630	1,778	1,878	1,880	1,739
犯罪者的年龄						
14-15 岁	121	117	129	170	138	118
16-17 岁	363	543	609	617	562	545
18-24 岁	2,354	2,562	2,592	2,863	3,095	2,799
25-29 岁	1,880	2,133	2,306	2,478	2,745	3,053
30 岁及以上	5,699	7,441	7,826	8,416	9,059	9,805

资料来源：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 цифрах, 2017. С.74-75. 注：囿于篇幅，笔者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

四、塔吉克斯坦政府对劳务移民的管理

在劳务移民发展问题上，塔吉克斯坦政府始终坚持的是积极推动的政策。在此过程中，为保护海外塔吉克斯坦籍劳务移民的各种权益、鼓励本土失业人口的流动与就业、改善与主要移民接受国的国家关系，同时规范塔吉克斯坦境外劳务移民的流动、对非正规劳务移民实施监管等等，塔吉克斯坦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制度与监管措施建设。总体来说，塔吉克斯坦政府对劳务移民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与制定监督制度

塔吉克斯坦独立以后，面对劳务移民问题及其影响的日渐加重，政府也相应地开展了对劳务移民的规范化管理。早在 2001 年，塔吉克斯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即劳动部）就在莫斯科等地设立了代表处，为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提供各类劳务信息、法律支持和意见咨询等服务。^①2004 年 1 月 1 日，塔吉克斯坦开始实行移民登记卡制度，主要用于统计移民原籍地、性别、年龄、教育层次、迁徙目的地、迁徙原因等等基本信息。2006 年 11 月，塔吉克斯坦发布“关于改善国家中央行政权力机构结构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原属于塔吉克斯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移民管理权限，被逐渐移交给内务部。^②同年 12 月，内务部成立移民局，作为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管理的主要机构。2011 年 1 月，塔吉克斯坦撤销内务部移民局，在政府内组建新的移民局，“主要负责统一协调劳务管理问题，维护劳务输出人员的权益，调节劳务输出问题，对劳务输出人员进行职业再培训，保障他们能尽快找到工作，并负责与境外的侨胞和外国公民（指迁居国外并取得迁居地公民身份的本国公民——笔者注）保持联络。”^③这一系列相关部门的设立以及政策法规的推出与实施，一方面解决了国内大量人口的失业问题，鼓励了国际劳动力的流

①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the migration systems in the CIS countries”, Vienna: Eigenverlag, 2005, p.227.

② “Tajikistan: Extended Migration Profile”, Building Migration Partnerships (BMP), 2010, p.51.

③ 胡梅兴：“当前塔吉克斯坦面临的困局及前景”，《国际资料信息》，2011 年第 8 期。

动，对于减少社会矛盾、发展国民经济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国内劳务移民输出的正常秩序，为移徙者的出入境、居留、择业等权益，以及改善劳务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关系等等，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签署一系列的多边与双边协定

为推动劳务移民的输出，塔吉克斯坦借助独联体平台，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成员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多边与双边协定。例如，1994年4月，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签署了《劳务移民移徙和社会保护领域的合作协定》，对劳务移民的招募程序以及移民工人的税收、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等问题做出了规定；并提出了缔结国之间应为外国劳务移民制定年度配额，或通报劳动力市场变化情况。2009年6月，塔吉克斯坦政府对这一协定进行了修正。^①1998年3月，独联体成员国签署了《关于独联体成员国与非法移民做斗争的合作协定》。2004年10月8日，塔吉克斯坦与俄罗斯签署《关于塔吉克斯坦公民在俄罗斯的劳工移徙与社会保护问题的协定》。^②2008年5月30日，塔吉克斯坦政府与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市政府签署劳务交换领域的合作计划；同年11月14日，签署《关于独联体成员国移徙工人及其家属合法身份的公约》。^③2013年12月21日，俄罗斯议会下院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关于塔吉克斯坦公民在俄罗斯驻留规则的政府间协议，将塔吉克斯坦公民抵达俄罗斯的登记时间从7天延长到15天。^④这些协定的签署，一则使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在境外的身份与地位得到确认，保障了塔吉克斯坦公民从事合法经济活动的权利；二则也对非法劳工的移徙予以监督和控制。

① Mastibegim Milikbekova,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Human Rights: Tajik Irregular Migrant Workers in Russia”, Lund: University of Lund, 2005, p.15-16.

②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the migration systems in the CIS countries”, p.217.

③ “Tajikistan: Extended Migration Profile”, Building Migration Partnerships (BMP), p.58.

④ Russian parliament ratifies agreement on the rules of stay of Tajik nationals in Russia// Азия-Плюс. 2013. 21 декабря.

（三）制定相应的劳务移民律法

1999年11月12日，塔吉克斯坦政府颁布《移徙法》^①，标志着该国劳务移民在法律层面的规范化管理的开始。该法引入了“移民”“海外劳务移民”“过境劳务移民”“劳工移民”等等概念，指出塔吉克斯坦政府应规范劳务移民的输出与引入，确定了移徙过程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基础，并对劳务移民的移徙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2002年颁布《关于移徙法的修改法》，在原《移徙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外来劳动力移徙”、“移徙工人”等概念。这些概念的确定，使得塔吉克斯坦公民的劳务移徙与境外就业“被认可为国家就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②。这项《移徙法》又分别在2005年、2008年、2010年进行过修订与补充。此外，2004年4月，塔吉克斯坦总统颁布了“关于加强塔吉克斯坦打击非法移民工作”的法令。2006年，塔吉克斯坦政府通过“2006-2010年塔吉克斯坦海外劳工移民五年计划”。该计划完成后，2011年，又通过了《对外劳务移民法》以及“2011-2015年塔吉克斯坦对外劳务移民发展战略规划”。这一系列劳务移民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塔吉克斯坦政府的劳务移民立法，同时也为境外从事劳务活动的塔吉克斯坦公民提供了安全保障，更为其在境外接受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服务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支持。

总的来说，塔吉克斯坦政府对于劳务移民的管理已有一定的成效，在移民制度建设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根本上讲，劳务移民管理制度、机制建设以及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仍存在缺陷和漏洞。目前来讲，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管理部门主要是移民局、大使馆以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其所能提供的服务项目有限。此外，塔吉克斯坦地方移民管理的行政建制显得十分薄弱，即使是在劳务移民人口输出占较大比例的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也未设立专门的、独立运行的移民管理机构，使得地区一级的劳务移民人口统计、规划与管理都工作都十分薄弱。此外，在劳务移民管理合作方面，塔吉克斯坦与其他移民流入国之间的很多合作协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

① “Tajikistan: Law No.881 of 1999 on Migration”, National Legislative Bodies/National Authorities, 1999.

② Jamshed Kuddusov, “Labor market and population employment”, Dushanbe, 2004, p.106.

且在执行时间、范围、效力等方面多有偏差。例如，2004年10月，塔吉克斯坦与俄罗斯签订《关于塔吉克斯坦公民在俄罗斯的劳工移徙与社会保障问题的协定》，2005年1月塔吉克斯坦政府批准了该协议，但到2006年7月，俄罗斯政府才予以批准，并把实施日期推迟到了2007年1月。也就是说，在协议签订后的两年之内，该协议在俄罗斯范围内并没有发挥任何效力，塔吉克斯坦在俄劳工也无法享受协议所规定的各项待遇。并且，从协议本身来讲，其中基本没有涉及未成年劳务移民与女性劳务移民问题，对于加强劳务移民专业教育与培训、法律与社会保障服务等的内容也涉及较少。

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来移民的管理日趋严格，不仅加重了对于非正规劳务移民的处罚与限制，而且不断提高劳务移民准入。这些政策的推行，使塔大量劳务移民滞留国内，给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深重影响。因此，完善劳务移民的制度化管理、有效提供劳务移民服务、加强与劳务输出国之间的多元合作等等，仍是当下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结 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规模劳务移民的国际流动俨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活动。大量劳务移民为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高度发达的国家。^①对于塔吉克斯坦来说，独立前后，其国内即已存在的普遍贫困、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在当代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建设中仍发挥着持续性地影响。大力推进劳务移民的境外输出，成为缓解塔吉克斯坦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然而，大量劳务移民不断向周边国家涌入，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人口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但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劳务移民问题作为塔吉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不仅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关键地位，而且对于区域政治合作、国际关系发展、跨界文化交流发

^① Тютерева А.Р., Кузнецов М.М.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ути решения//Экономик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2015. Т.1. № 3. С.123-135.

展等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合理规划劳务移民市场的发展秩序、保护海外劳务移民的各项权益、遏制非正常劳务移民的移徙等等问题，仍然是塔吉克斯坦当下乃至未来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关键任务。

【Abstract】 Labor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ajikistan. Early in the Soviet era, Tajikistan migration structure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domestic resettlement polic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owing emigrants, the migration economy and remittanc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ajikistan 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Labor exports also gradually replaced commodity trad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Tajikistan economy. However, the massive spillover of labor migration, to a great extent, has caused the outflow of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ers, causing new problems to Tajikista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ajikistan Labor Migration, Tajikistan Society, Tajikistan Economy

【Аннотация】 Иммигра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Ещё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т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внутреннее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оказала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руктуру таджик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 ростом числа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им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денежные переводы мигрантов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ли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а экспорт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заменил товарную торговлю, став важной опор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Однако массов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явлений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привело к значительному оттоку талантов из страны и потере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молод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новым проблемам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таджик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族群问题研究

苏联分离主义的历史分期和特点研究*

艾苏**

【内容提要】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民族主义者从开始要求独立的那一刻起，才成为分离主义者。以“整合国家”和“边疆国家”这两个概念及其主要特征为理论基础，能相对有效地厘清苏联政府在边疆地区遏制分离主义的政策。总体而言，苏联建国时期与解体时期才是分离主义的兴起阶段，而在1956年至1961年、1961年至1985年的两个历史阶段期间，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在体制框架之内；他们从未正式提出各自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要求，所以苏联在此期间是民族主义问题，尚未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1956年至1985年是改善国内民族气氛最良好的时期，然而苏联政府错过了这次机会。

【关键词】苏联民族问题 苏联民族政策 苏联分离主义 整合国家 边疆国家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6-0120(24)

苏联长期以来在对内对外宣传上不断地尝试塑造整合国家的形象，以至于大多数苏联公民产生了一种错觉：在这个国家中，少数民族没有受到压迫，也并没有实现独立的诉求。这一时期，“国家人民团结”、“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共同体形成”等，成为苏联人民的主导思想。然而，不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15@zh009）阶段性成果。

** 艾苏（Alsu Tagirova），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改变的民族政策及遏制分离主义的尝试，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以及边疆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先后独立。

刘晓原在梳理国家与其边疆地区之间关系时，提出了“边疆国家”这一概念。他在《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一书中写道：“‘边疆国家’是相对‘整合国家’而言。‘整合国家’的主要特征如下：（1）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2）国家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3）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4）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①需要指出的是，刘晓原的书里没有对边疆国家的概念和特征的阐述，他主要意思是，不具备上述特征的国家，就是“边疆国家”。本文以“整合国家”和“边疆国家”两个概念及其主要特征为理论基础，试图对苏联政府在边疆地区遏制分离主义的政策进行初步探究。

苏联政治家一直把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当作严重威胁。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苏联决策层也制定了相应的民族政策。毋庸置疑，不同的国家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观点也有所不同。概括来说，在革命时期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上台之后，逐渐改变了自己民族政策的目标，严格限制少数民族的自主权。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坚决抑制地方民族主义，积极推动俄罗斯精英的心理优越感。^②然而，到赫鲁晓夫上台时，作为“去斯大林化”过程的一部分，政府放弃了极端的民族政策，推行了使那些曾被迫迁徙的部分少数民族返回故乡的措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中央与地方官僚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中央对周边地区的多变态度导致了民族运动的兴起。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已

① 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xxv页。

② Terry Marti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 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9.

成为地方知识精英团结起来的基础。

中国学界对苏联的民族政策历史非常关注，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政策的转变。^①同时，中国学者在著作中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在苏联民族问题中的核心地位。^②外国学界往往注重苏联建国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政策，中间的数十年历史则被忽略。^③近 20 年来，在原苏联国家学者的研究中出现了对历史的不同评价，可惜的是，其中一部分学者无法摆脱苏联时代思想的影响，而另一些则从极端民族主义角度来阐述民族问题的发展历史。^④

分离主义经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而在苏联历史上，各种政治危机往往导致民族主义升温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转变成分离主义运动。本文试图以苏联为例更加深刻地理解：在边疆国家，少数民族如何从要求更多的民族权利，发展为要求实现民族独立；以及国家政府如何应对民

① 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包毅：《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左凤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14-22 页；王立双：《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论文，2014 年；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张建华：《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何俊芳、马戎：《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陈黎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年；杨育才：《帝国民族的碎片：俄罗斯人问题与地区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③ Terry Marti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I. Bremmer and R. Taras(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Yaroslav Bilinsky, “Education of the Non-Russian Peoples in the USSR, 1917-1967: An Essay”, *Slavic Review*, Vol.27, No.3, Sep.1968, pp.411-437; Michael Gelb, “An Early Soviet Ethnic Deportation: The Far-Eastern Koreans”, *The Russian Review*, Vol.54, July 1955, pp.389-412; L.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R.G. Suny,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ethnic cultur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SSR – root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G. Lapidus,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Mohira Suyarkulova, “Reluctant Sovereigns? Central Asian States’ Path to Independence”, in Sally N.Cummings and Raymond Hinnebusch, *Sovereignty after empire. Comparing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pp.127-153.

④ 例如 Вдовин А.И.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в XX веке.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0; Барсенков А.С.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XX в. М, 1993.

族主义思潮。限于篇幅，难以对以上所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苏联反分离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为研究对象。

一、“积极民族政策”与苏联的领土扩张(1917-1934年)

历史上的帝国国家，为了避免民族运动的兴起，经常采用消极的手段，侵蚀少数民族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布尔什维克一直对民族主义持有“支持和怀疑”的双重态度。因此，在他们领导之下形成的苏联民族政策，“旨在通过赋予各地民族自治权利，来解除民族主义武装力量。”^①他们积极支持非殖民化运动，以此防止国家各地分离主义的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苏联这一“积极民族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维持帝国状态的激进策略。^②

苏联第一波分离运动浪潮起源于内战时期，当时许多反共产党的团体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中吸取教训，苏联建立以后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较为谨慎。在1917-1920年，由西蒙·彼得留拉(Симон Петлюра)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所执行的民族政策。^③在俄罗斯，部分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1918年8月，制宪会议委员会建立人民军，并制定了“俄罗斯内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突厥鞑靼民族自治的主要规定草案”。^④中亚巴斯马奇运动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得

① Terry Marti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pp.2-9.

② Terry Marti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pp.2-9.

③ 详见 Савченко В.А. Симон Петлюра.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2004; Солдатенко В.Ф.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Украине (1917-1920 гг.). Нац. акад. наук Украины, Ин-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нац. исслед. им. И. Ф. Курас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ин-т нац. памяти. Москва, 2012.

④ Багаутдинов Р.О, Газизов Р.Р.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в Уфим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естник ВЭГУ. 2015. №5. С.119-124; Кабытова Н.Н, Кабытов П.С. В огне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Сама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в конце 1917-1920 гг.). Самара, 1997; Анисков В.Т, Кабанова Л.В. История Комуча: опыт не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4. №3. С.52-60.

到阿富汗北部相近族裔支持的跨境民族发起了该运动。^①这一时期，苏联其他边疆地区也爆发了多种动乱：如 1920 至 1922 年在车臣和达吉斯坦，1921 至 1922 年在卡累利阿，1924 年在格鲁吉亚，1924 至 1925 年与 1927 年在雅库特，1927 年和 1929 年在阿扎尔。^②

在此背景之下，布尔什维克对分离主义的恐惧，导致了所谓“本土化”方针的形成。这项政策规定，本地语言成为通用及官方语言，以此授予地方精英自主领导权。^③这项政策适用地区范围包括苏联西部、中亚和远东等地区。在苏联领导人的眼里，以分而治之为基础的“本土化”在政治上具有巨大意义，其主要目标是避免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阻止泛突厥主义和泛蒙古主义等思想的扩散。因此苏联政府开始强调各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语言及独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例如，苏联政府对图瓦民族认同的承认，在许多学者看来，这就是为了防止图瓦民族与苏联的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人在民族共同点的基础上联系起来。^④

然而，苏联政府实行的“积极民族政策”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又时常被一些过度的限制措施所抵消。例如，1923 年 7 月，苏联政府设立了特殊的行政区域，即“边境地区”（пограничный район）。政府通过决议设立了一条处于边防军特别监督之下的、宽度为 22 公里的边境地带，授予边防军在该地区的无限搜查和扣押权。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所有现代国家都有类似特殊地区，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对特殊地区的控制程度能与苏联相提并论。^⑤

苏联领导人考虑边界和民族问题时，主要有以下两种心理动因：一种是

① Багаутдинов Р.О, Газизов Р.Р.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в Уфим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естник ВЭГУ. 2015. №.5. С.119-124; Кабытова Н.Н, Кабытов П.С. В огне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Сама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в конце 1917-1920 гг.). Самара, 1997; Анисков В.Т, Кабанова Л.В. История Комуца: опыт не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4. №.3. С.52-60.

②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98, Vol.70, No.4, pp.813-861.

③ Terry Marti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pp.75-124, 125-177.

④ 详见 I. Bremmer and R. Taras(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⑤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pp.813-861.

美国著名学者特里·马丁所提出的“皮埃德蒙特原则”^①，另一种是苏联人的仇外心理。皮埃德蒙特原则，是指国家利用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而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至于仇外心理，一般指苏联人对外国势力及其对国内的负面影响所怀有的强烈恐惧感。出于这两种考虑，苏联领导人一直以维持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其民族政策的核心。虽然如此，民族政策实行过程很快就表明，这两种想法事实上相互矛盾。苏联仇外心理在增加民族间隔阂并严重限制各个民族自我表现机会的同时，皮埃德蒙特原则却促进了民族认同、协助民族文化发展。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考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了苏联民族政策，可是无论影响的程度如何，这都是布尔什维克考虑民族关系的基础。^②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集体化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大量在苏联长期居住或出生的德国人和其他西方族群，包括波兰人、芬兰人、拉脱维亚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捷克人、瑞典人和保加利亚人等，逐渐开始移民到国外。同时，一些少数族裔非法出境，还有一部分组织游行示威，对苏联政府表示抗议。为了阻止这些行动，苏联政府开始了强制迁徙运动，将他们迁至中亚。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种强制迁徙的规模比较小。其原因在于波兰的政治情况。当时，依靠政变上台的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一直希望合并已处于波兰控制之下的乌克兰西部与属于苏联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因此苏联领导人担心，如果对西方少数民族实行大规模的强制和压迫措施，将会引起波兰的军事干涉。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民族镇压（1934-1956年）

二战开始之前，斯大林政府继续对边境地区的分离主义表现进行镇压。斯大林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其中包括清洗和流放政策。而二战开始以后，边境地区抵抗政府势力的涌现，迫使苏联不得不再花上十年的时间清除这些分离主义团体。同时，由于要解决人口的不足，尽管苏联政府对少数民

① 皮埃德蒙特(Piedmont)成为1859年-1861年间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起地区。

② Yaroslav Bilinsky, "Education of the Non-Russian Peoples in the USSR, 1917-1967: An Essay", *Slavic Review*, Vol.27, No.3, Sep.1968, pp.411-437.

族充满怀疑，却又不得不邀请那些分布在跨境地区的民族归向苏联。

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因为地方官僚未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而出现危机。同时，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①这场危机引发苏联领导人对跨界种族关系的怀疑，从而导致了苏联政府放弃皮埃蒙特原则，并发起了针对跨界民族的，尤其是针对境内波兰人和德国人的种族清洗。在1934年初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宣布，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已构成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更大的危险。^②结果，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镇压活动专门针对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德国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③

苏联政府在远东地区的民族政策与西部非常相似，根据20世纪20年代的计划，朝鲜族裔被强制迁徙到哈巴罗夫斯克以北。同时，苏方因为担心日本以强制迁徙为借口而发起军事干涉，所以严格限制了朝鲜族迁徙运动的规模。1936年7月，远东边区委员会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一项新的远东边界制度，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Максим Литвинов）指出，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是禁止“在朝鲜边境的任何军事措施”的。然而，不断增长的朝鲜族裔在远东边界地区产生的影响已经令苏联领导人十分不安。在他们眼里，这种危险已经超过了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综合不同的统计资料，至1937年8月，被迁徙的朝鲜人数达到了135,343至175,000人。^④

30年代末，面对盛世才在新疆的恐怖统治，不少中国籍人士为寻找自身安全保障，纷纷向在新疆的苏联领事馆申请改归苏籍。^⑤同时，这些人抵达苏联后，政府对他们一直持有怀疑态度。1937年8月，大约11000名中国

①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pp.813-861.

② Yaroslav Bilinsky, “Education of the Non-Russian Peoples in the USSR, 1917-1967: An Essay”, pp.411-437.

③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pp.813-861.

④ Бугай Н.Ф.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депортации 1937 год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4. С.158; Michael Gelb, “An Early Soviet Ethnic Deportation: The Far-Eastern Koreans”, *The Russian Review*, Vol.54, July 1955, pp.389-412.

⑤ 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100页。

人随朝鲜族被强制迁徙。这主要是因为，1938年1月31日，政治局下令进行“针对哈尔滨人和中国人的行动”。这里的所谓“哈尔滨人”，指的是长期在中国居住并在满洲铁路工作的俄族人员。这说明，连有国外关系的俄国人都被怀疑成中国间谍。^①这些措施使20年代初酝酿的仇外心理，在苏联社会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在朴茨茅斯会议后，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卡累利阿芬兰同苏联合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领土大规模扩大。1944年，图瓦共和国向苏联政府请求加入苏联，以自治区身份被合并。^②尽管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加入了苏联，但是长期受德国情报组织协助的地方政治精英，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因此，他们试图阻止土地改革和土地国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卫国战争前夕，苏联领导人将白俄罗斯西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地下民族组织活跃分子，驱逐到这些地区之外。^③

新的领土合并以及地方精英中逐渐增长的不满情绪，使得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得到强化，并且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地方和中央官僚身上。他认为，要加强自己和俄族精英之间的关系，苏联必须在二战胜利后进行针对少数民族的俄化运动与强制迁徙。^④作为这种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德国军队在1943年至1944年撤退后，苏联将所有克里米亚鞑靼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斯、卡拉凯和梅斯基特突厥人，以叛国的罪名，强制迁徙到苏联中亚地区。^⑤同时，在官僚群体中也开始了俄化运动：任职苏联国家机关重要岗位的犹太人，很快就被俄族人取代了。此后，在苏联官僚鼓励之下，反犹太主义在基层也蔓延如火。^⑥

另一方面，在对那些已经处于掌控之中的少数民族进行镇压的同时，斯大林还试图通过把居住在某些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纳入苏籍，以增加苏联的

①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pp.813-861.

② Смирнова Л.В. Совет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коман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Вестник ОГУ. Июль 2006. №.7. С.122-127.

③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 МВД и МГБ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1. Л.3-7.

④ Vladislav Zubok,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56.

⑤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pp.813-861.

⑥ Vladislav Zubok,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p.56.

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 1945 年 11 月 10 日发布在远东地区“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当时苏联政府主要是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新疆解放后至 1955 年，苏联在恢复苏联国籍的工作中没有遇到困难。而 1955 年 7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经协商后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①

这就意味着，斯大林的做法其实是另一种版本的“皮埃德蒙特原则”，即，苏联决策层放弃了扩大国外影响力的目标。那时，盟国已经建立了雅尔塔体系并划分了自己势力范围，而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展现了领土扩张策略的后果，这些现实影响着苏联的政策。苏联政府试图吸引邻国的劳动力，但同时又对其他国家人口在苏联的行动充满疑虑，而且这种疑虑有增无减。这其实反映出苏联决策层逐渐产生了仇外心理，以及对外国势力策划分离主义行动的恐惧。^②

三、去斯大林化时期与民族主义发展（1956-1961 年）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寻求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化。苏联政府有限地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的自主权。苏联政府实施的许多政策都体现出，当时在边疆人口和中央权力之间的一种积极的动态变化。然而，这些措施实质上都是有限的，最终也远远无法补偿多年来的清洗和民族迫害政策带来的影响。

1953 年 6 月，长期由俄罗斯人担任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交由乌克兰人担任。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乌克兰西部居民来说，这是乌克兰化政策的开始。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党委第二书记都是从莫斯科派遣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共和国的控制。一般来说，第二书记一定是俄族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对地方进行监督，即担任莫斯

① 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第 80-100 页。

②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pp.813-861.

科的“眼睛”和“耳朵”。譬如，在1959年被派往阿塞拜疆担任第二书记的V·谢米查斯特内赫，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的领导人。^①

五十年代中期，曾经被强制迁徙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终于返回了故乡。例如，在亚美尼亚曾经被强制迁徙的10万亚美尼亚移民得以返乡。虽然如此，这些措施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即，亚美尼亚人随之而来的领土诉求：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思想一直以归还祖先领土为基础，领土范围包括属于土耳其的卡尔斯、阿尔达罕、萨拉卡默什以及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在亚美尼亚人眼里，领土尚未归还的重要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轻视，因此，民间的反政府民族情绪也日益增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明显提高了海外亚美尼亚民族政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的支持率。^②

在苏共二十大开启去斯大林化进程之后，苏联有限的民主化在继续发展。这种民主化在加盟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56年8月，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增加了一条，将阿塞拜疆语和俄语共同定为官方语言。阿塞拜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经过苏共中央的允许，这也是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唯一的案例。而苏联对此并没有进行干涉，这种态度其实就反映出苏联对加盟共和国语言政策控制的减弱。^③

然而，实践表明，有关改革的作用十分有限。在1959年的学校改革中，学生父母有权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在俄语学校或者非俄语学校学习，以及选择另一门语言作为选修。比较自信的亚美尼亚和立陶宛对此并没有表达明显的忧虑，然而拉脱维亚、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那些在语言方面感受到威胁的活跃精英们却展开了坚决的斗争。^④如此一来，语言政策成了激发少数民族精英不满情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联的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历史中，去斯大林化从未发挥和平化

① J. Hasanli, *Khrushchev's Thaw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oviet Azerbaijan, 1954-1959*,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pp.ix-xiv.

② L.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21-123.

③ J. Hasanli, *Khrushchev's Thaw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oviet Azerbaijan, 1954-1959*, pp.ix-xiv.

④ Yu. Slezkine,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1994, Vol.53, No.2, p.449.

的作用，在国外这引起了 1956 年波匈事件，而在国内，则导致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自由氛围的影响下，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掀起了抗议浪潮。当年十月底，维尔纽斯大学的学生散发充满民族主义口号的传单。1956 年十一月初，在考那斯和维尔纽斯，数千天主教徒游行示威，要求宗教自由。当考那斯 4000 多名青少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时，爱沙尼亚首都街道上的抗议者唱着民族主义的歌曲。^①

苏联政府意欲在一定程度上转变其民族政策，但是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需要充分的党内政治资源，而赫鲁晓夫所掌握的党内资源与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米亚鞑靼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和伏尔加河地区德国人的权利依然继续受到侵犯。^②不止于此，许多加盟共和国又受到新的结构性的政治压迫。自 1956 年以来，苏联决策层尝试剥夺克里米亚鞑靼人存在的权利，将其从苏联民族列表中移除，将克里米亚鞑靼语从苏联语言列表中删除。另外，国家领导人禁止在参考书、百科全书、教科书和统计资料中提及这一少数民族。同时，在苏联人口普查资料中，删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内容。^③

中央政府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采取的另一种政策，是“本土化”，为少数民族领导人升至地方政府高层职位提供了可能。从表面上看，这种规定会成为苏联民族政策受欢迎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本地少数民族领导人走到一定的职位就无法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它也严重限制了少数民族领导人升职到中央政府的可能性。毋庸置疑，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地方精英对中央政策的不满。^④

① D. Zisserman-Brodsky, *Constructing Ethno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Samizdat, Depriv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 Nat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3, p.230; L.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p.68.

② J. Hasanli, *Khrushchev's Thaw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oviet Azerbaijan, 1954-1959*, pp. ix-xiv.

③ Курсеитов Р.Д. Крымские татары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и после. Геро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награжденные и отвергнутые. Борьба з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 Крым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5. №2. С.84-131.

④ A. Scherbak,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Sociolog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WP BRP 27/SOC/2013, <https://www.hse.ru/data/2013/12/12/1339832905/27SOC2013.pdf>

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清洗的程度和范围，使地方精英更加强烈地渴望表达的自由以及文化和语言自由传播的权利。这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地方上时常会误解政府机构发出的信号。如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新领导人卡马洛夫（С.К. Камалов）因为对本土化政策“望文生义”而遭受批评。在他领导之下，当地居民以本土化为国家“文艺复兴”的前提，多数乌兹别克人开始公开遵守穆斯林习俗。但是乌兹别克这一“本土化”的尝试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与此相反，莫斯科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М.А. Суслов）等人强烈谴责卡马洛夫。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兹别克人民作家拉希多夫（Ш.Р. Рашидов）强烈批评本地领导人实行本土化的方式。1959年3月14日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卡马洛夫被迫辞职。而拉希多夫，直到他1983年逝世为止，连续24年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相应地，在1959年至1961年，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数十位部长、州委、区委、市委书记都被撤换。^①

总体来说，在数十年实行民族清洗和不恰当的民族政策的历史中，去斯大林化和本土化政策自身的有限性，削弱了这些政策的效果。地方精英对此的反应让中央意识到，也许相反的措施会更有效。因此，苏联决策层又提出了民族同化政策。

四、民族同化与分离主义的隐形发展（1961-1985年）

1958年年中以后，苏联政府继承并延续了斯大林时代开始的俄化努力，并于1961年在党纲里增加了相关的内容。^②民族同化的尝试激怒了少数民族，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同化政策中显现出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激发了这种愤怒的情绪。例如，60年代初，苏联政府鼓励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迁移到中亚加盟共和国的活动达到高潮，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而且俄罗斯移民大多数不仅对于中亚文化一无所知，还骄傲自满，

^① Demian Vaisman, “Regionalism and Clan Loyalty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Uzbekistan”, in Yaacov Ro'i, *Muslim Eurasia: Conflicting Legacies*,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105-123.

^② Yaroslav Bilinsky, “Education of the Non-Russian Peoples in the USSR, 1917-1967: An Essay”, *Slavic Review*, Vol.27, No.3, Sep.1968, pp.411-437.

往往拥有在文化上的优越感。^①

相应地，苏联各个族群对于民族同化挑战的反应也有所不同。以乌克兰为例，在 60 年代早期，乌克兰知识分子发起了保持母语纯洁性的运动，并以去俄化为主要目标。1963 年 2 月，运动积极分子在基辅召开了乌克兰语言问题大会。乌克兰的作家、教师、语言学家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请求当地政府采取措施，“在所有组织和企业里、铁路等交通工具上和进行贸易过程中，广泛使用乌克兰语言”。^②而且这种活动并不仅仅限于和平方式：乌克兰民族运动中有诉诸极端方式的历史，长期存在的乌克兰民族团体一直以乌克兰独立为其主要目标。在乌克兰民族团体受到广泛支持的西部地区，民族团体还会进行暗杀共产党员、在行政和公共场所纵火等反苏行动。当地多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非法团体一般以大学生为其主要成员，他们负责诸如悬挂乌克兰国旗与散发“反苏”传单等活动。^③

鞑靼民族也对同化政策做出了反应。20 世纪 60 年代初，鞑靼知识分子成立了由阿奇德里诺夫（Т. Айдельдинов）率领的非正式小组，其主要活动之一便是向党委、政府等机构邮寄信函，在信中罗列鞑靼民族权利所受到的侵犯。在这些信函中，知识分子们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尚未有鞑靼语广播节目、鞑靼电影、民族交响乐团、全苏鞑靼文报纸等。他们还指出，在地方上出版的鞑靼文书籍远远无法满足少数民族语言的需求。这个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公安部门的监视之下。据公安机构的资料，1965 年 1 月 27 日至 18 日，哈西柏林（Хасибуллин）和穆哈迈德江诺夫（М. Мухаметзянов）在参加一次文学沙龙时，在喀山文化宫里所做的发言，明确反对以俄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1965 年 3 月，在鞑靼共和国图书馆举行的读者大会上，蔡努林（Э.Зайнуллин）强调说，鞑靼文学语言“已经失去颜面，受到了俄罗斯化的影响”。蔡努林和穆哈迈德江诺夫 1965 年 4 月在另一次文学沙龙上的演讲，还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当晚出席聚会的人物中有很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吐番（Х.Туфан）、莱特普（Г. Латып）、哈利特（Г. Халит）等，他们并没

① Пыжиков А.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 Олма Пресс, 2002. С.197.

② Там же.

③ L.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pp.31-42.

有提出反对意见，此举表明演讲内容同鞑靼舆论界的观点基本一致。^①

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早期抗议行为在 60 年代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莫斯科市中心组织示威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在 60 年代末终于返回了故乡。亚美尼亚人从 1965 年起，先是通过组织抵抗活动，后来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允许纪念 1915 年的种族灭绝事件。1967 年后，在以色列军事胜利的背景之下，得到海外支持的苏联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②

然而，在少数民族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苏联政府依然对过于激烈的抗议者施加了压力：60 年代，有一群乌克兰作家、教师和记者，由于对俄化表示不满，遭到了残酷的镇压。^③1965 年 9 月 4 日，在基辅的一家电影院里，举行了电影《被遗忘的祖先的背影》的首映。在此期间，乌克兰知识分子组织了首次公开抗议活动，抗议他们受到的政治起诉。伊万·德祖巴(Иван Дзюба)，瓦斯利·斯图斯(Василь Стус)，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维乐(Вячеслав Чорновил)当时谈到了他们的同事受到的镇压，并且呼吁在场听众站出来表达对政权的反抗。在场的 800 人中，有 50 至 60 人站了出来。随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抗议活动。在公开支持被捕人士的抗议者中，包括飞机设计师奥勒格·安东诺夫，导演谢尔盖·帕拉扎诺夫，作家奥勒斯·贡察尔等人。而伊万·德祖巴在几个月之后，撰写了他著名的科幻和新闻学研究报告《国际主义还是俄化？》。这部作品甚至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出版，尽管只限于内部使用。^④

在这一方面，仇外心理出现了新的形式。当处于边界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受到迫害的时候，处于苏联内地的、孤立于外国影响的少数民族，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譬如，鞑靼地方领导人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民族知识分子发表的关于鞑靼文化衰落的声明。因此，克格勃人员反复找反对派积极分子进行

① Галлямова А.Г.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татар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в 1960-1980-е гг.// Ураль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9. №.4. С. 72-77.

② R.G. Suny,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ethnic cultur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SSR – root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G. Lapidus,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2.

③ Ibid.

④ Грабовский С.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протест против репрессий и трое его инициаторов. <http://argumentua.com/stati/legendarnyi-protest-protiv-repressii-i-troe-ego-initsiatorov>

所谓“预防性谈话”。但是事实上，此后反对派的行为并没有发生实际上的改变。相对来说，苏联决策层对于国家内部地区的民族组织保持了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形成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决策层认为这些民族主义活动无法引起共鸣。^①

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同化政策本身在大范围实行。许多加盟共和国一直担忧他们在苏联治下的权力限度，1977年，苏联政府通过的新宪法，以及随后几年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制定地方宪法的过程，都引发了对苏联某些地区政治地位的新争议。地方代表建议起草有关法律，确立“法定标准，使自治共和国能够转变为加盟共和国”。普通居民也向国家领导人致函，要求改变其居住地区的政治地位。同时，地方与中央报纸编辑部开始收到大量此类信函。在各种文件中填写民族的方式也引起了争论，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苏联人，不同的族群只不过说不同的语言而已；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苏联宪法第36条有必要补充如下内容：“禁止在任何官方文件中提供关于民族的信息（护照、各种身份证件，机票，个人问卷等）。”^②

还有一种提议认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就要放弃苏联的民族联邦结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论点：首先，联邦结构已经过时了，这种结构使各民族群众难以融合与包容。有人强调，加盟共和国结构，阻碍着苏联各地区经济发展，在国内形成经济障碍。其次，苏联放弃加盟共和国体制能够加强苏联的政治一体化。最后，由于苏联强制和自由迁居政策，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本地人口，对外地人的比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许多地区，主要民族竟然变成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③事实上，精英分子所讨论的这个提议，最终只是衬托出苏联政府在同化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是多么草率行事。

在这些争议背景之下，1978-1979年苏联决策层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

① Галлямова А.Г.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татар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в 1960-1980-е гг. С.72-77.

② Наумова Н.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Ё: Русский мир, 1997. С.346.

③ G. Lapidus, “Ethno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Soviet case”, *World politics*, 1984, Vol.36, No.4, pp.555-580.

进一步扩大俄语教学的措施，以此减少本地语言的教学和使用。这些决定激化了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群众示威活动。^①1978年4月，格鲁吉亚共产党尝试取消加盟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以格鲁吉亚语作为官方语言”这条时，数千人前往党总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放弃这一方案。同年，阿布哈兹人游行抗议格鲁吉亚人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并要求正式加入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反复抗议阿塞拜疆限制亚美尼亚文化和语言学习的政策，可是最后抗议活动无果而终。^②尽管民族主义精英的活动在增加，苏联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依然继续在少数民族地区尝试扩大俄语教学的规模。^③

由同化政策带来的压力开始蔓延到整个苏联。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地区开始发生分离主义事件，可是其规模、力量与群众参与度远远不如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发生的事件。^④但是苏联政府似乎从未意识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危险。早在1972年，苏共中央机构负责人欧尼科夫（Л. Оников）在向勃列日涅夫呈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各加盟共和国反俄情绪有集中化的趋势，并提醒国家领导人，目前不能“排除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在反俄情绪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及俄族人对此做出回应的可能性”。然而，苏联建国五十周年庆典的喜悦席卷全国，备忘录的作者却受到批评。^⑤如此，不断加强的俄化进程，引发了日益增长的不满，这在苏联的最后几年终于显现出来了。^⑥

五、民主化与苏联分离主义崛起（1985-1991年）

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中央一直没有明确认识到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直到一系列事件的爆发，才纠正了一直以来的错误认识，意识到少数民

① G. Lapidus, “Ethno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Soviet case”, pp.555-580.

② R.G. Suny,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ethnic cultur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SSR – root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p.32.

③ Ibid.

④ Пыжиков А.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С.198.

⑤ Наумова Н.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343.

⑥ R.G. Suny,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ethnic cultur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SSR – root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p.32.

族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986年12月，苏联中央政府任命俄族的根纳季·科尔宾(Г. Колбин)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此举引起本地人的强烈抗议。许多学生进行游行时，甚至与军人发生了冲突。此后不久，科尔宾的共产党领导人职位被代表地方政治势力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取代。^①其他地区也爆发了一系列的抗议事件，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对策。

苏联中央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中央政府还是需要加盟共和国当地领导人的支持，而这些老干部基本上都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等民主势力超越了对克里姆林宫的疑虑，发现莫斯科新政策其实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自由和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至1988年，戈尔巴乔夫不顾地方政治精英的反抗，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加盟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变动，撤销了一批当地领导人的职务，让当地知识分子取而代之。^②如此，在民族问题上比老干部更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当地政府的官方立场也开始产生影响。^③

苏联内部的冲突还出现了新的形式，即不总是由于对俄族的不满。相应地，民族共和国的地方人民之间的内部冲突也逐步频繁出现。1987年末，属于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知识分子提出加入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要求。同时，亚美尼亚居民在埃里温市进行游行，要求苏联政府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民族自决权。^④纳—卡问题在民族主义团体支持下开始尖锐化。在1988年2月28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⑤当民主势力开始行动时，在各加盟共和国出现的人民阵线突破了现状，超越了官方政策的限度，并迅速削弱了地方共产党的实力，甚至一些新任的领导人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全面控制。1989年夏天，在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人与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发生了一系列民族冲突，伤亡人数超过100人。结果，大多数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移民到俄罗斯加

①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5期，第14-22页。

② R.G.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7-130.

③ 注：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少数民族的

④ Ibid.

⑤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第14-22页。

盟共和国。另外，格鲁吉亚同阿布哈兹的冲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尖锐化。^①

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在波罗的海国家达到了顶峰，这部分地归因于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上与欧洲国家的相似性。1989年5月，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消息令人不安，保守派取得优势，改革家们都心慌不定。”^②立陶宛的情况对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进展起了关键作用。1989年8月22日，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成立的研究苏德条约及其后果的委员会，在维尔纽斯发表了报告。该委员会宣布，苏德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条约非法，因此立陶宛人民国会宣布1940年7月21日关于成立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以及1940年8月3日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的法律，都无效。

1989年8月27日，苏共中央在“关于波罗的海地区现状的声明”中，对于分离主义趋势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表示了忧虑和不安。“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最近几个月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的一些力量坚决地、强制地执行分离主义路线也与此有直接关系。人民阵线及其附属团体在8月23日举行的群众活动，使该总路线到达顶峰，其政治意义在于挑唆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人民脱离苏联。”^③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决议引起了多种反应，也可以说，导致了与预想相反的结果。”^④此时连不主张脱离苏联的积极分子对于中央政府也感到不满了。

不像其他加盟共和国，中亚地区的领导人严格限制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行的范围，所以当地共产党组织依然能够维持他们对社会的控制。随着全国政治民主化、共产党治理逐渐失去合法性，以及莫斯科所表现出的拒绝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态度，民族主义运动或逐步动员了苏联各个地区的旧政治阶级，或迫使地方领导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试图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⑤例如，

① Горбачев М.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http://www.gorby.ru/gorbachev/zhizn_i_reformy1/page_18/#4

② Там же.

③ 苏共中央《关于波罗的海地区现状的声明》，http://www.hpc-strategy.ru/konflikty_v_sssr/19890827_zayavlenie_ck_kpss_o_polozenii_v_pribaltike/

④ Горбачев М.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⑤ R.G.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在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上台的同时，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卡马雷吉诺夫(З.К. Камалиденов)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捏别科夫(Ш. Джаныбеков)被迫退休。其他的一些老资格领导，如克孜勒奥尔达州委第一书记阿乌列别科夫(Е. Ауельбеков)和卡拉卡尔帕克州委第一书记萨列科夫(К. Салыков)，后来也都被年轻政治家所取代。^①

与此同时，俄族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很多俄族人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在逐渐消失，比如损毁纪念碑的行为，更不用说那些被极度扭曲的历史。所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国家制度甚至无法给予核心民族以基本的安全感。^②俄罗斯族人对现状变化情况的回应，也给戈尔巴乔夫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回忆说，“著名俄罗斯作家瓦伦廷·拉斯普廷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表示：大家如果对俄罗斯这么不满意，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它身上，那它为什么还要留在苏联？我记得那一刻，他已经走向自己的位置，但代表们还继续站着鼓掌。”^③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俄罗斯族，也感到在民族政策中受到了欺骗和虐待。

整体而言，1986年至1989年苏联民族情绪尚在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直至1989年，苏联国家领导人才逐渐发现，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超越政府的控制范围，加盟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引领着这股潮流。诸如，受苏联其他地区的人民阵线等公民团体的影响，中亚知识分子密切关注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包括母语的法律地位、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历史的重新评估、为受政治镇压的作家恢复名誉等文化问题，以及单一种植棉花的农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环境污染、咸海干涸、公共卫生和婴儿死亡率等经济和环境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问题成为分离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苏联解体后本地政府新政策关注的重点。^④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7-130.

① Масанов Н. Казах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элита: клановая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и внутриэтническ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1996. №.1. С. 46-61.

② R.G.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p.127-130.

③ Горбачев М.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④ Mohira Suyarkulova, "Reluctant Sovereigns? Central Asian States' Path to Independence", in Sally N.Cummings and Raymond Hinnebusch, *Sovereignty after empire. Comparing the*

六、结语

苏联对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有一个持久而又复杂的演化过程。苏联建国初期，沙俄帝国领土中的“碎片”便已经在寻求独立，当时这些尝试往往得到外国力量的支持。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建立“积极民族政策的国家”，并努力吸引各个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便是因为担心其他国家干涉其民族事务。苏联领导人在应对这一挑战的时候，对内主要在舆论上扩散仇外心理，而对外的做法基本遵循上文提及的皮埃德蒙特原则。这些应对措施始于一系列积极手段，最终结束于强制迁徙政策。所以说，苏联决策层阻止外国势力对苏联边疆民族的影响力扩展，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换言之，苏联在构建民族政策时，一直有着基于外交政策层面的考虑。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针对跨界民族的政策虽然在不断进行调整，但并没有发生关键性的变化。例如，四十年代苏联政府曾为了对跨界民族施加影响，在几个加盟共和国设立了外交部。在处理跨界民族问题上，乌兹别克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部负责其中涉及中国的事务，阿塞拜疆外交部主要解决与土耳其有关的事务，塔吉克共和国外交部则集中处理有关伊朗的事务。^①斯大林去世后，虽然苏联在表面上采取了一系列去斯大林化的措施，但是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外交部并未被撤销。而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苏联各种情报机关开始特别关注上述加盟共和国的情况，尤其是其中有关叛逃者和对外宣传工作等问题。此后，更加强硬的措施很快取代了去斯大林化。

应该指出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上半叶，分离主义都没有明显的表现。一方面，这是斯大林时期采取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当时已经在国家体系中培养出了忠实于国家制度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试图扩大各自地区的民族权力时，只能按照制度制定的规则行事。同时，这一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抗议活动，也无法取得广泛的支持，所以决策层从未看出这些民族潮流崛起的危险。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pp.127-153.

① Дж.Хасанлы. СССР-Турция: о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к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1939-1953). М: Центр Пропаганды, 2006. С.146.

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不适当的民族同化政策及中央政府长期忽略加盟共和国利益的做法，迫使地方社会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实现团结，进一步提出民主化的要求。如同前辈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些情绪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可是他的政府很快就失去了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一言以蔽之，民族问题对于苏联内外政策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解体。

有些俄罗斯学者将苏联民族政策发展比喻为钟摆摆动：“软波”和“硬波”措施的交替表明，民族政策的发展轨迹来回摆动，一种极端的方针出现之后，又会被下一时期另一种极端的方针所代替。苏联政府从未找到折中的办法，即，寻找到主体族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利益之间的平衡。因此，“钟摆的摆动”所象征的苏联民族政策的来回摇摆不定，成为苏联在暴政、种族暴力及最终苏联崩溃，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开展的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原因之一。^①

这些变动表明，在苏联决策层意识中，分离主义活动与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与外国势力的活动，一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居住在苏联内地的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受到全面镇压，而居住在边疆地区的族群则长期以来受到极其严重和残酷的镇压。

与此同时，高估外交因素对于苏联民族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苏联决策层忽视了平等在少数民族融入苏联社会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全苏范围内对地方政治精英们制造的行政障碍、通过语言教学及俄族人迁移等措施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造成了一些关乎少数民族地区利益的关键性行政错误。诸如咸海环境灾难、切尔诺贝利灾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市的核试验基地的地理位置问题等等，皆是未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足够关注的少数民族问题。

苏联领导人也时时利用民族情绪，并从中获取政治利益，这种做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导致了分离主义的兴起。如：斯大林试图将土耳其、伊朗与新疆部分领土并入苏联，戈尔巴乔夫尝试通过民主阵营的形成获得地方政治精英

① Щербак А.Н, Болячевец Л.С, Платонова Е.С.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маят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2016. №.1. С.100-123.

的支持，地方党委领导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试图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并建立独立国家等。当政治家们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时，也助长了苏联内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感。斯大林的计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鼓励了知识分子们为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而奔走；地方精英的政治行为也成为苏联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如同上文所指出的，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独立的那一刻，才成为分离主义者。在此定义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结论：苏联建国时期与解体时期才是分离主义的兴起阶段，而在 1956 年至 1961 年、1961 年至 1985 年的两个历史阶段期间，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停留在体制框架之内，他们从未正式提出各自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要求。所以，苏联在此期间是民族主义问题，尚未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也就是说，1956 年至 1985 年就是改善国内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然而苏联政府错过了这次机会。

总体而言，苏联是内部的离心趋势从未消失过，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这些离心力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苏联全国经济、文化生活当中存在着“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边疆地区部分地接纳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其特殊的“边疆式”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并未改变。苏联疆界存在着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最关键的是，苏联少数民族群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与主流社会之间分离，而主流社会对这些族群的态度也不是包容，而是排斥。因此，苏联最符合边疆国家的定义^①，苏联政府只是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维持国家的统一，却并不是真正的“整合国家”。

^① 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第 xxv 页。

【 Abstract 】 Separatism is 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ism. Nationalists become separatists from the moment they begin to demand independence. Employing the concepts of “integrated country” and “frontier country”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the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Soviet government’s policies in containing separatism in frontier region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period of the founding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were the periods when the separatism was on the rise. However, during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1956 to 1961 and from 1961 to 1985, the actions of nationalists still remained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Soviet state. The minorities had not formally demanded independence, so then the Soviet Union was dealing with the issue of nationalism and the protest had not yet reached the level of separatism. The paper argues that from 1956 to 1985, it was the best time for the state to improve its nationalities policies, however, the Soviet government missed that opportunity.

【 Key Words 】 Soviet Nationality Issue,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Soviet Separatism, Integrated Country, Frontier Country

【 Аннотация 】 Сепаратизм является крайни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сепаратистами с 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когда они начинают требова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спользуя концепцию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ой страны» и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ны» в качеств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автор статьи пытается прояснить политику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сдерживанию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В статье показано, что периоды основания и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провождались ростом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Однако в течение дву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ериодов с 1956 года по 1961 год и с 1961 года по 1985 год действия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всё ещё оставались в рамка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еньшинства формально не требовал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этому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ытался справить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с проблемо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эти периоды,

протест меньшинств не достиг ещё уровня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статье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что период с 1956 года по 1985 год было лучшим временем для улучш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днако 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упустила эт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епаратизм,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ая страна, пограничная стран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乌克兰的族群分离与治理 ——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

苟利武*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以来,族群分离一直是困扰着乌克兰社会转型的棘手问题。在乌克兰,各个族群因为历史原因与周边国家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不同族群之间也因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经济差距、政府治理等因素影响而存在敏感性。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诸多因素为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积蓄了强大的动力,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秩序的溃散则为分离运动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历届政府不同程度地推行乌克兰化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阻滞了少数族群对政府的认同,成为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乌克兰社会转型 乌克兰族群问题 克里米亚问题

【中图分类号】D75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6-0144
(18)

一、问题的提出

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已长达千年,但乌克兰独立建国的时间至今只有30年左右。乌克兰是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曾处在中上水平。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立宣

* 苟利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

言。根据 2001 年的全乌人口普查资料，乌克兰有 130 多个民族，4500 万人口，其中乌克兰族占 72%，俄罗斯族占 22%，其他少数民族有白俄罗斯族、摩尔多瓦族、保加利亚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等，以及少数鞑靼人。^①从区位来看，经济基础最好的是克里米亚，主要发展军工、港口和旅游等产业，其次是东部工业区，最后是西部农业区。从民族分布来看，乌克兰族人在中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和南部，居住在中部和西部的乌克兰族，受波兰等的影响，大多数信仰天主教，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族大部分信仰东正教。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克里米亚地区，信仰东正教。鞑靼人主要分布在克里米亚，信仰伊斯兰教。

乌克兰的独立使其国内的俄罗斯族由苏联时期的主体民族变成少数民族。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作为主体民族的优越感，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国内受到挤压，即使在俄罗斯人口比例占多数的克里米亚也未能幸免。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位于欧洲东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上，原是乌克兰的一个省级特区，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克里米亚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其次是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②在克里米亚绝大多数人只会讲俄语，听俄语广播，仅有 7%—9% 的克里米亚人看基辅电视台的节目。根据 2014 年的人口普查，84% 的克里米亚居民把俄语作为母语。^③

2014 年 3 月 16 日克里米亚就自身地位举行全民公投，克里米亚自治共

① 1989 年乌克兰人口 5142.4 万人，其中乌克兰人占比 72.7%，俄罗斯人 22.1%，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分别为 0.9%，摩尔多瓦人 0.6%，保加利亚人 0.5%，匈牙利人 0.4%，罗马尼亚人 0.3%，波兰人 0.4%，因被流放和受政治迫害或逃往他国，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鞑靼人极少；2001 年乌克兰人口 4800.4 万人，其中乌克兰人 77.8%，俄罗斯人 17.3%，白俄罗斯人 0.6%，摩尔多瓦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同为 0.5%，保加利亚人 0.4%，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均为 0.3%，犹太人 0.2% 等。数据来源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по итогам Всеукраин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1 года, <http://2001.ukrcensus.gov.ua/rus/results/general/nationality/>

② 1989 年克里米亚主要族群人口及比重：俄罗斯人 163 万占比 67%；乌克兰人 62.6 万占比 25.8%，克里米亚鞑靼人（含鞑靼人）3.8 万占比 1.6%；白俄罗斯人 5 万，占比 2.1%；犹太人 1.7 万占比 0.7% 等。2001 年为：俄罗斯人 145 万占比 60.4%；乌克兰人 57.6 万占比 24%，克里米亚鞑靼人（含鞑靼人）25.9 万占比 10.8%；白俄罗斯人 3.5 万，占比 1.5%；犹太人 0.6 万占比 0.2% 等。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по итогам Всеукраин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1 года

③ Dzerkalo Tyzhnia, “Census of the population is transferred to 2016”, 20 September 2013.

和国议会次日决定并宣布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命名为克里米亚共和国，然后正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被俄罗斯接纳。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大国博弈、地缘政治、能源政治等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①这些研究认为大致有五大根源引发了乌克兰危机：历史积怨、建国后的政治根源、政治制度与文化根源和国家建设的失败等。从族群分离的角度已有部分学者关注^②，但是，从族群的分离与治理角度，包括对乌克兰政府的民族政策、民调分析、俄罗斯族的态度、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政治诉求以及乌克兰政府对鞑靼人自治的承诺产生的外溢效应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变迁理论，西方学者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代表性的学者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鲁恂·W·派伊和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等。尤其是，哈罗德·伊罗生在1975年关于族群冲突的预言，在21世纪的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印证。伊罗生认为，宗教、族群与部落对社会发展消极的一面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他深信原乡情怀仍然将持续酝酿，新的族群认同也将撼动世界的政治。^③伊罗生从“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雪人、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和新多元主义等多个角度探究族群的本质，讨论群体认同在政治变迁压力下的自我塑造，民族主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以及认同问题对个人心理的巨大冲击。伊罗生把族群的复杂性比作“狰狞的雪人”（Abominable Snowman），认为姆庇之家这种原乡情节的内涵要比族群意识更加丰富，可以让人民为自己的种族、部落献身，为自己的语言、乡土与国家卖命。^④派伊认为，在民族主义的背后，是一股混杂着宗教、语言、种族与地域的巨大能量，而经济发展或者民族政策等都有可能成为爆发民族冲突的诱导因素。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派伊还认为，族群冲突的根源在于经济

① 亚历山大·利布曼：“乌克兰危机、俄经济危机和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37-57页。

② 封帅：“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第3-41页。

③ 鲁恂·W·派伊，“族群认同的先知”，载[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④ 同上，第8页。

发展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只有经济平等才能平息族群之间的紧张。^①

自由主义观点虽然可以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期间克里米亚与乌克兰政府的冲突与分离，但不能解释 2000 年以来乌克兰经济恢复时期克里米亚为何依然存在分离的诉求。本文拟从族群异质性、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矛盾、社会转型等角度探究乌克兰族群冲突的根源，以及族群的抗争和分离意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二、乌克兰国内克里米亚人的族群历史与记忆

在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者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②克里米亚自治的历史要远远早于乌克兰，不论是汗国时期以鞑靼人为主的克里米亚，还是苏联时期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克里米亚，都很难与乌克兰建立认同。1954 年苏联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是一种国家内部行为，并非基于克里米亚公民公投，因此克里米亚民众对乌克兰的认同是来源于对苏联强权的威慑和依赖。

首先，克里米亚有着长期独立以及作为俄国和苏联一部分的历史记忆。历史上的克里米亚从 1239 年起，被蒙古帝国时期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统治长达 200 年之久。金帐汗国分裂后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定都在巴赫奇萨赖（Bahçeseray）^③，从 1449 年到 1783 年长达 300 多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克里米亚汗国时期。克里米亚汗国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经济上主要从事奴隶贸易。此时的克里米亚汗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多次攻打北部公国，将抓获的奴隶贩卖到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地区。在 1500-1700 年间，克里米亚汗国从俄国和波兰—立陶宛王国抓获奴隶多达 200 万人。^④克里米亚也因此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奴隶贩卖市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独立的法律和政

① 鲁恂·W·派伊，“族群认同的先知”，第 8 页。

② 同上，第 81 页。

③ “Bakhchisaray history Archived”，<http://bikz.academia.edu/ReshatAliyev>

④ M. Kizilov, “Slaves, Money Lenders, and Prisoner Guards: The Jews and the Trade in Slaves and Captives in the Crimean Khanate1”,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07, Vol.58, No.2, pp.189-210.

府机构。^①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克里米亚汗国已经具备完备的军事基础和非常强的军事实力。从15到18世纪末的近400年里，为了抗击克里米亚汗国的骚扰，俄国、波兰—立陶宛王国及其他东欧国家与克里米亚汗国进行了长期无休止的战争。^②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军事上难以支持克里米亚汗国，俄国的日渐崛起并发起对克里米亚和奥斯曼帝国数次攻伐，克里米亚逐渐衰落，直到1783年被俄罗斯帝国彻底占领。自1784年起到1921年，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新俄罗斯塔夫利达州的一部分，成为俄国黑海舰队基地。1921年10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决议，塔夫利达省的克里米亚半岛部分组建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首府为辛菲罗波尔，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组成部分。1945年6月，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克里米亚州。为纪念乌俄合并300周年，195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克里米亚被划归乌克兰。^③1991年1月，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时，克里米

① M. Kizilov, “Slav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Crim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2007, Vol.11, No.1, pp.1-31.

② 刘显忠：“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变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2期，第95-100页。

③ 详见档案资料：Document 1: 5 February 1954 Decree of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Council of Ministers,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the Crimean Oblast’ from the RSFSR to the UkSSR” TsGA RSFSR [GARF], F.259, Op.1, D.645, L.159,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2: 5 February 1954 Minutes N 41 of a Meeting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 Supreme Soviet TsGA RSFSR [GARF]. F.385, Op.13, D.492, L.1-2.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3: 13 February 1954 Decree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Ukrainian Supreme Soviet, “Concerning the Submission of the RSFSR Supreme Soviet Presidium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the Transfer of the Crimean Oblast to the Ukrainian SSR”. GARF. F.7523, Op.85, D.94, L.8.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4: 15 February 1954 Letter from D.S. Korotchenko and V.Ye. Nizhnik to K.Ye. Voroshilov, with a Report about the Decree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Ukrainian SSR Supreme Soviet GARF. F.7523, Op.85, D.94, L.8.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5: 19 February 1954 Meeting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GARF. F.7523, Op.57, D.963, L.1-10.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Issue 1, Vol.1,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6: Sergey Khrushchev, Excerpt from Nikita Khrushchev: Reformer, Moscow: Vremya, 2010. Translated by Anna Melyakova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亚成为乌克兰的自治共和国，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克里米亚仍试图独立，1992年2月26日改名为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5月5日宣布国家独立，5月6日通过了宪法。同时，俄罗斯议会在1992年5月通过决议，^①认为当年关于把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的决议无效，应该举行俄、乌、克三方谈判，以解决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总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克里米亚汗国时期长达300多年，真正作为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只有不足30年的时间，加上大量的俄罗斯人不断迁入，使得克里米亚的历史记忆中有太多的俄罗斯认同，而不是乌克兰认同。

其次，克里米亚深受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的影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印迹。历史上的克里米亚先后经历了蒙古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俄帝国时期、苏维埃俄国时期、苏联时期、乌克兰时期。从族群结构来看，并入俄国时，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部分居民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原定居于克里米亚半岛的突厥语民族。俄国占领克里米亚后，推行同化政策，迫使一些鞑靼人逃离克里米亚。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又有数十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迁离。与此同时，大量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农民以及来自法国、保加利亚、德国、希腊的移民，还有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向克里米亚迁移。^②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塔夫利达省人口达140.7万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当时还没有被划为单一民族，都被称为俄罗斯人）占据了70.8%的比例，鞑靼人降到了13%，其他民族占比16.2%。^③此时，克里米亚有54.66万人，克里米亚鞑靼人19.4万人，占比35.55%；俄罗斯人18万人，占比33.11%；乌克兰人6.5万，占比11.8%；犹太人2.4万人，占比4.4%。^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鞑靼人支持奥斯曼帝国和德国攻打俄罗斯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鞑靼人又支持德国。二战结束后，苏联因克里米亚鞑靼人支持

① 决议内容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равовой оценке решений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РСФСР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статуса Крыма, принятых в 1954 году <http://sevkrimrus.narod.ru/ZAKON/o1954.htm>

② 刘显忠：“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变迁”。

③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 Москва, 2007. С.59.

④ “The First General Census of the Russian Empire of 1897 – Taurida Governorate”. demoscope.ru. Демоскоп.

德国法西斯，而将大量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流放到中亚和乌拉尔山区。1959年，克里米亚有120.2万人，其中俄罗斯人85.8万，占71.4%；乌克兰人26.77万，占22.3%；犹太人2.6万，占2.2%；白俄罗斯人2.1万，占1.8%；克里米亚鞑靼人占比不足0.2%。^①到2001年，克里米亚总共有240.1万人，民族构成是：俄罗斯人145万人，占60.4%；乌克兰人57.7万人，占24.0%；克里米亚鞑靼人24.5万人，占10.2%。^②从宗教信仰来看，2013年克里米亚东正教信徒达到58%，伊斯兰教徒则占15%。^③语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克里米亚日常用语为俄语的人口占82%，俄语和其他语言（不包含乌克兰语）交替使用的人口占3%，俄语和乌克兰语交替使用人口占3%，使用乌克兰语的人口占2%，克里米亚鞑靼语使用比重为10%。^④

第三，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历史印迹十分有限。从历史上看，克里米亚独立建国的时间要早于乌克兰。乌克兰统治克里米亚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54年，真正意义上的对克里米亚的治理，则始于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以后。历史上的乌克兰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而存在，但不是政治学概念。^⑤12到14世纪，由于封建割据，古罗斯部族逐渐分裂成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3个支系。对于乌克兰民族记忆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乌克兰这一概念的产生、乌克兰民族的形成^⑥、以及哥

①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по переписи на 15 января 1959 года по республикам, краям, областя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округам, районам, городам, поселкам городского типа, районным центрам и крупным сельским населенным местам (п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у делению на 1 января 1960 г.).- М.: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60.- 523 с.转引自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ussr59_reg1.php

② “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by data All-Ukrainian population census”, “Sevastopol”, “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Ukraine by data All-Ukrainian Population Census 2001”, 2001 Ukrainian Census.

③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该样本为1200名年满18周岁的克里米亚永久居民，他们均有资格投票，涵盖不同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宗教信仰等因素。

④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⑤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⑥ 始于加利支-沃伦公国时期，乌克兰的民族性在西南罗斯土著反抗波兰-立陶宛统治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B. Skinner, “Borderlands of Faith: Reconsidering the Origins of a Ukrainian Tragedy”, *Slavic Review*, 2005, Vol.64, No.1, pp.88-116.

萨克式的浪漫民族主义。^①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波兰的统治下，乌克兰民族被分治、被压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沙俄时期统治民族自称“大俄罗斯”，把乌克兰称为“小俄罗斯”，制定了同化政策，乌克兰语的印刷品被禁止，而且在公共场合不允许使用乌克兰语。^②在蒙古统治的 200 年间，乌克兰地区的东西差异逐渐拉大。在语言方面，东部俄罗斯人说俄语，西部乌克兰人说乌克兰语；社会组织方面，东部是俄罗斯式的村社组织，西部则是独立农民与自由领地占主导地位；生活方式上，西部倾向于哥萨克式的自由生活，东部则是长期受俄国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影响；宗教信仰方面，西部深受天主教影响，东部主要信仰东正教。^③历史上形成的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进一步使得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治理变得十分有限。虽然身为苏联第二大继承者，乌克兰在经济、军事、工业、农业等诸多领域占据独特优势，但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政治转型和社会发展较为缓慢，^④对克里米亚的治理与克里米亚人的预期存在较大的落差。总之，历史上的克里米亚在族群历史与记忆上保留了较多的俄罗斯文化的印迹。民调显示，由于长期受到俄国和苏联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乌克兰文化，以新移民为主的克里米亚人更倾向于认同俄罗斯文化。^⑤

①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哥萨克式的浪漫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早期得到充分的发展，乌克兰知识界寻求民族复兴和社会正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并在后来对沙俄的抗争中成熟。代表性人物有农奴出身的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和政治理论家米卡罗·德拉霍马诺夫(Mykhailo Drahomanov)。详见“Taras Grigoryevich Shevchenko”，<http://www.encyclopedia.com/people/literature-and-arts/russian-and-eastern-european-literature-biographies/taras-grigoryevich>

② J. Remy, “The Valuev Circular and Censorship of Ukrainian Publications in the Russian Empire (1863–1876): Intention and Practice”,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2007, Vol.49, No.1-2, pp.87-110.

③ 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94–296 页。

④ 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48–63 页。

⑤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三、克里米亚反抗乌克兰政府的现实根源

对于克里米亚的分离运动来说，族群异质性或者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立国家地位只是原因之一。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环境和政策，对分离主义运动也有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①克里米亚接连不断地提出自治甚至独立的要求，除了大国干预的因素外，与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综合来看，乌克兰国内族群冲突的现实根源主要有：

首先，克里米亚的分裂势力一直长期存在。主要代表人物尤里·梅什科夫（Yuriy Meshkov），1945年10月25日出生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现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锡涅利尼科沃。1990年，梅什科夫当选为克里米亚最高委员会代表，其间成为“克里米亚共和党运动”（Republican movement of Crimea）组织的创始人。1994年，他担任共和党总统选举的选举集团主席，在第二轮选举中，梅什科夫以72.92%的得票率击败了时任克里米亚最高委员会负责人的米科拉·巴霍洛夫（Mykola Bahrov）^②，当选为克里米亚共和国总统。1995年3月17日，乌克兰议会废除克里米亚宪法和有关法律，梅什科夫被乌克兰行政法院驱逐，5年内不得入境。梅什科夫流亡莫斯科成为高校教师，并一直坚持其政治立场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③梅什科夫的政治主张包括：政治上，促进克里米亚与俄罗斯联邦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直到与俄罗斯统一，向克里米亚人发放俄罗斯护照，将克里米亚时间调到莫斯科时区；军事上，力求与俄罗斯建立军事联盟；经济上，主张深化经济改革，计划成立“中央银行”，建立“多元货币”制度，不仅允许俄罗斯卢布，而且允许美元在克里米亚流通。^④在

① 庄礼伟：“印度尼西亚社会转型与族群冲突——亚齐民族分离运动个案研究”，《世界民族》，2005年第1期，第29-35页。

② “New developments in Russia, Belarus and Ukraine”, *Assembly of WEU*, December 4, 2001, p.24,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PDF) on September 28, 2007.

③ Екс-Президент Криму Вислала з України. <https://www.pravda.com.ua/news/2011/07/13/6384087/>

④ Celestine Bohlen, “Russia vs. Ukraine: A Case of the Crimean Jitter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1994/03/23/world/russia-vs-ukraine-a-case-of-the-crimean-jitters.html>

梅什科夫政策主张的影响下，克里米亚独立运动在克拉夫丘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并分别在 1991 年和 1994 年举行公投，形成了稳固的群众基础。

其次，乌克兰独立后自身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进一步刺激了克里米亚的分离运动。此次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在乌克兰国内经济陷入危机、预算和赤字日益扩大、国际收支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紧急叫停欧洲一体化而引发的。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经济一直没有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 年，乌克兰名义 GDP 从 14088.89 亿格里夫纳上调至 14112.38 亿格里夫纳，实际增速从 0.2% 上调至 0.3%，人均 GDP 从 30901 格里夫纳（3833.87 美元）上调至 30953 格里夫纳（3840.32 美元）。但从长期的经济规模来看，2012 年，乌克兰实际 GDP 相当于 1990 年的 69.5%，人均实际 GDP 相当于 1990 年的 81.1%。^①苏联解体前，乌克兰的工业和经济水平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高于俄罗斯和中亚。但是独立以后乌克兰经济衰退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人民的预期，经济总量由 1989 年的 827.09 亿美元下降到 2000 年的 312.62 亿。^②乌克兰政府改革政策的失误致使恶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物价飞涨，商品严重缺乏，克里米亚对乌克兰政府的不满情绪也随之高涨。^③乌克兰经济滑坡无论就幅度还是持续时间而言，都明显超过俄罗斯，更远远超过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也因此成为“渐进式失败”的典型。

第三，乌克兰政治转型缓慢，难以有效应对国内危机。独立之初的乌克兰，其国情具有独特的“二元对立性”，即：天主教与东正教、农业区与工业区、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乌克兰语与俄语、西部与东部。这种二元对立的特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乌克兰社会转型的一大难题。此外，总统与议会之间陷入权限之争。乌克兰彻底摒弃了原来的国家政体，仿效西方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但没有以宪法的形式对总统和议会进行明确的权限划分，而继续执行 1978 年宪法，直到 1996 年才通过独立以来的第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中保留了很多苏联时期的痕迹，如作为国家最高权力

① 张弘：“乌克兰政治危机背后的经济因素解析”，<http://news.ifeng.com/opinion/wangping/wukelan/>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kraine?view=chart>

③ L. Kistersky,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Ukraine”, *Brown J.world Aff*, 1993.

机关的最高苏维埃仍然存在。与总统和议会权力之争相伴的，是政府更迭频繁。乌克兰独立六年时间，政府更迭竟达 7 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家经济政策带有多变性，缺乏连贯性，成为乌克兰经济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在议会内部，政党之间对抗严重。苏联解体之前，乌克兰国内形成了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政治组织“乌克兰人民运动”（又称“鲁赫”），但在 1990 年 10 月，“鲁赫”改变其政治主张，转向争取乌克兰独立，并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统治，禁止共产党活动，反对社会主义，主张巩固乌克兰独立和主权，坚决推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建设民族、民主国家。乌克兰共产党则主张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下台，取消总统制，恢复社会主义。在 1998 年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票最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两大政治组织坚持各自的政治主张，拉帮结派，互相对抗，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独立以来，乌克兰一共经历了多次宪政体制的改变，从总统议会制（1996 年）、议会总统制（2006 年）、总统议会制（2010 年），再到 2014 年的议会总统制，反复无常。在政治对抗的同时，也造成了乌克兰独立后二十多年多次重大的政府动荡。面对克里米亚公投的政治诉求，乌克兰政府的应对显得力不从心。1991 年 8 月，克里米亚议会就通过了总统选举法。1992 年 1 月，克里米亚举行总统选举，而当时乌克兰甚至没有宪法来约束克里米亚的这一行为。乌克兰政府为求其领土完整，允许克里米亚升格为共和国，这一举动并没有让克里米亚收敛，反而纵容了其独立情绪。梅什科夫在竞选总统时承诺当选以后不仅在克半岛内实行双重国籍，还要让克里米亚加入卢布区。最终，梅什科夫顺利当选克里米亚首任总统。2004 年“橙色革命”期间，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主导修改宪法，从总统制改为议会总统制，而亚努科维奇选举胜出后，反其道而行之，回归 1996 年宪法，再次恢复了总统制并不断扩大总统权力。^①乌克兰的政权结构在总统主导还是议会主导之间大幅度摇摆，每一次宪政权力的变动都反映了乌克兰的政治失序，而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势力则疯狂寻租，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① 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以及 O. Protsyk, “Troubled Semi-Presidentialism: Stabil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Cabinet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2003, Vol.55, No.7, pp.1077-1095.

第四，来自外部力量的干预推动了乌克兰国内的分离运动。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利益考量。1992年1月23日，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要求重新审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54年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的决定是否符合俄联邦宪法，同时建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也研究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①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借巡视黑海舰队之机，呼吁克里米亚居民进行全民公决，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克里米亚随即通过“宪法”，该宪法决定在克里米亚半岛内实行双重国籍并使克里米亚加入卢布区。克拉夫丘克政府对此进行强烈谴责。1993年7月9日，俄罗斯议会又通过关于收回克里米亚重要海军基地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法令。199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之际，克里米亚议会宣布脱离乌克兰，并建立了“克里米亚国防部”和“克里米亚武装部”。^②舆论方面，俄罗斯主要通过奥斯坦基诺广播电视公司进行宣传，并向克里米亚提供大量俄语出版物。克里米亚议会主席斯科夫承认，克里米亚在采取每项行动之前都同莫斯科进行过协商。^③2008年9月，俄罗斯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向克里米亚公民颁发护照。^④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干预乌克兰事务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就在克里米亚分裂问题上积极行动，从财力上对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民族分裂势力予以资助。这些国际财团以总部设在加拿大的霍林格社团为核心，该社团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任主席，英国的卡林顿勋爵和美国的基辛格等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⑤21世纪初，美欧力图推动北约和欧盟向后苏联地区，特别是乌克兰扩张，并积极干预乌国内事务。^⑥从整个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равовой оценке решений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РСФСР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статуса Крыма, принятых в 1954 году. http://sevkrimrus.narod.ru/ZAKON/o19_54.htm

② 张丽君、金锦虎编译：“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的杠杆”，《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2期，第24-25页。

③ 同上。

④ “Cheney urges divided Ukraine to unite against Russia’ threat”, Archived 21 May 2011 at the Wayback Machine, Associated Press, 6 September 2008.

⑤ 张丽君、金锦虎编译：“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的杠杆”。

⑥ 西方几乎一边倒的把乌克兰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是北约的东扩激怒了俄罗斯，西方对乌克兰的三大政策：北约东扩，欧盟扩张和推行民主化为乌克兰危机提供了充足的“燃料”，亚努科维奇拒绝了与欧盟谈判经济协议而转向俄罗斯，引发了

乌克兰危机的过程来看,美欧对曾在基辅独立广场上反抗亚努科维奇的反对派给予大力支持,麦凯恩、纽兰、阿什顿等美欧高官亲自为反对派站台助威,使乌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①

四、乌克兰政府的治理失效

对于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历届政府对克里米亚的社会治理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这体现在一系列社会治理及政治经济政策的失效。

首先,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推行乌克兰化政策失效。乌克兰政府以捍卫乌克兰语地位为由,在克里米亚学校推行乌克兰语的同时,对当地俄罗斯族及俄语居民权利进行限制,这都引起克里米亚社会的不满和抵制。乌克兰独立以来,俄语是否应被确定为第二官方语言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1994年,在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80%以上的人支持俄语与乌克兰语都成为官方语言,并且俄语成为区域一级的官方语言。然而,乌克兰政府不承认公民投票的结果。^②乌克兰政府强调,按照《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第十条,乌克兰语必须作为乌克兰国家唯一工作及文书语言。这一裁决意味着,包括警察和教师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工作时必须使用乌克兰语,而不懂乌克兰语的公职人员将被解雇。^③同时,乌克兰政府将俄语广播的时间减少到每周4小时。乌克兰信息部还表示,1996年出版的乌克兰语书籍的数量比1970年减少了2.3倍,克里米亚依然存在

危机。详见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A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93, No.5.

① 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

② Донбасс: забытый референдум-1994. <http://thekievtimes.ua/society/372400-donbass-zabytyj-referendum-1994.html>关于乌克兰语言政策的研究详见:李发元:“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以乌克兰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9期,第56-62;侯昌丽:“试析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去俄罗斯化”,《西伯利亚研究》,2012年第3期,第46-49页;何俊芳:“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及实施意义”,《民族论坛》,2013年第3期,第10-15页;戴曼纯:“乌克兰语言政治及语言生活现状”,《中国社会语言学》,2013年第2期;张宏莉、张玉艳:“乌克兰俄语地位问题探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25-31页。

③ TASS 1/5/00 and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1/19/00.

“俄罗斯化”，并呼吁议会捍卫乌克兰语的权利。^①实际上，由于长期受到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影响，在克里米亚俄语书籍占比 87%，即使独立以后，乌克兰大多数当代作家仍然习惯用俄语写作，尤其畅销书更是如此。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书籍出版政策效率低下，与俄语书籍相比，乌克兰出版商认为乌克兰语书籍在乌克兰市场的利润和需求都太低。^②在娱乐传媒领域，2012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乌克兰语歌曲占比 3.4%，俄语歌曲达到了 60%，另外，俄语报纸占比超过 60%，期刊占比 83%。即使在乌克兰国有频道，28%的电视节目都是乌克兰语和俄语双语节目。^③在互联网领域，调查显示，使用俄语的网民占比 80.1%；其次是英语，占比 10.1%；乌克兰语排第三，占比 9.5%^④。根据 2013 统计结果显示，乌克兰五个最受欢迎的网站（谷歌除外）中，有四个是俄语网站，^⑤最受欢迎的乌克兰语网站Ukr.net排名第八位。^⑥

其次，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的政治经济政策失效。1995 年 3 月，库奇马政府宣布废除克里米亚宪法以及克里米亚总统的职位，并强调如果该地区继续违反乌克兰宪法，克里米亚地区议会也会被解散，此举引发了克里米亚连续两个月的抗议示威。^⑦1997 年 4 月 9 日，克里米亚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罢免了乌克兰政府任命的克里米亚总理阿卡迪·德米登科(Arkady Demidenko)。而根据乌克兰宪法规定，克里米亚政府人事任免需经乌克兰国家元首批准。^⑧乌克兰政府与克里米亚的博弈，体现了乌克兰无法控制克里米亚的政治局势。

从经济方面看，苏联时期的克里米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有军工、旅

① TASS 1/5/00 and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1/19/00.

② Книгоиздание в Украине: мнения экспертов, <http://archive.kontrakty.ua/gc/2006/25/3-zaplati-za-kapitalizaciyu.html>

③ Українська мова втрачає позиції в освіті та книговидавництві, але тримається в кінопрокаті. <https://life.pravda.com.ua/society/2012/11/9/115486/>

④ “Ukraine’s Ongoing Struggle With Its Russian Identity”,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3758/ukraine-s-ongoing-struggle-with-its-russian-identity>

⑤ 四个俄语网站分别是 Vkontakte, Mail.ru, Yandex 和 Odnoklassniki。

⑥ “Ukraine’s Ongoing Struggle With Its Russian Identity”

⑦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Chronology for Crimean Russians in Ukraine”, 2004,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69f38ec2.html>

⑧ Jan de Weydenthal, “Ukraine: Pro-Russian Crimean Parliament Opposes Regional Governmen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https://www.rferl.org/a/1083142.html>

游和农业。克里米亚军工产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有很大比重。由于克里米亚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极为优越，有众多深水良港，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占领克里米亚以来，克里米亚一直是俄国和苏联时期黑海舰队的军事基地和军工造船基地。克里米亚有一半居民从事这一行业。在克里米亚，军工业和造船业的专业化和一体化生产水平都非常高。苏联解体前，乌克兰政府向克里米亚的人均投资水平高出乌克兰全国人均投资水平的 15-20%；乌克兰为克里米亚合作修建的克里米亚北运河将第聂伯河的淡水引入半岛，解决了克里米亚城乡 85%以上对淡水的需求，如按世界价格计算，每年带来的经济效益达 20 多亿美元；克里米亚所需的 75%的工业产品和 85%的电均来自乌克兰。^①克里米亚则向乌克兰提供蔬菜、水果、海产品和生活日用品。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的前两届政府均没有制定出有效的过渡政策，旧的经济关系打破了，新的经济体制建立不起来，致使乌克兰经济陷入危机，国内横向经济联系中断，军工产业萎缩，给克里米亚经济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旅游业曾是克里米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克里米亚局势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绝大部分的宾馆、疗养院因为客源不足而关门歇业。受乌克兰经济衰退的影响，克里米亚的农业生产和需求都受到重创，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大批农业从业人员失业。乌克兰独立后不到两年，克里米亚的失业人数一度高达数十万人。乌克兰各地区收入排名显示，2007 年，克里米亚人均月收入排名降到第 10 位，2009 年降到第 12 位，2013 年排名第 13 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第三，乌克兰政府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政策激化了克里米亚对乌克兰政府的不满。1989 年 4 月 29 日，克里米亚鞑靼人成立了克里米亚鞑靼民族运动组织^③。穆斯塔法·杰米列夫（Мустафа Джемілев）当选为民族运动组织主席。在此基础上于 1991 年恢复成立“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议会”（Меджлис

① 顾志红：“克里米亚大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69-73 页。

② Середня заробітна плата за регіонами за місяць у 2009 році. http://www.ukrstat.gov.ua/operativ/operativ2009/gdn/reg_zp_m/reg_zpm09_u.htm; Середня заробітна плата за регіонами за місяць у 2013 році. http://www.ukrstat.gov.ua/operativ/operativ2013/gdn/reg_zp_m/reg_zpm13_u.htm

③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ОКНД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由 33 名成员组成, 民族议会主席穆斯塔法·杰米列夫, 总部位于辛菲罗波尔。^①该组织的主要政治诉求有: 建立一个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 承认克里米亚鞑靼语为官方语言; 要有自己的学校和社区等。^②1991 年 6 月 30 日, 民族议会宣布自治, 并通过克里米亚鞑靼国歌和国旗。^③1993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 克里米亚鞑靼民族议会选出 14 名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参加 1994 年克里米亚议会选举, 并决定参加总统选举。^④2010 年 4 月 6 日, 克里米亚政治领导人要求乌克兰政府解散和禁止民族议会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代表, 声称他们是“有组织犯罪集团, 其活动是违宪的”^⑤。克里米亚鞑靼组织则敦促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保护克里米亚鞑靼人免受歧视。^⑥乌克兰政府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诉求, 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政府希望通过安抚越来越愤怒的克里米亚鞑靼人, 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培养“盟友”, 来平衡克里米亚的民族分裂主义。^⑦

综上所述, 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推行乌克兰化政策, 挫伤了克里米亚居民的情感和利益。经济发展缓慢, 加上社会动荡, 政府治理不力, 使得克里米亚与乌克兰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恶性循环。

① 克里米亚鞑靼人于 1917 年首次建立了他们自己的 Mejlis 和 Kurultai, 后被斯大林废除, 1991 年, 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克兰政府许可下, 恢复了 Mejlis-Kurultai 结构。

② [加]叶礼庭著:《血缘与归属》, 成起宏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 第 167-173 页。

③ “Crimean Tatar Fact Sheet: Chronology”,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204135457/http://www.euronet.nl/users/sota/krfacts.html>

④ Ibid.

⑤ “Pro-Russia Groups Want Crimean Tatar Bodies Disbanded”, *Radio Free Europe* https://www.rferl.org/a/ProRussia_Groups_Want_Crimean_Tatar_Bodies_Disbanded/2004234.html

⑥ “Crimean Tatar Groups In Germany Appeal To Ukrainian President”, *Radio Free Europe* https://www.rferl.org/a/Crimean_Tatar_Groups_In_Germany_Appeal_To_Ukrainian_President/2041406.html

⑦ “Is Kyiv Preparing to Change Course on the Crimean Tatars?” <http://www.moldova.org/en/is-kyiv-preparing-to-change-course-on-the-crimean-tatars-202254-eng/>

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乌克兰社会转型受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国际环境以及大国博弈影响了乌克兰民主转型的方向。美、俄、欧在乌克兰有着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诉求，它们之间的利益角逐和博弈构成了乌克兰危机的外部因素。

从乌克兰国内环境来看，乌克兰政府对国内族群分离运动的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自独立以来，族群分离一直是困扰着乌克兰社会转型的棘手问题。在乌克兰，各个族群因为历史原因与周边国家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不同族群之间也因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经济差距、政府治理等因素影响而存在敏感性。在乌克兰，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诸多因素为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积蓄了强大的动力，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秩序的溃散则为分离运动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历届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将乌克兰族的民族性上升为国家属性，将多数族裔的乌克兰文化上升为国家文化，对少数族裔采取了兼具同化和霸权控制的政策。再加上，政治失范造成的长期社会动荡和政府治理不力的政治文化，逐渐弱化了克里米亚对乌克兰政府的认同，与之相应的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阻滞了少数族群对政府的认同，成为克里米亚出现分离运动的重要诱因。

【Abstract】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the early 1990s, ethnic separation has always been a thorny problem plaguing Ukrainian social transition. In Ukraine, each ethnic group,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has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re also exist sensitivities due to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economic disparities,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other factors. Economic recession, ineffective governance, social corruption and many other factors have accumulated strong momentum for the regional separatist movement, while the collapse of the state order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has provided a huge space for the separatist movement. In this context, successive Ukrainian governments,

to different extents, pursued Ukrainization policies which reduced or even blocked minority recognition towards the government,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incentive for the Crimean Separation Movement.

【Key Words】 Ukrainian Social Transition, Ukrainian Ethnic Issue, the Crimean Issue

【Аннотация】 С момента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начале 1990-х годов этническ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стало остр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которая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Украине различные этн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 имеют сложное родство с сосе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ричинам, они такж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 к таким факторам,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убеждения,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неравен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ногие факторы,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пад, неудачи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коррупция предоставили импульс дл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а кр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я в период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огром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развитий в д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т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сменявшие друг друга украинск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различной степени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 политику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что несколько уменьшило или даже заблокировало призна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еньшинствами и стало важным стимулом для крым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Украинские соци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е этн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крымский вопрос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波兰和乌克兰关于历史记忆的冲突*

张丽娟**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西乌克兰地区制造了针对波兰平民的“沃伦事件”。尽管1991年以来波兰和乌克兰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基础上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但是两个国家关于“沃伦事件”有着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和叙述。乌克兰危机以来，由于各自国内政治-社会局势的发展，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此外，再加上波兰对乌克兰西部地区潜在的领土要求，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在目前的条件下，波兰和乌克兰关于历史记忆冲突的和解困难重重。

【关键词】沃伦事件 乌克兰外交 波兰外交 乌克兰历史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6-0162
(27)

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中，乌克兰民族从来没有独立建国，而且信奉希腊-天主教的波兰人和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形成了民族混居的状态，彼此间冲突不断。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乌克兰地区尤其是西乌克兰正好处于文明断层线上，“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近邻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要么是不信任地共处，要么是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①

* 本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

** 张丽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

波兰和乌克兰民族在西乌克兰的历史关系，恰好符合这种描述。

自十五世纪起，乌克兰地区和波兰的东南部分就产生了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共同属于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到十七世纪，西扩的俄罗斯帝国和波兰协议瓜分了乌克兰，俄罗斯占领了东乌克兰地区，西乌克兰地区仍然处于波兰王国的控制下。在十八世纪末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到二十世纪初的 150 年间，俄罗斯帝国统治了乌克兰土地的 90%，剩下的 10% 归奥匈帝国统治。^①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乌克兰又陷入了各方政治力量的争夺之中，并且一度在乌克兰中央拉达^②的努力下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③但是乌克兰人独立建国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1918 年复国的波兰，和苏俄一起再次效仿两百年前的做法，绞杀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以后共同瓜分了乌克兰。根据 1921 年签订的《里加和约》，乌克兰东部归属苏俄，西部则再次处于波兰的统治之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再次处于德国人、苏联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等各种力量的争夺与占领之下，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自的民族利益驱使下，发生了波兰和乌克兰民族历史上最为悲惨的“沃伦事件”。该事件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两个民族间的关系。

关于“沃伦事件”的研究，不仅有相关的档案集，同时拥有丰富的波兰文、乌克兰文、俄文以及英文研究成果。^④同时，国外学者对近年来波兰和

版社，1998 年，第 229、292 页。

①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16 页。

② 中央拉达：即中央委员会，1917 年 3 月-1918 年 4 月，最初是乌克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专业组织的代表机构。从 1917 年 4 月起，乌克兰全国代表大会具有了乌克兰最高立法机构的职能，并领导乌克兰的民族运动。1918 年 4 月德国占领军进入乌克兰，中央拉达的活动停止。参见 Украинска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рада — Википедия. 2018 年 8 月 17 日。

③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7 年 11 月-1920 年存在。1917 年 11 月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曾经参加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但是其存在并没有得到协约国的承认。随着 1920 年波兰和苏俄达成停战协议，西蒙·彼得留拉为首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流亡政府开始流亡海外。参见 Украи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 Википедия. 13.07.2018. <https://ru.wikipedia.org/wiki/>

④ 档案类：Мірчук П. Українська Повстанська Армія 1942-1952. Документи і матеріали. — Львів, 1991; Вятрович В.М. Польсько-українські стосунки в 1942---1947 роках у документах ОУН та УПА: у 2 т. ред. та упоряд. Львівський національний університет імені Івана Франка; Центр досліджень визвольного руху.—Львів: Центр досліджень

乌克兰之间关于历史记忆上的冲突也有所关注。^①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则关注较少。因此，本文试图在国外的档案资料以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回顾波兰和乌克兰民族共同的历史、考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历史活动和“沃伦事件”的过程，来分析“沃伦事件”的原因，并重点描述新世纪以来这一事件如何影响着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国家关系。

визвольного руху, 2011; Дюков А. Забытый геноцид: «Волинская резня» 1943-1944 годов: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Сборник.—М.: Алексей Яковлев, 2008; Артизов А.Н.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екст]: документы: в 2 т./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рх. агент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 арх.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2.

研究成果类：波兰学者的研究开始较早，并认为“沃伦事件”是对波兰人的种族灭绝，主要有 Szczesniak A.B, Szota W.Z. Droga do nikąd. – Warszawa, 1973; Prus E. Herosi spod znaku tryzub. – Warszawa, 1985; Його ж. Atamania UPA. – Warszawa, 1988. Władysław Siemaszko [en], Ewa Siemaszko [en]. Ludobójstwo dokonane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ludności polskiej Wołynia, 1939- 1945.—Warszawa: Wydawnictwo von Borowiecky, 2000. 等。

乌克兰学者则强调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独立建国的斗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Кульчицький С.В. Організація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націоналістів і Українська повстанська армія. Історичні нариси./ Відп. ред. . - Київ: Наукова думка, 2006.; Льюшин І.І. Протистояння УПА і АК (Армії Крайової) в роки Другої Світової війни на тлі діяльності польського підпілля в Західній Україні / відп. ред. С.В. Кульчицький.—К.: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 України, 2001.

俄罗斯学者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特别研究 Баканов А.И. Ни кацапа, ни жида, ни лях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деолог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1929-1945 гг. М.:Фонд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Алгоритм, 2014.

西方学者对波兰统治时期乌克兰民族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的活动也有所研究， J. Alexander, “Ukrainian Nationalist Political Violence in Inter-War Poland, 1921-1939 Motyl”,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85, Vol.19, I.1, p.45.

①主要有 T. Zhurzhenko, “Memory War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Ukrainian–Polish Borderlands: Geopolitics of Memory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In Mink G, Neumayer L.,eds., *History, Memory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Łukasz Adamski, “Kyiv’s ‘Volhynian Negationism:’ Reflections on the 2016 Polish–Ukrainian Memory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Soviet an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JSPPS)*, 2017, Vol.3, No.2.; Лукаш А. Развешанные иллюз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оль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 Европа. 2010. Т.10. №.1. С. 155-177; Стрильчук В.В. Проблемы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краин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2015. № 4-1; Мищак І. українська та польська історіографії про волинську трагедію 1943 року// Історіографічні дослідження в Україні. Вип. 18. .Ін-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 України, 2008.

一、西乌克兰的波兰化（1921-193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波兰，经过一百多年的破碎再次复国，因此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体现，是对其他少数民族强制性的同化，即“为了波兰人的波兰”。从占领西乌克兰伊始，乌克兰人就被认为是二等公民，波兰对乌克兰民族实行从人口结构、政治、文化、宗教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波兰化的政策，目的在于削弱乌克兰民族特性，以加强波兰政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波兰所统治的这部分西乌克兰土地包括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占波兰总领土的三分之一。为了显示统治的合法性，波兰将东加利西亚的官方名称改为“东小波兰”。^①西乌克兰地区民族、宗教状况非常复杂，是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捷克人和信仰希腊-天主教的波兰人，以及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等，不同宗教文明和不同种族的混居地区。据1921年波兰人口普查数据，在波兰的乌克兰人总数超过了455万。^②以沃伦省为例，1921年信仰东正教的人口为123.8万人，占75.38%，信仰希腊-天主教的18万人，占11%，犹太人18万人，占11%，其他民族的人4万人，占2.48%。^③对乌克兰人的波兰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结构的波兰化

人口结构波兰化的主要方式是移民，包括前波兰军人移民和普通居民移民，目的在于通过移民实行人口渗透，逐渐改变西乌克兰地区乌克兰人占据多数的民族人口构成，创造一个以波兰人为主的加利西亚和沃伦。据统计，从1920年到1929年，向西乌克兰移民的波兰军官达到了7.7万人。到1935年，移民人口达到了22.6万人。新到来的波兰移民并不和乌克兰人混居，而是组建新的移民定居点。在1938年波列斯基的6216个波兰移民点中，六

①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Львов : Вища шк : Изд-во при Львов. ун-те, 1983. С.119.

② Там же. С.127.

③ Там же. С.126.

分之一具有军事性质。^①经过长时期的移民，西乌克兰的人口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31年，在西乌克兰共有各族人口707万人。其中乌克兰人占比从1921年的75%降到了63%，波兰人从不到12%增加到24%。其他民族人口占比基本未变，犹太人占10%，其他民族成分的人2%。与1921年相比，十年间总人口增加了19.7%，其中信仰希腊-天主教的波兰人占增长总数的83%。^②这一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39年。

新移民到来以后必然要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尽管经过几年的移民，波兰人在西乌克兰仍然是少数，但是却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到1938年，波兰人在各省掌握的土地面积从66%-97%不等，而乌克兰人只掌握0.2%-3.6%。^③由于将土地分配给波兰人，不仅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引起了仇恨和疏离，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迫使乌克兰人向美国和加拿大移民。由于波兰政府认为少数民族的移民可以缓和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也鼓励西乌克兰人向外移民。^④据统计，1921-1938年之间，向加拿大移民的西乌克兰人人数为21.3万。^⑤

（二）文化和学校教育的波兰化

此举的目的在于增强波兰语、波兰文化的影响力，主要措施是直接关闭或者用双语学校替代乌克兰语学校。1924-1925学年，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地区，有2568个波兰语学校，2151个乌克兰语学校和9个双语学校。到1929-1930学年，上述地区的波兰语、乌克兰语和双语学校数量分别为2189个，648个和1793个。这其中，乌克兰语学

①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134.

② Там же. С.145-148.

③ Вабищевич А.Н.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е и западно-белорусские земли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Западная Белоруссия и Западная Украина в 1939-1941 гг. [Текст]: люди, события, документы / Учреж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Под ред. О.В. Петровская, Е.Ю. Борисено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 2011. С.18.

④ Yuriy Bilan, *Migration of the Ukrainian Population: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London: Ubiquity Press, 2017, p.58.

⑤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141.

校减少了 70%。增长的主要是双语学校。^①需要指出的是，双语学校并不是波兰语-乌克兰语，或者波兰语-白俄罗斯语，而是波兰语和当地方言的组合，例如波兰语-沃伦语、波兰语-加利西亚语等等，而且地方方言的教学采用和波兰语相同的拉丁字母，而非乌克兰人熟悉的西里尔字母。^②不管大部分学生的民族构成如何，如果有 20 个学生的父母要求用波兰语教学，那么这个学校就得是采用波兰语和当地方言的双语学校。^③1932-1933 年，学校教育中波兰化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到 1935 年，在整个波兰，乌克兰语学校和 1932 年相比又减少了 21%，只剩下了 457 个。^④1935 年的西乌克兰学生中，77.7%为波兰人，21.67%为乌克兰人，0.03%为德意志人。^⑤并且在 21.67% 的乌克兰学生中，就读乌克兰语学校的只有 5%，27%在双语学校，剩下的 68%在波兰语学校。^⑥利沃夫大学的 13 个乌克兰语教研室被取消，完全没有乌克兰文的书籍。

乌克兰青年进入大学必须要先在波兰军队服役，只占大学生总数的 2.9%，其中大部分为神职人员和富农的子女。^⑦乌克兰人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也被取缔，同时关闭了大量乌克兰人开办的图书馆、阅览室、文化社团和剧院。^⑧1932 年沃伦城市知识分子民族成分构成中，75.5%为波兰人，犹太人占 9.8%，俄罗斯人占 9.5%，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占 2.5%。^⑨

① Борисенко Е.Ю. Концепции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и их реализаци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1918-1941 гг.)//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ё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 2015. С.347

②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113.

③ Борисенко Е.Ю. Концепции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и их реализаци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1918-1941 гг.) С.346.

④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162.

⑤ Борисенко Е.Ю. Концепции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и их реализаци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1918-1941 гг.). С.347

⑥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162.

⑦ Там же. С.169.

⑧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171.

⑨ Вабищевич А.Н.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е и западно-белорусские земли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16.

（三）宗教领域的波兰化

支持希腊-天主教在西乌克兰的发展，并限制东正教。鼓励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规定在东正教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学校教学中只能使用波兰语；打击那些具有乌克兰精神和文化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代之以那些接受波兰文化和精神教育、并忠于波兰的人。^①1933年在霍尔梅辛关闭了100个东正教教堂。^②从1937年开始禁止向东正教人员出售土地，认为“只有波兰人是忠诚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都不能购买土地”。^③

（四）政治上的波兰化

表现在限制乌克兰人担任公职。1931年在沃伦的103个市行政工作人员中，67.1%为波兰人，25.4%为乌克兰人，6.1%为俄罗斯人，0.6%为捷克人，0.3%为德意志人，0.1%为犹太人。^④到1939年，在利沃夫的地方议会选举候选人中，波兰人1030个，犹太人34个，乌克兰人只有15个。在塔夫马奇市居民中，43.7%为乌克兰人，27.7%为波兰人，然而被选举的乌克兰人只有1个，波兰人11个。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⑤乌克兰人的政党同样受到限制，1933年乌克兰进步党、乌克兰农民联合党主办的报纸和杂志被取缔，主编被逮捕，出版报纸的印刷厂也被炸毁。一年后，这些党派正式被禁止活动。在西乌克兰，只有那些持反苏立场的政党才被允许存在。^⑥

波兰化政策的目的在于改变非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巩固波兰的统治。但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了波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间的疏离和仇恨，激起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这种反抗在乌克兰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

① Вабищевич А.Н.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е и западно-белорусские земли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16.

② Там же. С.14.

③ Там же.

④ Степан А.М.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западно-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перио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152.

⑤ Там же. С.165.

⑥ Там же.

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与“沃伦事件”

从西乌克兰被并入波兰开始，乌克兰人就没有放弃过反抗。这种反抗本质上是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是 1918 年乌克兰人尝试独立建国失败后的继续。

（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乌克兰人的民族独特性意识出现在十九世纪初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当中。但是早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长期停留在文化启蒙活动上，始终难以突破文化至上主义框架而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方向发展。^①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下，1890 年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西乌克兰成立了第一个乌克兰人的政党——“乌克兰激进党”。该党宣称以民族与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乌克兰激进党”于 1895 年提出了短期目标是乌克兰在奥匈帝国内实现完全自治，长期目标是在独立的乌克兰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争取乌克兰的政治独立，已经成为西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主要口号。^②

处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东乌克兰出现第一个政治性政党的时间稍晚。1900 年，“革命乌克兰党”在哈尔科夫成立。其活动范围覆盖中乌克兰和东乌克兰，并明确提出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由、独立、从喀尔巴阡山至高加索的乌克兰”的口号。此后，在东乌克兰也陆续成立了一些政党，但是活跃时间不长。随着 1905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革命运动陷入低谷。东乌克兰的政治党派或者沉寂，或者收缩乃至停止活动。但是西乌克兰的民族运动一直在持续。^③

因此，从历史过程来看，西乌克兰地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也是乌克兰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中坚力量，比东乌克兰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打击以后，经过几年的蛰伏，西乌克兰的民

① John S. Reshetar,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1917-1920: A Study in Nationalism*, R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2.

②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第 277 页。

③ 同上，第 259 页。

族主义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依托,又开始了新的活动。

早在 1920 年,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失败以后流亡海外的乌克兰军官,就在布拉格成立了“乌克兰军事组织”。主要从事反对波兰占领的地下恐怖活动。这一组织后来成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基础。^①此后,其他民族主义组织也陆续成立。1922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乌克兰青年民族主义者联盟”;1925 年,成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1929 年,这些民族主义团体联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人民起义军”。在成立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了“完全赶走乌克兰土地上所有的掠夺者”,“建立伟大的独立的乌克兰人共同体”的口号。并且通过了关于驱逐或者消灭乌克兰土地上所有波兰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政策。由此可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秉持着具有极端排外色彩的民族主义理念。^②

在成立之初,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曾经尝试利用国际组织,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波兰治下的西乌克兰人的权益。1931 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向国联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机构,递交了关于乌克兰人民被波兰政府压迫的报告。但是国联拒绝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可以代表乌克兰人的权益,并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其他国家对此也没有积极的回应。此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放弃了和平的活动方式。^③

从三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主要从事煽动农民起义和恐怖主义活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利用乌克兰人对社会状况的不满,煽动对波兰人的仇恨,组织乌克兰农民进行反抗波兰地主的行动。从 1930 年 7 月-11 月,乌克兰农民实施了上百起怠工行动,焚烧房屋、生产工具、粮食等等。到了 1932 年,乌克兰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再局限于怠工行动,而是具有了农民起义的色彩。在波兰政府对其镇压

① Козлов А.В. Внутренние войска в борьбе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ами. М.: На боевом посту, 2016. С.11

② Баканов А.И. Ни кацапа, ни жида, ни лях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деолог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ьстов, 1929-1945 гг. М.:Фонд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Алгоритм, 2014. С.19.

③ Там же.

的过程中，数千乌克兰人被杀。^①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主要针对波兰国家机关和反对乌克兰的积极分子，如，1932年袭击利沃夫的警察局长，1933年抢劫并攻击市邮局，1934年袭击波兰的内务部长。波兰内务部长被袭击后，波兰政府在1934-1935年间大规模地逮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分子，使该组织受到重创。其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著名的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也被捕并被监禁，直到1939年才重获自由。^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乌克兰起义军的活动，虽然给波兰政府在西乌克兰的统治带来了威胁，但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

（二）“沃伦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波兰被占领，给了乌克兰人复仇的机会。在苏联占领波兰的行动中，有7000多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参加并获得了武器。利用暂时的混乱状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袭击波兰军队、政治积极分子甚至乡村教师。据统计，1939年9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共杀害了129名波兰人。^③1939-1941年间，西乌克兰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此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主要的反对对象变成了苏联当局，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随着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占据西乌克兰以后，乌克兰人又开始了对波兰人的报复。但是和1939年一样，此时的报复行动具有随机性，主要针对的对象仍然是波兰的政治积极分子，尽管存在对普通波兰人的袭击，但是并没有将仇恨加诸到整个波兰人身上。

在1942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乌克兰人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反对苏联，要在波兰人“承认国家独立、尊重西乌克兰地区乌克兰人民权利的基础上缓和波兰-乌克兰关系”。1943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将普通波兰人驱逐出乌克兰的计划。但与此同时，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教育宣传材料中，认为“要消灭所有外族领导人中的

① Баканов А.И. Ни кацапа, ни жида, ни лях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деолог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ьстов, 1929-1945 гг. С.123.

② Там же. С.19.

③ Там же. С.124.

积极分子，如果有必要，我们将消灭整个外族人。”^①因此，虽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普通波兰人的政策是驱逐而不是消灭，但是乌克兰人仍然认为自己的民族利益至上，为此可以不择手段。

最终酿成“沃伦事件”的导火索，是波兰人充当德国的宪警参与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打击。这使后者改变了之前相对温和的路线，将袭击矛头对准了普通波兰人。1941-1944年西乌克兰被德国占领期间，德国人利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矛盾，挑拨双方关系。当时，无论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德国人合作。1942年，波兰警察与德国人合作袭击东正教会人士和乌克兰知识分子，部分乌克兰家庭也遭到了屠杀。到1943年3月，在5000多乌克兰警察叛变德国人投靠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以后，德国人又招募了大量的波兰警察，在德国人和波兰人的联合进攻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②在这些事件的刺激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波兰人要为此负责，于是开始了对波兰移民村庄和普通波兰人的袭击。

1943年初，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波兰村庄的攻击还只是随机性的。到3-4月，逐渐演变成了系统性的、有组织的攻击。一开始的攻击只针对沃伦北部和东部的波兰人村庄。到6-7月，开始发展到整个沃伦地区。其中，在乌克兰人攻击高峰的7月11-12日，丧生的波兰人超过了4300人。据苏联情报机构的报告，7月18日，在沃伦市区的街巷中又有超过2000多波兰人被杀，整个7月超过了10000波兰人死亡。当乌克兰人的行动有所回落，波兰人放松警惕的时候，8月29-30日乌克兰人又组织了新的进攻，部分村庄中将近一半的居民死亡，总人数超过了15000人，其中不乏大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③同时，乌克兰人散发传单，说明如果波兰人放弃抵抗，为乌克兰人所用，共同反对德国人和苏联当局的话，将停止攻击。^④

1943年底到1944年初，利用德国人撤走、苏军尚未到来的权力真空期，

① Баканов А.И. Ни кацапа, ни жида, ни лях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деолог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ьств, 1929-1945 гг. С.230.

② Там же. С.214.

③ Дюков А.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ланах ОУН(Б): От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й ассимиляции к этническим чисткам// Забытый геноцид: Вольнская резня, 1943-1944 годов,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д ред. А. Дюков. М., 2008. С.38.

④ Баканов А.И. Ни кацапа, ни жида, ни лях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деолог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ьств, 1929-1945 гг. С.245.

乌克兰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并将攻击范围从沃伦扩展到了加利西亚。但是与沃伦不分年龄和性别、针对普通波兰人的屠杀不同，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只消灭抵抗的波兰军事力量，而不是所有波兰人，但是个别的不分年龄和性别的屠杀仍不可避免。^①到 1944 年夏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才颁布了不允许再杀害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命令。和波兰人通婚，以及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乌克兰人也不再属于攻击范围。^②在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行动中，并没有涉及居住在西乌克兰土地上的其他少数民族，例如对沃伦的捷克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和其保持整体上良好的关系。^③此外，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人都支持对波兰人的行动，大量的乌克兰人庇护波兰人，帮助他们逃离。一些乌克兰领导人，包括宗教领袖，也向当局抗议对波兰人的杀戮，但是这种力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能阻止暴力的浪潮。^④乌克兰人对波兰人的大规模袭击于 1944 年 9 月份停止，原因在于面对即将到来的苏联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乌克兰人应该和波兰人合作，共同对抗苏联。但是直到 1945 年最初的几个月，在西乌克兰的土地上仍然存在针对波兰平民的屠杀。

关于波兰和乌克兰这场冲突中的受害者人数并没有定论。波兰学者认为，死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的波兰人，包括沃伦和东加利西亚地区，总数约为 10 万。^⑤乌克兰学者认为准确的估计应该接近 3.5 万人。^⑥美国学者则认为 1943 年在沃伦被杀的波兰平民在 5 万-6 万之间，而整个战争期间在西乌克兰地区被杀的波兰人估计在 7 万到 10 万之间。^⑦其中，

① Баканов А.И. Ни кацапа, ни жида, ни лях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деолог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ьстов, 1929-1945 гг. С.305.

② Там же. С.312.

③ Козлов А.В. Волинская резня: украинско-пол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в 1943-1944гг//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2. №.12.

④ Jared McBride, "Peasants into Perpetrators: The OUN-UPA and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Volhynia, 1943-1944", *Slavic Review*, 2016, Vol.75, No.3.

⑤ Grzegorz Motyka, *Od rzezi wołyńskiej do akcji "Wisła"*. Konflikt polsko-ukraiński 1943-1947, Kraków, 2011.

⑥ Дюков А.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ланах ОУН(Б): От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й ассимиляции к этническим чисткам. С.36.

⑦ Jared McBride, "Peasants into Perpetrators: The OUN-UPA and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Volhynia, 1943-1944".

70%的波兰受害者为妇女和儿童。^①

1944年冬天苏联收复西乌克兰地区后，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署了关于交换民族人口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到1946年10月，共有109万波兰人从苏联各地迁往波兰，其中从西乌克兰地区迁出79万人；从波兰迁往苏联52万人，其中乌克兰人48万。^②人口交换行动完成以后，1947年3-7月，波兰政府将仍然滞留在波兰东部的15万乌克兰人口驱逐到了波兰西北部，被称为“维斯瓦”行动。此举一是为了打击仍然在活跃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使其居住地与乌克兰土地相分离，失去活动的群众基础；二是为了用移民填充原属德国、二战以后被划分给波兰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省南部地区。^③经过交换民族人口和“维斯瓦”行动，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在西乌克兰地区长期混居的状态结束，两个民族间纠缠几百年的矛盾和冲突终于暂时落下帷幕。

“沃伦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几百年的历史积怨，是波兰统治时期对乌克兰人的波兰化和乌克兰人追求独立建国的斗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乌克兰地区各种政治势力交织，错综复杂，相互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了“沃伦事件”爆发的推手。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根据官方的政策，1943-1945年间发生在沃伦的悲剧，在苏联时代成了波乌边境两侧的一种禁忌。

三、现代波兰和乌克兰国家关系中的“沃伦事件”

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开启了现代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波兰是乌克兰宣布独立以后，第一个承认其独立国家地位并与之建交的国家。对于新生的乌克兰来说，波兰的支持至关重要。两个国家之间不仅拥有共同的反俄立场，波兰也是乌克兰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样

① Баканов А.И. Ни кацапа, ни жида, ни лях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деолог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1929-1945 гг. С.319.

② Полян П. Россия и ее регионы в XX веке: территория - расселение - миграции. М.: ОГИ, 2005. С.536.

③ Тадеуш В. У истоков борьбы с реакционным подпольем в Польше. 1944-1948. Киев: Наукова думка, 1984. С.253.

板，并成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少数地缘政治盟友之一。两个国家逐渐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甚至共同主办了 2012 年的欧洲足球锦标赛。然而，尽管拥有共同的政治利益，但两个国家间依然存在着历史记忆和叙述上的冲突。

（一）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乌克兰危机期间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 21 世纪初期，许多欧洲国家制定了关于历史记忆的法律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对历史（关于大屠杀、种族灭绝以及殖民暴行等）的修正和否认，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过去，达成民族和国家的和解，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信任的基础。但是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尤其是在中东欧，这种历史记忆逐渐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这种背景下，1998 年波兰成立了国家记忆研究所，其主要目的在于“调查 1939-1989 年期间纳粹、共产主义和其他力量对波兰人的犯罪”。^①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叙述中，“沃伦事件”被重新提起，并被认为是乌克兰人对波兰人的犯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及其领导人是屠杀波兰人的刽子手。

但是在乌克兰的历史叙述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及其领导人，则是“为乌克兰独立而斗争的英雄”。伴随着几百年来乌克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独立建国，乌克兰政权强力引入坚定的民族主义叙事，以塑造民族主义的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民族认同。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因其一贯追求独立建国而反对苏联、波兰的历史，与乌克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目标一致，乌克兰不断肯定其历史地位，以寻求历史合法性来为当前的政策正名。

比如，从独立之初的 90 年代起，乌克兰各地就修建了大量有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纪念碑和历史纪念博物馆。1995 年乌克兰利沃夫地区议会首先通过了《关于乌克兰起义军老兵的社会地位以及保障其社会权利》的决议，

^① “Ustawa -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Official website, 09.10.2018. <https://ipn.gov.pl/pl/o-ipn/ustawa/24216,Ustawa.html>

乌克兰起义军首次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并且为了乌克兰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2004 年橙色革命以后，加大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宣传，2005 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决议，在国家层面上确定了其历史地位。2006 年，在乌克兰起义军成立 64 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尤先科签署了《关于全面研究和客观报道乌克兰解放运动的活动以及民族和解》的命令，要求给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乌克兰起义军特殊地位，要求科学教育部将乌克兰起义军的历史作为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来普及，组织出版书籍、电影纪录片，并“全面客观地报道乌克兰人参加二战的活动”。2009 年发行了斯捷潘·班德拉 100 周年诞辰的纪念邮票。^①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前十年，尽管存在这种历史记忆和叙述的冲突，但是在波兰的地缘政治思想中，波兰的独立是由其东部邻国的主权独立所确保的，而这种主权独立又是需要民族主义所支撑的。因此，波兰不得不忍受乌克兰对班德拉分子的颂扬，两个国家也做出了和解的努力。^②早在 1990 年，波兰参议院就正式谴责了“维斯瓦河”行动。^③1996 年波兰军事历史研究所和乌克兰沃伦州立大学成立联合研究中心，共同致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的研究，并在 1996-2001 年间轮流在乌克兰和波兰召开了 10 次研讨会，出版了 10 卷本的会议论文集。^④波兰和乌克兰总统也分别在 1997 年、2003 年以及 2007 年，就“沃伦事件”和“维斯瓦河行动”发表联合和解声明。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和波兰的罗马天主教，也分别在“沃伦事件”2005 年 62 周年和 2013 年 70 周年之际，发表了和解的联合声明。^⑤

① Козлов А.В. Внутренние войска в борьбе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ами. С.5.

② Киселёв А.А. Волинский геноцид 1943 г.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55.

③ T.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转引自 T. Zhurzhenko, “Memory War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Ukrainian-Polish Borderlands: Geopolitics of Memory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p.178.

④ Мищак І. Українська та польська історіографії про волинську трагедію 1943 року. С.488.

⑤ У зв'язку з ухваленням Сенатом і Сеймом Республіки Польща постанов від 7 липня 2016 року та 22 липня 2016 року щодо Волинської трагедії. Офіційний портал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України .25.09.2018. http://w1.c1.rada.gov.ua/pls/radan_gs09/ns_golos?g_id=8479; Про схвале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о-польської парламентської заяви у зв'язку з 60-ю річницею волинської трагедії. ПОСТАНОВА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України. 10.07. 2003. №.1085-IV.

然而官方的和解姿态，并不能也没有消除相互间的历史隔阂。乌克兰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宣扬，主要目的在于进行反苏、反俄宣传，但是也逐渐引起了波兰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波兰媒体越来越经常地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认为波兰和乌克兰的和解，是对沃伦受害者的背叛和遗忘。^①2009年7月15日，在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右翼政客在反乌克兰情绪的主导下，波兰议会通过了关于认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针对波兰人的行动具有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特点”的决议。^②乌克兰则针锋相对，于2010年直接授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③此举不仅遭到了国际公认的乌克兰问题学术专家、俄罗斯人、犹太人以及曾经遭受斯捷潘·班德拉迫害的乌克兰东部城市的抗议，而且在波兰的主导下，欧盟议会在关于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中指出，“如果乌克兰想要成为欧盟的一员，就必须遵守其相关的法案，致力于维护共同的欧洲价值观，停止对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的英雄化。”^④利沃夫议会则向欧盟议会发出公开信，表示将捍卫斯捷潘·班德拉的荣誉、以及乌克兰人拥有自己英雄的权利。^⑤

正当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因历史问题发生争吵之际，2010年2月，亲俄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在俄罗斯的敦促下，亚努科维奇宣布撤销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2010年4月，乌克兰法院判决确认了这一决议，并最终在2011年1月执行。^⑥在2010-2014年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乌克兰向俄罗斯靠拢，停止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宣传，也暂停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而这段时期波兰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重点

① Лукаш Адамски. Развееянные иллюз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оль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 С.158.

② Uchwa³a Sejmu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z dnia 15 lipca 2009 r. w sprawie tragicznego losu Polaków na Kresach Wschodnich// Monitor Polski. 2009. Nr.47. Poz.684. 27.09.2018.<http://prawo.sejm.gov.pl/isap.nsf/download.xsp/WMP20090470684/O/M20090684.pdf>

③ European Parliament, “Motion for a resolution on Ukraine”, updated on 12 May 2010, case-B7-0120/ 2010, 28.09.2018,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

④ T. Zhurzhenko, “Memory War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Ukrainian-Polish Borderlands: Geopolitics of Memory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p.173.

⑤ Ibid, p.173.

⑥ ВАСУ підтвердив незаконність присвоєння Бандері звання Героя України. 28.09.2018. <https://ua.korrespondent.net/ukraine/1246199-vasu-pidтверdiv-nezakonnist-prisvoennya-banderi-zvannya-geroya-ukrayini>

在于让其重新走上加入欧盟的道路，因此，两个国家关于历史问题也没有爆发大的争论，只是波兰在 2013 年“沃伦事件”70 周年之际，重申了 2009 年的决议。

（二）从乌克兰危机至今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后，波兰和乌克兰之间暂时平息的争论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并且愈演愈烈，成了双边关系中最大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个国家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后，在与俄罗斯冲突的背景下，乌克兰重启了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曾经和苏联对抗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的历史地位，也再次得到肯定。同时，危机后奉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民族主义理念的民族主义团体活跃，例如爱国力量联盟、“民族团体”党、“右区”组织、全乌“自由”联盟、乌克兰民族会议-乌克兰人民自卫军、C14（乌克兰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团体）、社会-民族大会以及斯捷潘·班德拉三叉戟，以及乌克兰民族委员会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对抗俄罗斯，但是依然引起了波兰人的警觉和抵制。

同时在波兰，“最近几年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了一些激进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影响力。”^①其中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是成立于 2014 年的“民族运动”党。此外，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全波兰青年”和“民族-激进阵营”也异常活跃。“民族-激进阵营”还成立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民族捍卫者”。其目的在于“保护波兰人免受外部邪恶力量的影响，例如伊斯兰国”。^②2015 年，右翼保守主义的“法律与公正”党在选举中获胜并上台执政，更是极大地增强了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话语权。^③

第二，大量乌克兰移民涌入波兰。自 1991 年独立以后，乌克兰劳务移民就开始赴其他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因便利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联系，

① Лыкошина Л.С. Ноциоализ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ьше//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2016. №.2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许多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赴波兰谋生，乌克兰危机后动荡的政治和社会局势更加剧了这一趋势。根据波兰家庭、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的统计数据，乌克兰人申请波兰工作许可证的数量逐年大幅增加，从 2013 到 2014 年增加了 29%，2014 到 2015 年增加了 109%。因 2016 年数据缺乏，和 2015 年相比，2017 年比 2015 年增加了 276%。^①就人数来说，到 2015 年大概有超过 100 万乌克兰人在波兰工作，这个数量和在英国波兰人数量大致相同。^②同时根据波兰劳动监察局的数据，2014 年抽查的 15500 个外来劳工中，9500 人来自乌克兰，占 61.2%。^③

对波兰来说，一方面，乌克兰人的大量涌入加速了波兰成为移民国家的速度；另一方面，在欧洲难民危机下，波兰更加愿意接收文化相近的乌克兰人而不是来自中东的穆斯林。^④但是总体来说，在波兰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以及右翼政党执政的情况下，波兰政客和媒体将移民视为一种威胁，并将其转化成了政治问题。波兰人认为，移民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偷盗工作机会并分享社会福利，波兰社会对移民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

第三，两个国家公众反对彼此的情绪升高。在波兰的历史记忆政策下，“沃伦事件”越来越广为人知。在波兰的调查中，2003 年有 48.9% 的人对 1943 年的“沃伦事件”一无所知，教科书中也没有相关信息。到 2008 年，有 41% 的波兰民众表示没有听说过。到了 2013 年，41% 的民众表示听说过，具体不清楚，但是有 52% 的被调查者表示班德拉分子实施了对波兰人的种族灭绝。^⑤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的反乌克兰情绪也越来越高涨。而在乌克兰，

① Analizy i raporty/ Cudzoziemcy pracujący w Polsce - statystyki / Ministerstwo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09.10.2018. <https://www.mpips.gov.pl/analizy-i-raporty/cudzoziemcy-pracujacy-w-polsce-statystyki/>.

② Anne White,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Poland*, UCL Press, 2018, p.214.

③ Yuriy Bilan, *Migration of the Ukrainian Population: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p.70.

④ Anne White,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Poland*, p.214.

⑤ Trudna pamięć: Wołyń 1943. – Warszawa: CBOS, 2013. №. 93.9 s. 转引自 Киселёв А.А. В олыньский геноцид 1943 г.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сторико-правовых, филолог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сихолог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85-летию Бря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кад. И.Г. Петровского и 20-летию филиал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г. Новозыбкове. г. Новозыбков/ Ред. кол.: В.В. Мищенко, В.Н.

在民族主义叙事和与波兰人的冲突影响下，乌克兰人认为，在历史上，波兰是阻挡其民族独立建国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上述原因推动下，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开始了新一轮关于历史记忆的冲突。2015年5月15日，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签署了《关于二十世纪乌克兰独立斗争战士的法律地位和纪念》的法令，授予了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独立战士”的地位。^②2016年7月7日，基辅市议会将5个具有苏联印记的街道改名，其中莫斯科大道改为斯捷潘·班德拉大道。^③波兰方面针锋相对。第二天，即7月8日，在新上台的“法律与公正”党的推动下，波兰议会通过了将“1943–1945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波兰第二共和国人民的犯罪行为”认定为“种族灭绝”的决议，并宣布7月11日为沃伦“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④这些措施引发了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关于“沃伦事件”的争论的小高潮。2016年8月，90名乌克兰著名的公众人物公开呼吁，将9月23日设定为波兰对居住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镇压的纪念日，这份倡议得到了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乌克兰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乌克兰前外交部长、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等知识分子的支持。^⑤随后，9月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谴责了波兰的决议，指责波兰“将乌克兰和波兰历史关系中的悲剧事件政治化，具有反乌克兰的特点”。^⑥

到了10月份，波兰官方投资拍摄的反映“沃伦事件”的历史电影《沃

Пустовойтов, С.Н. Стародубец.– Брянск: Изд. БГУ, 2015. С. 52.

① Киселёв А.А. Волинский геноцид 1943 г.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55.

② Про правовий статус та вшанування пам'яті борців за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України у ХХ столітті. Відомості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ВВР). 2015. №. 25. С.190. 27.09.2018. <http://zakon.rada.gov.ua/laws/show/314-19>

③ Переименовати Московський проспект на проспект Пухнастих котиків - Петиції. Київська міська рада. 29.09.2018. <https://petition.kyivcity.gov.ua/petition/?pid=2782>

④ «z dnia 22 lipca 2016 r. w sprawie oddania hołdu ofiarom ludobójstwa dokonanego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obywatelach II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w latach 1943-1945» Uchwała Sejmu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25.09.2018. http://orka.sejm.gov.pl/proc8.nsf/uchwaly/625_u.htm

⑤ Łukasz Adamski, “Kyiv’s ‘Volhynian Negationism:’ Reflections on the 2016 Polish–Ukrainian Memory Conflict”, p.253.

⑥ У зв'язку з ухваленням Сенатом і Сеймом Республіки Польща постанов від 7 липня 2016 року та 22 липня 2016 року щодо Волинської трагедії. Офіційний портал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України. 25.09.2018. http://w1.c1.rada.gov.ua/pls/radan_gs09/ns_golos?g_id=8479.

伦》上映。这部电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并塑造了波兰公众关于“沃伦事件”的集体历史记忆，而且极大地煽动了波兰民众的反乌克兰情绪。在波兰右翼政党的游行中，出现了焚烧乌克兰国旗的行为，甚至呼吁对乌克兰人采取暴力行动。^①按照计划，电影《沃伦》将于10月18日在基辅上映，许多乌克兰人士认为电影带有波兰人的主观性并冒犯了乌克兰人，后来被乌克兰政府禁止上映。^②

10月20日，波兰和乌克兰共同发布了《记忆与团结》宣言，将两个国家的历史纠纷归罪于德国和苏联，认为“德国和苏联应该共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百万的受害者负责”。^③这一宣言暂时缓和了两个国家之间紧张的外交冲突。

2018年1月22日，据全乌克兰社会组织“乌克兰的选择”官方网站报道，1月16日波兰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承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波兰人的行动属于种族灭绝。后来证实这一消息并不属实，在联合国网站文件中心也没有查到相关信息。但实际上，波兰民族主义右翼政党一直在做类似的努力，这意味着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关于历史记忆的冲突有国际化的可能。^④

2018年2月14日，波兰总统杜达批准了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提出的法律修正案，将对那些否认“1917年-1990年期间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波兰公民的犯罪行为”的言行追究法律责任，判处3-5年监禁或者罚款。^⑤受这项法律影响最大的是在波兰工作的，大部分来自于乌克兰

① Сыновец А. История и популяр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польский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вокруг фильма Войцеха Смажовского «Волынь»// Новые контуры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Под ред. Д.А. Лушникова. V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е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чтения. 16 ноября 2016 года. г. Ставрополь, СКФУ). Ставрополь: Изд-во СКФУ, 2017. С.37.

② Там же. С.39.

③ Неменский О. Новое завоевание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 Известия. №.199. 2016.25 октября.

④ Польша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ла в СБ ООН проект резолюции о геноциде поляков со стороны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 VYBOR. UA. 05.10.2018.http://vybor.ua/article/vneshnjaja_politika/polsha-zaregistrovala-v-sb-oon-proekt-rezolyucii-o-genocide-polyakov-so-storony-ukrainskih-nacionali.html

⑤ O zmianie ustawy o Instytucie Pamięci Narodowej – Komisji Ścigania Zbrodni przeciwko Narodowi Polskiemu, ustawy o grobach i cmentarzach wojennych, ustawy o muzeach oraz ustawy o odpowiedzialności podmiotów zbiorowych za czyny zabronione pod groźbą kary. Ustawa -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11.10.2018.https://ipn.gov.pl/pl/o-ipn/ustawa_24216,

兰民族主义泛滥的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劳务移民。波兰称，要弄清楚这些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斯捷潘·班德拉的态度，被问询者有义务公开谴责对波兰人的“种族灭绝”。

对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任何政治决定都不能取代历史真相，波兰的决定不符合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则”。^①为了回应波兰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乌克兰起义军以及班德拉分子的法案，2月17日，乌克兰单方面宣布停止两个国家之前达成的关于搜索和挖掘1915-1916年间在乌克兰西部地区牺牲的波兰军团战士遗体的工作。^②乌克兰利沃夫和捷尔诺波尔市也决定在庆典和节日期间，在市行政机构建筑上并列悬挂乌克兰国旗黄蓝旗和代表乌克兰起义军的黑红旗。^③据《今日俄罗斯》电台报道，2018年3月20日，波兰民族主义者又在乌克兰驻波兰大使馆门前集会，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宣扬，并焚烧斯捷潘·班德拉的画像和其他带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标记的物品。^④

在2018年7月8日“沃伦事件”受害者75周年之际，波兰总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共同出席纪念活动的邀请，两国总统分别进行了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沃伦事件不应该成为两个国家间的政治主题……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应该就历史问题达成和解，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将是对俄罗斯侵略政策的有力回应”。^⑤波兰总统杜达则表示，“发生在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不是战争，而是种族清洗……有将近10万名波兰平民成为受害者”，并且特别强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历史

Ustawa.html

① Тарасенко Н. Польський Закон «Про Інститут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пам'яті»: погляд з України // Україна: події, факти, коментарі. 2018. № 4.

② Там же.

③ Україна поднимет флаг УПА в ответ на запрет «бандеров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в Польше: Украина: Бывший СССР: Lenta.ru. 09.10.2018. <https://lenta.ru/news/2018/02/02/mda/>

④ Поль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сожгли портреты Бандеры и Шухевича у посольства Украины в Варшаве — RT на русском. 09.10. 2018. <https://russian.rt.com/world/video/494072-polsha-nationalisty-bandera-ukraina>.

⑤ “Stro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Ukraine and Poland will be a powerful response to the aggressive Kremlin policy”,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11.10.2018. <https://www.president.gov.ua/en/news/micne-strategichne-partnerstvo-mizh-ukrayinoyu-ta-polshayu-s-48578>

真相的基础之上。^①

除了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关于历史记忆的外交冲突之外，更让经历危机后的乌克兰政权不安的是，波兰民族主义者对波兰曾经统治过的乌克兰西部领土的觊觎。为此双方也爆发过几次争端。现代乌克兰国家的版图，是继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其版图内的西乌克兰部分属于波兰、外喀尔巴阡山属于匈牙利、北布科维纳则属于罗马尼亚。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以及顿涅斯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乌克兰国家分裂的步伐。而如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也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前领土的要求。

波兰人从来没有忘记“东小波兰”的领土曾经属于自己，尤其是对利沃夫的怀念。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里，利沃夫曾经是波兰的中心城市，具有浓厚的波兰文化氛围。尽管苏联曾经进行了乌克兰化改造，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兰一直在努力恢复波兰文化在西乌克兰地区的影响力。由于乌克兰独立以来地方资金的不足，允许外资介入历史遗产的修复工作中，波兰借此政策修缮了大量与波兰文化有关的建筑遗迹。同时通过和乌克兰的“文化外交”政策，在西乌克兰的大学开展波兰语教学、开设波兰文化中心，并发现波兰文报纸，组织波兰青年到“故土”旅行。^②

2007年，波兰出台了“波兰卡”^③政策，以增加波兰对独联体国家内波兰裔公民的吸引力。据波兰境外人士服务办公室的数据，从2014年开始到2018年第一季度为止，获得“波兰卡”的23.3万人中，来自乌克兰的波兰裔人数最多，为15.5万人，占67%。^④“波兰卡”制度被其他国家指责为“试

①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 News / Polish President on Volhynia Massacre anniversary observances. 11.10.2018. <http://www.president.pl/en/news/art,795,polish-president-on-volhynia-massacre-anniversary-observances.html>

② T. Zhurzhenko, “Memory War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Ukrainian-Polish Borderlands: Geopolitics of Memory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p.175.

③ 波兰卡：2007年开始实行，相当于波兰免费的长期签证，有效期为10年，随后每10年更新一次，持有该卡的人在波兰居住满一年即可获得波兰公民身份。独联体国家境内的波兰裔居民及其亲属，或者对波兰语言、文化和历史表示好感的人可以申领该卡。波兰向持有“波兰卡”的人提供工作、教育、交通、医疗等方面的优待，自2015年起，为拥有“波兰卡”并移居到波兰的每位家庭成员提供5400欧元的资助。

④ Karta Polaka – rośnie liczba zezwoleń na pobyt stały | Urząd do Spraw Cudzoziemców.03.11.2018. <https://udsc.gov.pl/karta-polaka-rosnie-liczba-zezwoleń-na-pobyt-staly/>

图在拥有紧凑的波兰人族群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政治游说集团”。并且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代表波兰人利益的组织——“波兰人联盟”，该组织的活动已经超越了文化中心的框架，并得到波兰官方的支持。^①

2002 年，因波兰在利沃夫重建“雏鹰”公墓，而引发了两个国家关于潜在领土争端的第一次冲突。“雏鹰”公墓建于 1925 年，是为了纪念 1918-1920 年间抵抗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布尔什维克而牺牲的波兰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毁。乌克兰人认为，重建这一公墓是波兰为了彰显在利沃夫的存在，但是最终乌克兰让步，2005 年“雏鹰”公墓落成并被认为是波兰人的圣地。^②在上文提到的 2009 年波兰议会关于认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针对波兰人的行动具有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特点”的文件中，使用了“东部边境地区”的表述，对此乌克兰认为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这样的术语是不可接受的，是领土要求的表现并表达了抗议。^③2016 年波兰议会将“沃伦事件”认定为是对波兰人的“种族灭绝”以后，乌克兰前外交部长鲍里斯·塔拉休克为了表示抗议，辞去了乌克兰与波兰间议会关系小组主席的职位，并表示波兰人歪曲历史并侮辱乌克兰人，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乌克兰西部领土的觊觎。^④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 2016 年 11 月 11 日波兰独立日游行、2018 年“沃伦事件”75 周年游行等活动中，波兰民族主义者打出了“波兰的利沃夫”等标语。^⑤2017 年夏，波兰内政部提出将利沃夫的波兰军人“雏鹰”公墓的照片印在新版护照上的建议，在乌克兰外交部抗议后，这一建议被否决。波兰这一行动普遍被认为是在试探乌克兰和国际社会的反应。^⑥

① Косолапов Н. "Мягкая сил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Польша на примере Украины и Белорусс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3.2016.

② Стрильчук В.В. Проблемы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краин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2015. №.4-1.

③ Т. Zhurzhenko, "Memory War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Ukrainian-Polish Borderlands: Geopolitics of Memory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p.180.

④ Łukasz Adamski, "Kyiv's 'Volhynian Negationism:' Reflections on the 2016 Polish-Ukrainian Memory Conflict", p.253.

⑤ В Варшаве проходит марш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 РИА Новости, 11.11.2016. <https://ria.ru/world/20161111/1481196855.html>; В Варшаве прошла демонстрация под лозунгами «Стоп Бандера» и «Польский Львов»: Украина: Бывший СССР: Lenta.ru. 15.10.2018. https://lenta.ru/news/2017/07/10/bandera_stop/

⑥ Коментар МЗС України у зв'язку з намірами польської сторони розмістити на

结语

波兰与乌克兰的历史记忆冲突，是双方在政治上滥用历史的可悲结果。两国都在努力垄断对过去的叙述，以美化历史，保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关于历史记忆的冲突不仅影响了双边外交关系，而且造成了两个国家人民间的隔阂。在 2013 年的调查中，54%的波兰人确信由于历史记忆的争论，分裂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①

就这场冲突本身来说，一方面，两个国家的实力是不对等的。波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良好；而自危机以来，乌克兰一直是一个政治上艰难、经济上虚弱不堪的国家，不仅没有能力应付与波兰的冲突并对其领土要求做出反应，而且在政治上有求于波兰。2017 年 12 月 12 日，在利沃夫的一辆波兰大客车被乌克兰人炸毁，波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乌克兰需要波兰，而波兰则完全可以没有乌克兰”。^②

另一方面，对两个国家各自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就波兰来说，历史记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分裂。尽管历史记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波兰的一些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公众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政客为了选举和外交政策牺牲了国家集体历史记忆。^③波兰历史学家也认为社会被分裂为两个对立面：后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和批评者。^④也有人认为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是“普京的代理人”的杰作。^⑤

сторінках нового паспорта Польщі зображення Поль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поховань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Личаківського кладовища - Новини - МЗС України. 12.10.2018. <https://mfa.gov.ua/ua/press-center/news/58929-komentar-mzs-ukrajini-u-zvjazku-z-namirami-polysykoji-storo-pi-rozmistiti-na-storinkah-novogo-pasporta-polyshhi-zobrazhennya-polysykih-vijsykovih-pohovany-na-teritoriji-lichakivsykogo-kladovishha-u-misti-lyviv>

① Киселёв А.А. Волынский геноцид 1943 г.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55.

② С Бандерой в Европу вы не войдете. Как Польша разочаровалась в Украине - РИА Новости. 19.10.2018. <https://ria.ru/world/20171212/1510682514.html>

③ Киселёв А.А. Волынский геноцид 1943 г.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55.

④ Patryk Wawrzyński, Ralph Schattkowsky, “Attitudes towards the Government’s Remembrance Policy in Poland: Results of an Experimental Study”,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2015, Vol.11, No.2.

⑤ Киселёв А.А. Волынский геноцид 1943 г.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55.

比起波兰，乌克兰在这场冲突中受到影响更大。自 2014 年危机爆发以来，乌克兰就陷入了与俄罗斯的对抗之中，而与曾经的盟友波兰的冲突更让其处境雪上加霜。在政治上，尽管波兰一直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对抗，也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领路人，但波兰要支持的是一个摒弃对班德拉分子崇拜的乌克兰。前文已经提到了 2010 年在波兰主导下，欧洲议会对乌克兰授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不满。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报道，2017 年 7 月，波兰外交部长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乌克兰不停止对斯捷潘·班德拉的崇拜，波兰将不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①经济上，危机以来大量乌克兰移民赴波兰谋生，而在双方冲突的背景下，2017 年 12 月 14 日，波兰批准了从 2016 年 2 月份就提出的在波兰和乌克兰边界修建隔离墙的法案，此举的目的在于打击乌克兰非法移民进入波兰。^②

理论上，两个国家的和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合作与对抗、政府和社会、长期战略与短期政策、政治上的支持与反对等。同时，在和解中实用主义和道德的混用，将取决于历史、制度、领导力和国际背景等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③具体到波兰和乌克兰的和解，涉及两个民族间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和残酷的民族冲突、“种族灭绝”话语的全球化 and “受害者”的历史叙事、后苏联国家建设以及如何看待过去的共产主义历史的挑战、欧盟扩大以及俄罗斯在东欧角色的转换等问题。^④

在当前的条件下，阻止波兰和乌克兰和解的原因在于，不相容的历史叙事和两个国家各自的社会政治局势。对乌克兰来说，以乌克兰起义军和斯捷潘·班德拉为载体的民族主义，是其自 1991 年独立以来塑造的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而现在处于危机中的乌克兰更加需要民族主

① В МИД Польши заявили, что Украина не войдет в Европу с культом Бандеры. 15.10.2018. http://www.aif.ru/politics/world/v_mid_polshi_zayavili_chno_ukraina_ne_voydet_v_evropu_s_kultom_bandery

② Ustawa z dnia 14 grudnia 2017 r. o zmianie niektórych ustaw w celu ułatwienia zwalczania chorób zakaźnych zwierząt - podpisana 28 grudnia 2017 r. 10.10.2018. <http://www.prezydent.pl/prawo/ustawy/podpisane/art,29,grudzien-2017-r.html>

③ T. Zhurzhenko, “Memory War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Ukrainian–Polish Borderlands: Geopolitics of Memory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p.174.

④ T. Zhurzhenko, “Memory War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Ukrainian–Polish Borderlands: Geopolitics of Memory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义叙事来对抗俄罗斯。而在波兰，一方面，面临着 2019 年议会选举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为了席位，会更加煽动民族主义，另一方面，目前也是波兰自二战以来夺回故土的最有利的时机。

而促成和解的因素，一方面在于波兰和乌克兰共同面临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两个国家的冲突将使俄罗斯受益，使其增强在东欧的影响力，并削弱反对俄罗斯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于波兰非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政治态度。2013 年，波兰外交部官员曾经说过，“现代乌克兰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崇拜并不是针对波兰人的。”^①此外，在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公众中间也存在和解的呼吁，但是在政府主导历史解释权的形势下，这种力量非常弱小。^②

针对目前的局势，乌克兰历史学家表示，没有理由认为波兰和乌克兰的争论将很快进入一个理性的轨道。未来几年波兰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将会是非常悲观的。^③

【Abstrac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Ukrainian nationalists launched the “Volyn Massacre” against Polish civilians in the Western Ukraine. Although Poland and Ukraine have established clo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on the basis of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since 1991, yet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conflicting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regarding the “Volyn Massacre”. Since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se conflicts have intensif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spectiv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 in both countries. In addition, coupled with Poland’s potential territorial claims of the western part of Ukra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has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Poland and Ukraine on historical memory conflicts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① Киселёв А.А. Волинский геноцид 1943 г.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54.

② Polacy nie są lepsi od Ukraińców”, *Rzeczpospolita*, 11 July 2013, p. A11.

③ Тарасенко Н. Польський Закон «Про Інститут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пам’яті»: погляд з України// Україна: події, факти, коментарі. 2018. №.4.

【Key Words】 the Volyn Massacre, Diplomacy of Ukraine, Diplomacy of Poland, History of Ukraine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организовали «Волынскую резню» против польских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лиц в Западной Украине. Хотя с 1991 г. Польша и Украина установили тес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основе общи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эти две страны имеют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трагедии в Волыни.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из-за развит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внутри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конфликты по да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обострились. Кроме того,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ми претензиями Польши в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Украины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ухудшаются. В нынешних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мирение Польши и Украины по конфликт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крайне трудно.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Волынская резн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Украины,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ольши,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责任编辑 刘军)